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浪淘沙》日治時期

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



研 究 生：李世煌

指導教授：侯作珍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浪淘沙》日據時期

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

研究生：李世煌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章錫

侯作珩

蔡尚志

指導教授：侯作珩

系主任(所長)：賴昭宏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摘要

東方白的《浪淘沙》以台灣歷史為證，以台灣家鄉為懷，描繪台灣從 1895 割日迄至當代，三個台灣家族三代人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的故事；空間背景涵蓋台灣本地、日本、中國、南洋及美加等地，映現外來勢力（浪）不斷「淘」洗台灣人民（沙）的歷史風貌，在經歷民族的悲情後，後代的子孫是否更懂得讓長夜的仇恨，隨著朝陽所帶來的溫暖而蒸發、昇華，化作煦煦照人的陽光，照耀整個台灣的天空。對於仇恨控訴糾纏，不是遺忘，而是釋懷。

台灣經歷葡萄牙、荷蘭、日本等國的殖民，被殖民經驗是複雜而多重的，不管是先來或後到，均有程度不一的被殖民經驗。而這樣的情境，如何釐清？如何爬梳？這即是筆者以「後殖民論述」為視窗來研究《浪淘沙》文本，所欲尋覓之場域及待解之糾葛。具體方法上以法農、薩依德的觀點來印證《浪淘沙》的殖民情境與人物困境，並尋求解脫超越之道。

始終陷在認同混亂之中的台灣人，要如何正視殖民的歷史，用理性的態度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本土認同，是我們今天必須深思及努力的方向。從《浪淘沙》的回顧中，也許可以獲得更多有用的啟示。

關鍵字：「後殖民論述」、法農、薩依德、認同。

Summary

Tonfang Po's *Lang Taur Sha* is the proof of Taiwan history, the love for its hometown, describing Taiwan from 1895, the end of Japanese period to the present. The story is on a family of three generations, which are in the ebb and flow of life, and the sorrows in partings and the joys of reunions in life. The background includes Taiwan, Japan, China, Southeast Asia, America and Canada, reflecting the external strength (浪) continue to "wash away" (淘) Taiwan people's (沙) history scenes. After going thru a nation's sorrows, will the descendents understands to let the long night enmities evaporate and sublimate, thru the warmth brought by the sunlight that shines on the sky of Taiwan. In regards to the accused of enmities, it is not to forget, but to forgive.

Taiwan went thru colonies of Portugal, Netherlands and Japan, etc. Colonial experiences were difficult and repetitious, it doesn't care whether you are the first or the last, they all hav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being colonized. With these conditions, how to sort out, how to set apart? This is what the author used in "After Colonial Theory" to research on the *Lang Taur Sha* story itself, the need to find its place or to solve its imbroglio. The concrete methods in Fanon and Said's point of view to proof "*Lang Taur Sha*"'s colonial conditions and the people's dilemma and to find the way out to excess freedom.

From the beginning, the Taiwanese falls into identifying one self with disorders. How to face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and to use reasonable attitude to build what really belonged to Taiwanese's hometown are what we should deeply think about and to work hard in that direction. From the review of "*Lang Taur Sha*", maybe we can receive more and better useable disclosures.

KEY WORD : After Colonial Theory、 Fanon 、 Said、 Identity

《浪淘沙》日治時期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 之探析 目錄

第一章：緒論.....	0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03
第二節：前人研究成果評述.....	10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17
第二章：《浪淘沙》小說人物對現代性的認同 與本土性的堅持.....	22
第一節：殖民現代性與本土性之交會.....	24
第二節：周福生與本土化之聯繫.....	33
第三節：丘雅信跨地域、跨性別之特質.....	40
第四節：江東蘭「殖民性」的跳脫與「現代性」的依循...51	
第三章：《浪淘沙》小說人物抵殖民意識之表現.....	58
第一節：周福生家族.....	59
第二節：丘雅信家族.....	65
第三節：江東蘭家族.....	72
第四章：《浪淘沙》三代人物對殖民現代性的抵抗與屈從..	80
第一節：武力抵抗的一代.....	83

第二節：壓不扁的成長的一代.....	90
第三節：戰火下的掙扎的一代.....	99
第五章：結論.....	105
參考書目.....	124

緒論

《浪淘沙》作者東方白在 1990 年《台灣文藝》雜誌所舉辦的浪淘沙文學座談會解釋《浪淘沙》含義：「浪：指外來勢力。淘：淘洗。沙：淘選下來的台灣人，我這裡的台灣人沒有排斥的意義，指的是留在台灣的人。」¹外來勢力不斷淘洗、淘選下來的台灣人。東方白在座談會上更強調台灣人沒有任何排斥的意義，指的是留在台灣的人。故事點由鼻頭角與三貂角中間的小漁村，面對太平洋的澳底，拉開空間軸；「有人看見只掛日本旗的軍艦，在三貂角的海面下錨。」更清晰地點出了時間軸的起始。三巨冊的小說最後金姑娘、雅信、東蘭、明德相邀下，沿北台灣海岸蜿蜒小路，搭計程車到澳底海灘，在紀念碑前，雅信藉著月光清晰讀出光面石上的碑文，兀自說了起來：「五十外年前，我欲去日本讀書的時陣，我有來即仔來過一遍。彼陣仔紀念碑是用炮彈栽的，即馬是用大理石起的。彼陣仔彼碑文刻的是日本征台的豐功彪勳，即馬刻的是中國抗日的英雄偉蹟。早前用的是『明治』的皇號，現在用的是『中華』的國號。紀念碑的地點攏像款，孤形式跟內容稍變一下而已。」在眾人歛歛、沉默中，東蘭用漢文吟了一首『四絕』漢詩：

千山空寂，萬鳥歸絕。

禪燈孤影，幾時安歇。

四人有所感而沉默，不再發一聲……。最後相約：「…這霧水這倪厚，明仔再絕對復是的大好天，大家較早起來這海邊看日出！」結束了《浪淘沙》。《浪淘沙》文本雖照見了日本殖民的現世穢土，因忠於原味，文字更顯生動昂然。作者東方白經由水利工程博士之訓練，眼觀手到心凝之處，不僅於觀念的吸納，東西文化、制度的體受，在《浪淘沙》文本中捎來異於悲情的台灣意識之無量光。《浪淘沙》文本無分域內、域外的昂揚、隱忍，都是本土力量互動發皇的寫照。

¹ 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之〈浪淘沙座談會記要〉總號第 123 期 台北市，前衛，1991，p16

六〇年代台灣文壇有《濁流三部曲》、七〇年代《台灣人三部曲》、八〇年代《寒夜三部曲》、九〇年代則為《浪淘沙》與《失聲畫眉》。² 這劃時代的巨著仔細看，它一直貼著台灣的歷史背景，但儘量不提到年代，書上年、月、日都沒有，…他（東方白）儘量把歷史割捨。……東方白將史料用得非常謹慎，非常活，爲了讓讀者能夠真正進入當時的時代，他儘量客觀描寫人物的行爲，不進入他們的內心，不去替他們思考，也不去肯定或否定。³ 作家李喬更強調：《浪淘沙》這本書是歷史素材小說而不是歷史小說。在文學史上，歷史小說乃作者選定一段時代，配以當時的風俗習慣、服飾、特殊景觀作爲背景，或以一事件、人物爲中心，依大家認同的常識爲主線。創設一相配的情節，使事實與虛構的部份相重疊進行。目的是求歷史事實的了解，注重在趣味性。而歷史素材小說是藉歷史素材的方便性與可信性，重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爲歷史事件之個人解釋，更重要的是其必然出乎歷史，歸趨文學的存境。⁴

如此的《浪淘沙》應是儘量把歷史割捨、重點在虛構的經營上，爲歷史事件之個人解釋。但台灣的歷史，每一段都是斷裂，都是句點。清朝清領時期是斷裂，是句點；日據時期是斷裂，是句點。主角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前進的路徑中，有先人的艱難步履，痕跡斑斑，卻不絕如縷。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更未將公理正義與本土等同起來，力行的主軸是一份寬宏、善良的人文關懷。台灣意識的受難心態不是文本欲彰顯的主題，雖非悲情文本，但可能是無望的奮鬥，要對無望的奮鬥寄予多少堅持與意義？可能是失敗、可能是嘆息，但嘆息後即刻又提起不止息的樂觀，即知即行，昇華的、包容的民族主義更令日本殖民者更顯暗淡。《浪淘沙》三代家族主要人物的描述，近六十年的時間，是斷裂的，卻也是句點。

² 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之〈浪淘沙座談會記要〉總號第 123 期 台北市，前衛，1991，p16。（陳芳明教授發言內容）

³ 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之〈浪淘沙座談會記要〉總號第 123 期 台北市，前衛，1991，p16

⁴ 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之〈浪淘沙座談會記要〉總號第 123 期 台北市，前衛，1991，p16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覺醒，台灣政治生態的急劇改變，有關台灣歷史和台灣文學整理及研究，目前已成迫切的需要。台灣文學除了藝術上的成就與價值，它也是記錄殖民統治之下，台灣人民的思想發展及心理樣態的生動書卷。通過它，可以看到被殖民的台灣人民艱辛、痛苦的處境，體驗曾發生在他們身上的軟弱、苦悶、挫折而最終是強韌不屈的反抗和自覺精神。站在我們的土地上，站在深耕的土地上、站在親愛的土地上、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看見不正常卻被認為理所當然、永恆的真理被譏諷為落伍、短線的投機被視為機靈、真誠的行動被嘲弄為痴愚、虛偽狡詐被冠上堂冕的榮銜。⁵這些顛倒錯亂的景象，在中外歷史上，固曾出現，然現今台灣之集中、極端之漫無邊際，真直叫人不禁搖頭三嘆。清晰的台灣圖像是匱乏的，而清晰的台灣圖像應有共同的記憶與想像，通過文學應有更深化的影跡，潛移默化的凝聚更利水到渠成。也就是說台灣圖像與共同記憶與想像之間應有一互動、交流、交叉之橋樑，而這橋樑最為深遠、最柔韌者應屬文學。

一個人剛接觸文學，他會說自己知道「什麼是文學」，不過經過一段努力後，有一天他必然會突然覺得自己完全不懂。又經過一段時日的探求或從事創作後，有一天，他又認為懂了。再下去，他又發現自己還是不懂，然後又懂……，這懂與不懂的循環，貫穿了他文學生涯的全程，當然他的文學成果就在這當中形成或產生。

以上的流程，應用於小說，應該也是適當的。再從中國小說發展史來看：秦漢史傳文學→六朝志怪志人→唐人傳奇→宋代志怪傳奇→清代志怪、傳奇的中興→逐漸衰微。另一線是民間說唱文學→佛教的傳入→唐代的變文俗講→宋元說話→明代通俗小說的繁榮→清代通俗小說的進一步發展→近、現代小說的興起。

班固《漢書·藝文志》指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文心雕龍》對於小說

⁵ 郭楓編：《台灣當代小說精選》台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1999，p1（郭楓序文）

更是採取漠視的態度。唐朝時期，文言小說發展到了成熟階段，主要緣於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此時期的小說理論主要不是看它寫什麼題材，而是看它產生的社會效果。文言小說的內容以人物為主，都是模仿史傳體。到了宋代把白話小說作為新興的文學樣式來加以提倡，「蓋小說者，能讀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此時說話藝術繁榮發展，更強調說書人和話本創作必須博學多聞。明代時期之文言長篇小說強調通俗易懂，更不應任意虛構背離史實。白話長篇小說強調委曲詳盡，血脈相連，凌濛初更提出「小說反映現實生活的觀念。」

直到清末時期，小說成為大眾及通俗化文學了。易言之，平民百姓接受度高，學者、士大夫階級，讀書人認同度亦更顯提升了。在這一條小說發展的縱線上，歷經了數千年的時間，從排斥、漠視、鄙視慢慢進入較為中性的面向，最後才發展出通俗、接納的態度。時間序列由上而下，觀念橫軸亦由左慢移行至中線而驅近右方。台灣文學的研究亦是從排斥、漠視、鄙視慢慢進入中性的面向，雖有人視為現今之一門「顯學」，卻仍是「險學」的階段。十七世紀的明末遺臣筆下的台灣鄉愁文學，是鄭成功父子退守台灣而產生。昂揚激憤的反殖民文學，是日本人統治台灣而產生。皇民文學的出現，更是因為日本殖民體制極盡扭曲心靈的澀果。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之蔚為主流；應是緣於對反共文藝的排斥與反感。有怎樣的土壤就可能植出怎樣的的花朵。同樣地文學作品如不放在當時的時局當中，可能就無法讀出其中之韻味。企圖摒棄政治、歷史來看文本，而希望能獲得全面的了解，有著事實上的不可能。這樣的斷裂、句點接續而成的台灣文學，也因此構築成了一不同於周遭之特質。這樣的台灣文學都在瞭解人的問題，也在解決人的問題；這樣的台灣文學，更在瞭解台灣全體住民的問題。以這個方向當作論文研究的方向，其研究價值自當是毋庸置疑。作者東方白說：「這是時代的使命，年輕一點的幾乎日據經驗不足，年老一點的大都中文能力不夠，只有我們剛好夾在兩個時代的中間，你不認真寫，誰寫？」⁶同樣地以河洛語為母語，接受中文教育的筆者，

⁶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2005，p2010（精裝本）

對《浪淘沙》以台語對話，以中文敘述之特質，自當是感到貼切而溫馨。「你不研究，誰研究？」在這浩瀚的文學領域，願秉一份志趣，願盡一份綿薄之力，讓文學包容、昇華之光，沁亮我們的周遭。

就台灣被日本殖民的經驗來說，理解殖民統治的歷史意義，其重點恐怕並不是在強調殖民統治好或不好，那種可以一刀切斷的簡單評價而已，而是觀察其所存在著的一體兩面甚至多樣的面貌。

例如某部份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者在現代性的連結與建構上的成績，諸如普及教育、交通、土地規劃及法治社會的施政上，有較良好的印象。但殖民的機制、管控方式和武力威脅及文化清洗後的置入都依循其它殖民者相同的方式，……日本殖民台灣的軍事暴力和教育文化的雙向交叉壓迫，沒有讓台灣完全失去了反日的動能量，反而因異族與異文的差異旗幟，蘊涵並累積了抵抗的文化力量和人民力量，因此台灣文化在 1921 到 1930 年間，呈現了蓬勃發展的生命力，並建立了台灣主體性論述的初步結構，用以抵抗殖民日本。⁷這樣的說法未流於二元論述，應是相對的客觀。再看另一學者林瑞明的見解：

無論小說世界或現實世界而言，我們都急切需要將台灣的過去之根與現在之根緊緊地接連起來，盤結成堅固的根群，以期在外來文化與自主文化的激盪之間，在鄉村文明與都市文明的興替之間，在現實社會與理想社會的折衝之間，在人性的陰暗面與光明面搏鬥之間，能發揮那不滅的文學良心及道德勇氣，去剷除種種的險阻及橫逆。⁸

不論在小說世界和現實世界均得有這樣的勇氣，去剷除種種的險阻及橫逆，更進而讓群體進入反省與沈思。好讓處於邊緣化的台灣庶民在殖民體制下、不公不義制度下可以反照自身。吳濁流曾借《亞細

⁷ 李喬、曾貴海、劉慧真編撰《台灣文學導讀》，台北縣，允晨文化，2006，p157

⁸ 林瑞明 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市，允晨文化，1996，p99

《亞孤兒》中的胡太明，描繪出中日戰爭期間台灣人的行爲和思想面貌：

胡太明這個人，幾乎沒有什麼力量來反大東亞的現實，不論在台灣在日本在大陸，他都是一個幫傭的角色，他不能主動地做他想做的事，人的主動創造力降至零點，他沒有一套穩建的價值觀，也沒有明晰的自我肯定，一切都感到令他懷疑，他的人生觀是灰白的。在整個大東亞——台灣、日本、中國的流浪過程中，他時時刻刻受到侮辱及誤解，生存變成困境，最後走進瘋狂乃是必然。這是何等悲慘的一個台灣人圖像。但他卻是台灣人為自己真誠描下的第一個圖像，儘管悲哀，卻給了台灣這個群體人一個很清楚的自我樣張，使台灣人反省了他的本質——孤兒，如同一面鏡子，讓台灣人第一次在鏡中照見了自己。⁹

這樣的反照自身，文本猶如鏡子在鏡中照見了自己，釐清了台灣庶民的位置，這樣是反照自身更是一種內在革命，是一種意想不到而有效益的內在革命。相較於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東方白的《浪淘沙》圖像已打破封閉的文化形式，接納異質成爲可能，與海洋與殖民經驗結緣的可能性，是開放的，像一所涼亭，四無遮閉，任何一個方向的風都可以吹進吹出。自我圖像可能被大風吹離，但也因流通而有更清晰的圖像；自我價值也可能被利益狂流所襲捲，但也因與世界潮流的互動而踏穩自己的步履，釐清自己的價值；自我意識可能因狂沙驟雨而模糊不清，但驟雨狂沙是挫折卻也是成長的養份，雨過天晴的彩虹總是特別鮮亮耀眼。自我圖像雖曾模糊，但已日益清晰；自我意識雖有錯亂，但已返回正途；自我價值雖曾貶謫，但逐漸自我接納。這些自我圖像、自我價值、自我意識的變易在這島上發生，都屬於台灣的一部份。不管它叫大和民族主義，還是中華民族主義，東方白已

⁹ 李喬 著《台灣人的醜陋面》台北市，前衛，1998，p216

將它重新整頓，重新收編，上一代的昭和史和這一代的民國史都同樣寫入《浪淘沙》文本，注入庶民的血脈。

《浪淘沙》以史詩的氣魄寫百年來台灣三個家族的悲、歡、離、合。歷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歷史。……而處處彰顯的是人本關懷和對台灣鄉土的眷戀。¹⁰東方白更言：「不只要把台灣的「苦哀怨醜」寫下來，也同時要把台灣的「甜樂喜美」寫下來，讓我們大家把台灣文學根植在故鄉現實的土壤裡，加以灌溉，加以施肥，期待有朝一日開出世界美麗的花朵！」（2044）

當我們找不到自己國家的認同時，至少能認同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也就找到自己的定位。一方面尋根，在尋根的過程中，學會原諒，當我們逐漸走出黑暗面對自己的歷史時，我們才能回首觀照自己民族的所來處，因為願意停駐觀照自己民族的所來處，人心內在思慮才會益加成熟，如雅信在信仰裡找到博愛寬容；東蘭在文學天地裡尋得寧靜淡泊；明德在人情練達中釋懷仇恨。

在經歷民族的悲情後，後代的子孫是否更懂得讓長夜的仇恨，隨著朝陽所帶來的溫暖而蒸發、昇華，化做煦煦照人的陽光，照耀整個台灣的天空。對於仇恨控訴的糾纏，不是遺忘，而是釋懷。

再回顧李喬所強調：《浪淘沙》這本書是歷史素材小說而不是歷史小說。……歷史素材小說是藉歷史素材的方便性與可信性，重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為歷史事件之個人解釋，更重要的是其必然出乎歷史，歸趨文學的存境。……歷史素材小說則明修棧道、暗渡陳滄，藉他人濁酒，澆我胸中壘塊，變化歷史事實，提出對此歷史的觀點及作者之生命觀。¹¹因之，《浪淘沙》裡，我們可以看見在百年孤寂的歷史裡，也有文學的春天。華司華茲、雪萊的浪漫詩，談《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孔德第》。談莊子、雷沙、甘地等等，在真實的故事裡，有東方白的文學興緻與哲學睿智。從童謠、民謠、到當時的流行歌曲，更可見作者對音樂的喜好，透過筆尖表露無遺，川流在整個《浪淘沙》

¹⁰ 齊邦媛 著〈冰湖雪山和南國鄉夢〉收錄於東方白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24、25

¹¹ 李喬〈浪淘沙座談會記要〉《台灣文藝》台北市，前衛，1991，總號第123期，p7

中。時而傷痛，時而喜悅，時而憂鬱、時而興奮，所有的情感交揉或豐富的交響樂詩，交錯編築成雄渾壯闊，綿延流長的《浪淘沙》。

人本的關懷、台灣鄉土的眷戀、台灣的苦哀怒醜、甜樂喜美均偏向感性角度，筆者擬以「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三個視角來看《浪淘沙》，並將「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三個概念的涵義界定如下：

一、「現代性」大致上是以啟蒙時代或十七世紀末為分界點，隨著啟蒙和工業革命的來臨，導致經濟、社會和文化上隨之變遷，伴隨著市場消費、個人主義、公共領域和大眾媒體的發展，使人以「進步」(progress)作為理想和目標所在，渴望和落後的過去絕裂，而邁向開放的未來。「現代性」強調創意、進步與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所強調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現代性」的發展，也間接促成新教倫理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積累，所有人們依賴的舊傳統價值以及固定不變的觀念，都逐漸在消失當中。¹²

二、關於「本土性」，常和「本土主義」(nativism，或譯「本土論述」)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本土論述」(nativism)所指涉的是：「希望藉由本土實踐和文化形式，擺脫殖民和新殖民體制的控管，以恢復殖民前的生活方式。」¹³陳建忠則引 Bill Ashcroft 等人所撰之《後殖民研究中的關鍵概念》所定義的「本土主義」是：「一種想要回到存在於殖民地社會的原住民生活與文化形式的渴望。」並進一步指出，本土主義既要回到原來的生活與文化形式，則他所追尋的一種價值或原值就是我們所謂的「本土性」(nativity)。¹⁴

因此對於「本土性」概念的釐清，筆者界定為「本土性」在政治

¹² 廖炳惠 著《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p169

¹³ 廖炳惠 著《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p175、176

¹⁴ 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市，五南，2004，p6

上較爲堅持民族主義的立場、文化上傾向保有原有文化之優良質素、思想上更在於開拓自由的思想空間。本土性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思考與發展都應以台灣的人民和土地爲基點、爲中心。當然本土性並不必然全屬於正面質素，負面作爲是發展之障礙，正面作爲自然是本土精神之堡壘。

三、「反殖民」(anti-colonial)指的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第三世界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殖民主義產生抗拒的獨立運動。……這些殖民地領袖，不只在殖民地提出屬於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更進一步推動本土性的民族運動。他們利用在行動與理論上具體對殖民主義作出拒抗的方式，得以加強本土的解放及經濟和文化的武裝，藉此將殖民力量區隔在新興獨立的國家之外。¹⁵

筆者嚐試在感性文本中，理出理性之規序；在相關文本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探討「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變易和《浪淘沙》文本中一些正反諸型的思索：更進一步探討《浪淘沙》人物面對現代性/本土性的態度，有何積極正面的意義？《浪淘沙》人物抵殖民意識/行動的可貴，突顯了什麼樣的台灣精神？《浪淘沙》三代人物對殖民現代性的抵抗與屈從，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不同階段下人民的因應模式。台灣人爲何對殖民現代性沒有抗拒力？要如何正視/清理這樣的歷史傷痕？

¹⁵ 廖炳惠 著《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p20、2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評述

依「台灣作家全集」之《東方白集》附錄「東方白小說評論引得」所記載，《浪淘沙》成書經過及作者之訪談、報導共計十一篇，而針對《浪淘沙》之文本所作之研究論文則屬屈指可數，收錄於《浪淘沙》（2005 精裝版）原書中則計有：鍾肇政、葉石濤、陳明雄、林鎮山、齊邦媛等五人之六篇（鍾肇政二篇）。鍾肇政之〈滾滾大河天上來—序東方白《浪淘沙》〉這篇寫於 1988 年 6 月，鍾肇政先生謙稱此篇是「不成序的序文」，因在這個時間點（1988 年 8 月）東方白表示《浪淘沙》已無法續寫了，未完成部分待身體狀況許可再執筆。所幸在隔年，1989 年 10 月 22 日仍完成了《浪淘沙》。鍾老這篇「不成序的序文」應是鼓勵多於一切。鍾老另一篇〈含淚的歡呼—東方白巨著《浪淘沙》完成書感〉點出正氣凜然的丘雅信、傲岸不屈的站在加拿大法庭的一幕，表現出台灣查某的高潔與尊嚴，令人擊節，也令人讚嘆。此篇寫於 1989 年 11 月 6 日《浪淘沙》完成後，更點出愛與光明是東方白的脈動，也正是文學作品之所以偉大的要素。葉石濤之〈台灣人命運的史詩〉，認為《浪淘沙》是「由巨視性的世界觀點來凝視台灣及台灣人的歷史遭遇，又能站在本土性的土地和人民的立場來透視台灣人命運的小說。」（25）陳明雄之〈東方白台語文學的心路〉站在台語的觀點指出「用台語寫出一篇好作品，比寫出一百篇論文來鼓吹台語更有效」（2015），稱讚東方白，謳樂《浪淘沙》。林鎮山之〈人本主義的吶喊—論東方白的《浪淘沙》〉一文指出「雅信、明德與東蘭肯定了人本主義那種以基督教道德為架構的西方傳統，而明德與東蘭卻又超乎『定於一尊』的俗世限制，於是東方的磅礴正氣充溢於天地之間，証之於此，誰還能說台灣的文學常有島國習氣？」，《浪淘沙》有人本主義的豐富軌跡可尋，更企圖昇華、光大。齊邦媛之〈冰湖雪山和南國鄉夢—賀《浪淘沙》七版問世〉也點出《浪淘沙》「處處彰顯的只是人本的關懷和對台灣鄉土的眷戀」（2035）。

學位論文涉及《浪淘沙》計有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

歐宗智《多少英雄浪淘盡《浪淘沙》研究與賞析》、董學奇《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王淑雯《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黃靖雅《鍾肇政小說研究》、簡正崇《台灣閩南諺語研究》、王慧芳《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林慶文《當代台灣小說的宗教性關懷》。但上述論文除游玉楓與歐宗智、董學奇是以《浪淘沙》文本為主體，其餘所論僅限於局部。因之筆者在本節擬針對游玉楓與歐宗智、董學奇之研究成果作一簡略概述：

歐宗智著《多少英雄浪淘盡：「浪淘沙」研究與賞析》是學位論文也是專書，由前衛出版社於 2005 年出版。歐先生以《浪淘沙》和東方白為研究對象也陸續在相關刊物發表相關論文。該學位論文緒論下共五章：第一章創作理念、第二章形式結構、第三章人物結構、第四章意義結構、第五章《浪淘沙》的特色，最後結論——小說藝術的完整與偉大。在第三章人物結構之主要人物之結語：

綜觀之，《浪淘沙》的主要人物個個鮮活生動，丘雅信是反映台灣歷史際遇的奇女子，江東蘭具有特殊殖民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周明德則展現台灣人正直不阿的本土性格，莫不讓人印象深刻。毫無疑問，《浪淘沙》主要人物形象生動，較諸主題結構的呈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第三章人物結構之次要人物之結語：

無論如何，東方白本乎結構主義二元對立的思惟方式，塑造《浪淘沙》的次要人物，建構善惡之對比，創造嶄新的表現形式，有助於探求意義結構，加深對其主題意蘊的理解，我們藉此可以看出東方白的人道思想、愛的哲學，和他對於人

生的看法，從而導出內在精神生活的價值回歸。我們也認同《浪淘沙》周明德深受文革之害的大弟周明圓所言：「人總要往前看，不必往後看。」(2016) 任何人不論善或惡，我們都應抱持「寬容」的態度，不遺忘但也不記恨，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

在這一部份歐宗智先生的確將《浪淘沙》中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作了畫龍點睛、結晶化的析理。東方白《浪淘沙》雖以大時代為背景，但儘量避開大時代的主線，試圖以微細的庶民波動，呈現艱沈的人生處境，映照大時代的變化。既然挑選這樣的方向，下筆就得舉重若輕才好。以《浪淘沙》——「掘刀換野密」一幕(1648)：

「你去士林哦？啊你安怎去安怎轉來咧？」

「我走路去走路轉來？」

「啊你行若久咧？」

「一去三點，一來三點，通共六點鐘久。」

這些輕輕的動作、淡淡的言語，也令人知解情意，讓人不自主地心酸。《浪淘沙》直接面對生活及對生命的基本尊重，透過人物的規劃將整體營造得成功。歐宗智先生論文更將《浪淘沙》所欲彰顯的聲音：對生命的關切與追求，平實表達，並碰觸人性之體溫，言簡意賅的呈現歐宗智先生之論文最後結論，筆者曾試整理出三大特點：

一、作者（指東方白）採取全能觀點的第三人稱客觀敘述法，完全以外在行為之描寫為重點。藉由人物面對衝突的反應及處理，呈現對人物性格的勾繪，但由於並未進入小說人物的內在世界，難免予人意猶未盡與美中不足之感。

二、思想性高是東方白小說的重要元素，《浪淘沙》採用二元對立

或是三元化的結構原則，呈現「人道精神」、「宗教情懷」和「身份認同」的內涵語碼，形成系統化的意義結構。

三、《浪淘沙》躋身台灣當代小說之列，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其深具「展拓時代場域」、「提升人物情愛」、「解開族群情結」與「本土語言書寫」等開創性特色。

游玉楓之論文《東方白「浪淘沙」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東方白的文學道路、第三章《浪淘沙》的小說美學、第四章《浪淘沙》的主題思想、第五章《浪淘沙》的評價、第六章結論。

筆者曾試從游玉楓之論文，整理出其論文析論《浪淘沙》之幾項特點與結論：

- 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進入台灣海峽的外浪一再衝擊美麗的福爾摩沙，島上的人民在歷史的波折下，早已練就了一身抵抗的精神與堅忍的毅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鍾肇政說：

《浪淘沙》為我們展現了台灣自淪日起直到當代的歷史風貌，並以三個家族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來印證時代巨輪的運轉。這是它的一般性意義。¹⁶

- 二、書中表達的史觀與生命觀，就是作家的特質：

這些走在時代的巨浪、歷史的波濤上的人物，波浪是不可能不打在他們身上的，但作者隱忍而節制的筆卻不讓時代的巨浪來搖撼作品，使得這部龐然鉅構堅定地圍在人間故事上，而沒有成為時代的記錄，是有作者的睿智與巧思的。

17

這種的睿智與巧思是藉由歷史小說抒發作者自己的史觀與生命

¹⁶ 鍾肇政、東方白 著《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市，前衛，1993，p176

¹⁷ 彭瑞金 著〈浪淘沙掠影〉《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1992，p232

觀，把歷史的哀愁藉由宗教的情懷化掉糾纏的仇恨。

三、語言之本土性格：

「用台語寫出一篇好作品，比寫一百篇論文來鼓吹台語更有動力。」¹⁸

《浪淘沙》裡，只要能夠使用，而且是美的，東方白都以台語的文字表達對話。客家話、泰雅語的刻意安排，就是透過語言更凸顯台灣族群的多元特性。

四、超越國界、人種的超然立場：

東方白寫作年代較鍾肇政、李喬晚，也因此族群的融合，族群語言的兼顧，處處顯示東方白以後殖民論述的觀點強調曾被殖民國家對本土語言的追溯，與族群命運共同體的觀照。葉石濤曾就此特點指出：

這意味著這部台灣人命運的史詩由巨視性的世界觀點來凝視台灣及台灣人的歷史性遭遇，又能站在本土性的土地和人民的立場來透視台灣人命運的小說。從來沒有一部台灣小說帶有這種超越國界、人種的超然立場。《浪淘沙》的小說技巧應該是綜合性的寫實。這也使得這部小說有可能成為「偉大」小說系譜裡的一份子。¹⁹

針對《浪淘沙》張大春也指出：

他（東方白）並沒有因「浪」（巨大惡質的政治和戰爭催力）淘「沙」（卑微掙扎的台灣人民）的悲愴歷史而放棄作家本人動見

¹⁸ 轉引自陳明雄〈東方白台灣文學心路〉《浪淘沙》台北市，前衛，p2069

¹⁹ 葉石濤〈台灣人命運的史詩〉《中國時報》1993，12月27日27版。

苦難表象的清晰視野——他的文學信念、宗教觀、藝術修養以及人生哲學、「不擇地皆可出」地託在江東蘭、周明德、丘雅信、乃至遠山明、長谷川大佐、次要人物的身上，為「家族／國族」的史詩結構填充了豐富、雄辯的知識內容。²⁰

董學奇之論文《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與實踐》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東方白的創作理念、第三章影響東方白創作理念形成的因素、第四章東方白創作理念在《浪淘沙》中的實踐、第五章結論。董學奇論文中分析出前人有關《浪淘沙》的研究，偏重在文本的主題思想、人物塑造、語言藝術三大層面，而董學奇論文所著重之議題在東方白之創作理念、創作理念之實踐，這兩大方向上。

一：創作理念上，該文認為《浪淘沙》最可貴之處，在於生命反芻後的再現，東方白每逢生活變動，即陷入憂鬱，半生為此所苦。但「最深沉的思想產生在最痛苦的病中」，思想敏銳深刻的東方白，因而創作有常人所不及之處。廣袤渾厚的托爾斯泰、樸實深沉的契科夫、精與慧的芥川龍之介，三位最讓東方白醉心，也是對東方白影響最大的三位作家。

二：創作理念之實踐，該文認為東方白特別強調寫作時要「寫一時空，但超越那時空」寫出人性中恆久存在且不受國界限制的「愛、諒解、寬恕」等主題。《浪淘沙》的幾位主角，都具有象徵意義的投射。丘雅信象徵女性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努力，江東蘭刻畫出有理想但缺乏行動能力的市鎮知識分子，周福生、周明德祖孫則展現正直不阿的台灣性格。文本中實際上也加入了東方白的性格，藉描寫人物之便，將自己的思想、經歷全盤托出，反映了自己寧折不彎的刺客性格、嚴肅認真的人

²⁰ 張大春〈混合史實、政治諷刺和入道歸懷的浪漫寫實作品——《浪淘沙》〉，《中國時報》1980，2月28日27版

生態度，以及過度用功致身體病弱的經歷。

歐宗智論文彰顯了對《浪淘沙》小說人物面對衝突的反應及處理，呈顯對人物性格的勾繪，突顯了「人道精神」、「宗教情懷」和「身分認同的內涵語碼」深聚「拓展時代場域」、「提升人物情愛」、「解開族群情解」與「本土語言書寫」等開創性特色。該論文對《浪淘沙》創作理念、形式技巧和結構鋪陳上有深化的探討，但筆者論文針對《浪淘沙》關照重點是其內容及其中涉及的文化議題，在方向上是有所不同。

游玉楓論文從《浪淘沙》文本提煉出島上人民一身抵抗的精神與堅忍的毅力，東方白與《浪淘沙》文本齊一之史觀與生命觀，《浪淘沙》語言之本土性格與超越國界、人種的超然立場。該論文無論在小說美學、主題思想上均有精析之論點，也就是在內在研究是其主要論述方向，偏重主題思想、人物形像、藝術技巧、語言風格等方式、針對文本之美學研究。筆者論文針對文本人物之行動、行爲、思想、意識所反映之時代特性與問題，較側重人物的思想與時代背景之互動這一方面。

董學奇論文著重東方白創作理念、創作理念之實踐：析論出《浪淘沙》最可貴之處，在於生命反芻後的再現。創作理念之實踐上肯定東方白「寫一時空，但超越那時空」，寫出不受限制的「愛、諒解、寬恕」等主題。該論文同樣著重在《真與美》、《浪淘沙》的內在研究，表層結構有系統分析、在深層結構更條理出文本之清析內涵，筆者論文從後殖民視點、薩依德、法農觀點切入《浪淘沙》文本，論述方向自當有其區分。

《浪淘沙》前人研究都強調「人道與宗教關懷」、「包容理性」，本論文則具體分析「包容理性」是如何借著現代性/本土性的平衡展現出來？三代的不同的反殖民表現，殖民傷痕的清理與面對，《浪淘沙》提供了什麼樣的啓示？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中期，被用來描述拿破崙三世政權對法國鄰近地區的侵略行爲。1870年，「帝國主義」的統治在英國國會中備受關注，爭論是否應該延續其在海外殖民地的剝削和政經活動。1880年代之後，「帝國主義」開始轉型，改以文化、政治和經濟爲主要支配形式，也就是薩依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薩依德認爲，「文化帝國主義」強調支配性的都會中心，如何對遙遠的地區行使其意識型態的宰制與監控，「殖民主義」則是殖民者透過遠距控制，或是行使行政官僚定居殖民地，以便行使具體的統治，因此「文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有區隔的。²¹在二次大戰後，人們開始意識到殖民經驗的種種後遺症，進入到所謂「後殖民時期」，經濟霸權延伸爲心靈掌控轉變爲文化霸權，這個「後」字意謂著論述空間的延伸，而非線性時間的斷裂。也就是說「後殖民」的「後」（post）不一定指「之後」，而是由於殖民影響，產生兩種社會文化的接觸。²²台灣歷經葡萄牙、荷蘭、日本等國的殖民，被殖民經驗是複雜而多重的，不管先來或後到，均有程度不一的被殖民經驗。而這樣的情境，又是那一種「後」字，可以釐清、可以耙梳？這即是筆者以「後殖民論述」爲視窗來研究浪淘沙文本，所欲尋覓之場域及待解之糾葛。具體方法上以法農、薩依德的觀點來印證《浪淘沙》的殖民情境與人物困境，並尋求解脫超越之道。

二、研究架構

筆者在本論文中擬以《浪淘沙》文本爲研究方向、主軸，參照東方白先生之其他著作爲輔助，在歐宗智之《多少英雄浪淘盡「浪淘沙」研究與賞析》與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董學奇之《從《真

²¹ 廖炳惠 著《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2003，p142

²² 廖炳惠 著《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2003，p200

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及諸多相關研究者的研究基礎上，並參照學者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之詮釋方法，從「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等幾個視角來理解《浪淘沙》中之主要人物：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周福生……當時代的旗幟變異時，生存在當下的庶民是貼近、依賴旗幟或血管裡的流動因子逐漸變異。在心靈的安頓上，知識份子如何調適、如何說服自己，在制度、身心安頓上如何求得平衡？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浪淘沙》小說人物對現代性的認同與本土性的堅持、第三章《浪淘沙》小說人物之反殖民、第四章《浪淘沙》三代人物對殖民現代性的抵抗與屈從、第五章結論。

第二章《浪淘沙》小說人物對現代性的認同與本土性的堅持，在本章中分四節，第一節殖民現代性與本土化之交會。當日本殖民者以優勢的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力量，戴上現代性的面具，強制推行各種政策，面對台灣本土的庶民力量、鄉紳觀念，這二種不同力量如何撞擊，衝撞出怎樣的火花，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又在這樣的氛圍下，如何調理自己的步履、安頓自我的心靈，如何說服自己再次起航，第二節周福生與本土化之聯繫，周福生他在小說中是典型的移民人物，更是一位有自主性、生命內在有嚴格分際與要求的庶民，著根本土，認同鄉土後彰顯出之人格特質是迥異於日本殖民統治者所欲建構之方向，本土性的良好質數又如何能在異聲、異族的氛圍下生存，在本節中擬針對此議題討論。第三節丘雅信跨地域、跨性別之特質，丘雅信應是《浪淘沙》文本中主要人物中之主角，文本中著墨最多，本土成長過程受現代性教育深化的代表人物。成長背景之殊異、執著之理性，造就這位台灣第一位女醫生，她如何在現代性、本土化之間走出健康道路，在本節中擬以這個視角來探討。第四節江東蘭「殖民性」的跳脫與「現代性」的依循，同樣在日本殖民下的知識分子，丘雅信、江東蘭因成長背景的互異，更因心態想法的不同，丘雅信的積極活力川流全文，即當受挫亦全力尋找出口、尋覓解決之道；反觀江東蘭浸淫知識殿堂，找尋心靈慰藉，對外界的躲避心態，常令煩憂駐足。當

知識分子願走出學術殿堂、走出自己所圈定之桎梏，那生活的解放、心靈的解放，是浩瀚自在、是無窮無盡。在現代性的吸收與籠罩下，知識分子江東蘭如何調適殖民性，在殖民性與現代性之間作分辨、調節，是本節將努力釐清之方向。

第三章《浪淘沙》小說人物之反殖民，本章計分三節來探討。第一節周福生家族，周福生、周台生、周明德三代，成長背景、經歷之不同面對日本殖民者的態度之變異。觀念上、作法上更由於社會經歷、殖民教育之體驗，在態度、方法上又是如何的不同，是本節努力的一個方向。第二節丘雅信家族，地主丘元家面對日本殖民統治與一般平民百姓是否立場一致，經濟上的強勢在殖民社會中又是怎樣的一種心態？接受完整現代性教育的丘雅信，在受教育過程中內心思路的轉變、調整又是受到那些因素、事件的改變與影響？台灣史上第一位女醫生的淬練是融合那些時空背景、那些特質，造就出這位跨地域、跨性別之傑出醫者，隨著社會地位的提升，反殖民的作為丘雅信又如何因應，本節擬理出一較為清明之影像。第三節江東蘭家族，江龍志抗日先鋒、太陽旗下買田歸隱，噤聲中走自己的路，教育子弟漢文，教育子嗣江東蘭。抗日氛圍環境成長的江東蘭，接受完整之殖民現代性教育後，反殖民之力道是驚捍成長抑或噤聲無息，這因果之間的聯繫擬在本節找出一些相對應之聯繫。

第四章：《浪淘沙》三代人物對殖民現代性的抵抗與屈從，本章就日本殖民體制下，殖民現代性的強制推行，百姓反殖民之推動在時間軸上兩者關係之變化釐清。第一節武力抵抗的一代，就日本殖民體制剛登台，百姓在生存本質下之抵抗、平定後之強制、強壓執政，演變為噤聲與抵抗之轉向。第二節：壓不扁的成長，同化政策強蓋俗民生活，接著殖民者以現代性塑造馬首是瞻的氛圍，最後接受殖民現代性教育的台灣子弟，對殖民、現代性模糊的概念終有了重新的體悟。本節探討人物以丘雅信、江東蘭為主軸。第三節：戰火下的掙扎，本節以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庶民第三代為研究對象，在《浪淘沙》文本中雖著墨較少，但在一些蛛絲馬跡中仍可尋得一些大時代的脈絡，再

參酌其它文本、條理，日本殖民者在戰火下的特異行徑、政策。無奈、無息的被殖者，在戰爭烈火下如何苟延殘喘，在緊縮的空間反殖民又如何壓抑、又如何抒解，這些方向均是本節努力之方向。

三、研究限制

《浪淘沙》文本，故事緣起 1895 年日軍於台灣東北角登陸，結束於 1950 年左右。五、六十年的歷史，台灣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遷台，文本主軸在日本殖民這段血淚史，1947 年二二八事件在第三部沙第九章：家己的翁家己洗，東方白先生亦用六十頁的篇幅寫這一段。東方白曾提及：

二二八應加以揭示：不以仇恨，應以互相了解而和諧和愛做出發點。『浪淘沙』中，我早計劃用五十頁描寫這小段歷史，如何寫得叫大陸人可以接受，甚至喜愛，就要看將來如何努力了。²³

大陸人對這一篇章（家己的翁家己洗）是否可以忍受，甚或喜愛？並未見單對本篇章之評論論文，但可參考齊邦媛教授的一段話：

《浪淘沙》……書出版後已有許多評論，一致認為它是一部成功的大河小說，以史詩的氣魄寫百年來台灣三個家族的悲、歡、離、合。歷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歷史。許多人將它歸類為政治小說，卻侷限了它關懷的層面。它紀錄了一個奇異的政治支配人生的時代，感喟於政治浪潮沖刷下命運的擺盪。政治小說至少須有一些確切的政治信條，但《浪淘沙》中似乎看不出東方白遊子思鄉深情外持何政治立場，甚至連

²³ 鍾肇政、東方白 著《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市，前衛，1993，p173

今日流行的統獨立場亦不明顯，而處處彰顯的只是人本的關懷和對台灣鄉土的眷戀。²⁴

齊教授對《浪淘沙》所言：處處彰顯的只是人本的關懷和對台灣鄉土的眷戀。筆者確信〈家己的翁家己洗〉這一章應也具有這樣的人本關懷和對台灣鄉土的眷戀。

《浪淘沙》三大冊、一百五十萬字，寫下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天空，是血淚；寫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的動盪，是辛酸。浩瀚學海中，筆者才疏僅能就《浪淘沙》文本中日本殖民這一段，以「現代性」、「本土化」、「反殖民」幾個視角，來探析其脈絡、變異。上述視角與國民政府遷台之血脈肌裡待爾後相關領域學者、前輩，深入思索、研究。

²⁴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24、25

第二章 《浪淘沙》小說人物對現代性的認同

與本土性的堅持

《浪淘沙》以台灣歷史為證，以台灣鄉土為懷，描繪台灣從 1895 割日迄至當代，三個台灣家族三代人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的故事；空間背景涵蓋台灣本土、日本、中國大陸、南洋及美加等地，映現外在勢力（浪）不斷「淘」洗台灣人民（沙）的歷史風貌，呈現台灣人民於時代巨輪運轉下不屈不撓的精神與意志，追尋永恆的愛與光明。

《浪淘沙》寫近百年來台灣人民的歷史命運與精神意志，這正是文學反應社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文學，有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就有什麼樣的文學運動，當政治曲線向生命靠近時，文學曲線也跟著靠攏，甚或一時靠得太近，反過來帶動政治運動。日據時代，二、三十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就是如此，在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衝擊之下，開出堅定的，深具社會性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寫實文學之花。《浪淘沙》寫台灣庶民的生活，描述底層百姓生活的苦楚，也道出台灣菁英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無奈與妥協。面對殖民體制，台灣老百姓的態度、意識果真是抵抗走向認命，再由屈從而傾斜下去的歷程嗎？²⁵抵抗→認命→屈從→傾斜的模式是一成不變的嗎？亦或隨著外在環境與壓力的改變，外顯的行為如此，內在意識抗爭吶喊的火苗從未息歇？

《浪淘沙》中小說人物面對殖民體制帶來的現代性，有人能分辨其解放與壓抑，覺悟到理性文明的本質、通過理性思考的洗禮，能對封建文化的盲目與茫昧進行挑戰批判。但殖民體制下對鄉土所帶來的現代性無可避免造成台灣百姓一部份人的錯誤認知，「異化」心態一視鄉土為落後、野蠻。

²⁵ 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五南出版社，2004，P187

因之殖民體制所引進的現代性全盤接收，不免陷入殖民者殖民網路之中而不自覺，堅持本土性而又能抗拒、揚棄本土文化中之不良質素，更得理性思維。二者的接納與吸收非二元論述，非黑即白的分明立場。因之筆者擬從「現代性」、「本土性」這兩個主軸來探究《浪淘沙》中主角人物處於動盪時代中自身意識的轉化與特質。

第一節 殖民現代性與本土化之交會

一、現代性之初探

集劇作家、文學家、異議人士與政治人物身份於一身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1995年6月8日接受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時，在頒獎典禮上的專題演講內容，主題是：「全球化之福禍」。²⁶雖然已時隔多年，從文中仍可看出哈氏寬廣的視野與深邃的觀察力。

哈維爾稱「天涯若比鄰，網路居首功」。²⁷它們不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傳遞各種各樣的資訊而且還傳遞著一些一體化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模式。更傳遞著某些有關人類共存模式的資訊，例如民主政治、尊重人權、法規、市場規律等。這些資訊在不同程度上流通於世界各地，根植於不同的地方。但哈維爾亦堅持「保古老傳統，抗現代文明」。²⁸我們今天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有它們的根源，儘管這種全球文明無所不在，但它在人類知識的總數中卻無異於滄海一粟。這種文明有時是無限地新鮮，年輕和脆弱的，而人類精神是在沒有基本改變自身的情況下忙亂地欣然接受它的。從本質上，這種新鮮、單一的世界文明表皮及僅僅覆蓋或掩藏了眾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傳統歷史以及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與此同時，即使世界文明是滄海一粟，擴張開來，這底下的人性，這被遮蓋的厚度，依然越來越明顯地有要求被傾聽和獲得生存的權利。哈維爾堅信「排它式文明，挑戰全人類」²⁹他確切地表示：文

²⁶ 哈維爾於哈佛大學演講，1995年6月8日，刊載於中國時報2004.1月3、4日。（2004哈維爾訪台時刊登於中國時報）。

²⁷ 哈維爾於哈佛大學演講，1995年6月8日，刊載於中國時報2004.1月3、4日。（2004哈維爾訪台時刊登於中國時報）。

²⁸ 哈維爾於哈佛大學演講，1995年6月8日，刊載於中國時報2004.1月3、4日。（2004哈維爾訪台時刊登於中國時報）。

²⁹ 哈維爾於哈佛大學演講，1995年6月8日，刊載於中國時報2004.1月3、4日。（2004哈維爾訪台時刊登於中國時報）。

明的意義不是要削弱不同領域的文化個性，而是要使他們更完全地成爲自己。嘗試在文化基礎中找到共同點。易言之，這種全球化文明能達到成千上萬蔚爲奇觀的成就，如此出色地爲我們工作和豐富我們，同樣也可以耗盡、縮減和摧毀我們的生活。這些創造物有很多不但沒有服務人們，反而奴役人們。不但沒有幫助人們突出人們的身份，反而淹沒他們的身份。

綜合哈維爾的觀點有幾項主軸：

- (一)保古老文明，抗現代文明。
- (二)排它式文明，挑戰全人類。
- (三)文化基礎中，找到共同點。

今天保存本土化，是怕各別國家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消失。日治時代保存本土文化，是爲了維繫民族文化與氣節。時空背景雖異，保存本土文化的目標卻是一致的。上述三點論述，不單是台灣面臨之問題，更是全球急待面對解決之課題。而這三點論述中有共同的交疊的主軸—現代性。

對於現代性的定義，根據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詮釋：傅科認爲現代性是一種態度而不是一般歷史時間；是一種思考與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動與行爲的方式。³⁰對傅科來說，現代性無非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他借用了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ive）的說法來說明。波特萊爾對於現代性的定義是「朝生暮死的（le transitoire）、快速飛逝的（le fugieif）、偶發的（le contingent）」，而且要以英雄化來探究、掌握現代性。「英雄化」即是將「現在」獨立出來，與其它時間片段切斷，試圖描寫什麼是「現在」。對波特萊爾和傅科來說，它們不會把「現代」只當作一種時間概念。他們認爲所謂現代或現代性態度就是去設想何謂現代，試圖在現代性中去捕捉其本質。此外，傅科也認爲「現代性並不只是一種與現代關係形式；也是人必須與自我建立

³⁰ 轉引自莊欽閔 著〈排灣族狩獵文化與現代性的反思〉，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p3-2

的關係模式」³¹。因此「人」變成了一個像「現代」一樣的可供捕捉本質的對象。傅科稱這種對於「人」的探索叫做「禁慾主義」(asceticism)，這種禁慾主義，是某一群眾之間所流行的思考模式及行為方式，這種想法會把人當作是一個物體一般，想盡辦法去捕捉、型塑人的模樣。因為禁慾主義會使現代人間開始陶冶自己的性情、規範自己的行為，目的在於培養自己優雅的氣質、擁有謙虛的態度以及奮發向上的抱負。所以，傅科指出這樣的禁慾主義是一種比狂熱的宗教信仰還要嚴峻的規訓 (discipline)，這樣的自我督促，要求就如同把人的身心當作一件藝術品來捏塑；而現代人也不僅僅是「發現」自己、自己的秘密與隱藏的實在，現代人也「發明」(invent) 他自己。³²

另外英國社會學理論家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說法，「現代化」的後果就是所謂「現代性」(modernity) 的確立，「現代性」不僅是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和理性化為特徵，更是包含近代「民族－國家」企圖對人類生活所造成的一種改造，背後有複雜的權力運作關係，通常與啓蒙運動 (Enlightenment)、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公民資格 (citizenship)、理性主義 (rationalism)、法律的形式理性 (legal-rational legitimacy)、工業化主義 (industrialism)、民族主義 (nationalism)、資本主義系統 (capitalist world-system) 等等相結合。³³

再看看國內學者陳芳明對「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性」(modernity) 的論述：

一個具有現代化的社會，並不必然就具有現代性。舉實例來說，一個可以把人造衛星發射到外太空的國家，基本上是具有現代化的能力；但是，這種具備現代化能力的國家，卻相當殘酷地摧殘人權，也相當殘酷地活活餓死數萬人，這就表示它並不具有現代性。更具體而言，

³¹ 轉引自 黃瑞棋 著《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2000，P134

³² 黃瑞棋 著《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2000，p41

³³ 王銘銘《想像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P208

現代化強調的是物質基礎的改變與轉型，現代性強調的是理性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判斷。³⁴

因此本論文所認知的現代性，主要指理性思維與價值判斷。

二、本土性之初探

對於詩、散文、小說的分類，筆者曾對這一議題思考過：如何以淺顯的字眼，簡明的比喻做出一適當、貼切的說明。勿令一般讀者有所謂詰屈聱牙的困境，更忌在說明中有古注今疏的現象出現。嘗試說明如下：

詩：用顯微鏡觀察事物，透過顯微鏡的視角描寫。

散文：以肉眼觀察事物，透過肉眼的視角描述周遭。

小說：以顯微鏡、肉眼、望遠鏡交錯觀察。亦可以魚眼鏡頭、變焦鏡頭，各種視角交互觀察事物，描繪所聽、所見、所聞、所知、所感…。

這一分類或許仍有其局限或不足之處，但三者之區分應有一淺顯易見之區隔。究其主因乃在說明當中與現今生活、現今環境作一連結。在學術專業分工愈細的今日，分工愈細密則學科之間的隔閡愈甚，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學界與非學界，猶如用文字築下一道萬里鴻溝。

西方的科學、知識的傳入，原原本本的輸入絕非上策，對於本地的土壤、氣候、溫度、民情風俗作一評估，適合國情，融入在地文化，那新的概念、現代的科學才能紮根，更能長久。《世界文化史》中希臘史上提到雅典人的活動範圍：

1：與今天盧森堡國一樣大。

2：直接講 1200 平方公里。

3：台北縣、宜蘭縣、基隆市加總一般大。³⁵

³⁴ 陳芳明 著《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出版、2002、P296

³⁵ 盧建榮 著《從根爛起》台北、前衛、2002、P183

上述三個答案都對，但第一個答案是英文原書上的說法，是英國史家說給其子弟聽。第二個答案是實際正確的知識，反不如比喻有用。第三個答案經本土化、轉化後應是最適合我們的，科學研究的目的、文學研究的方針應是讓複雜的事物出現它樸素的單位原型。而其中最佳的媒介應是一本土化。

我們首先來看殷海光對本土化的見解：

一個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衝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應，叫做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

本土運動有兩種：

一種本土運動是向後看的，……內容是延續性的主位文化崇拜，……帶有排斥客位文化的傾向。

……這種保守運動，一旦與民間的小傳統結合，便可具狂熱的宗教形式，……。

另一種，是向前看的，……吸收式的，把舊的文化因素中之有價值者與所需要的新文化因素作一適當整合。³⁶

再從愛爾蘭的例子來看：愛爾蘭和英格蘭對抗七百多年。直到 1880 年代，一群有覺醒意識的文人，開始展開愛爾蘭的文藝復興運動。他們去挖掘愛爾蘭的古老傳說，神話、古代英雄事蹟，以詩歌、戲劇、傳說故事等方式去闡述愛爾蘭的特性、型塑愛爾蘭的文化想像，追尋愛爾蘭的文化認同，這股力量最後創造了愛爾蘭社會的主流價值。而這種「主流價值」的形式，必須、必得來自共同的歷史記憶、生活經驗與土地情感。官方想形塑的主流價值，如果沒有根植於人民所成長與孕育的土地，最後一定會被人民唾棄或強力抵抗。

³⁶ 殷海光 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上冊，台北，文星書店，199，P184，302

從上述的四則例子印證：本土化，不悖離多元化。而所謂的多元化、本土化的主張，不是口號，更是趨勢。³⁷奈斯比在《文化國家主義》中提到：

「當世界愈來愈像地球村，經濟也愈來愈互賴時，他說，我們愈來愈講求人性化，愈來愈強調彼此間的差異，愈來愈堅持自己的母語，愈來愈想要堅守我們的根及文化。即使歐洲由於經濟原因而結盟，我仍認為德國人愈來愈德國，法國人愈來愈法國。」³⁸

全球化的潮流中，同質化與異質化是並行不悖的二條主軸。異質化就得有自身之特色，而本土化正是其重要基石。尊重不同文化的前提下，本土的資源與長者的智慧才能順利傳遞給下一代，從而豐富在地文化的特色，才能圓滿自足的發展，進而豐富在地居民的生命經驗。因之我們可說本土化本身並不停滯、退縮，也不冒進、盲動，只是必然具備冷峻、凝視現實的能力。³⁹

三、現代性與本土性之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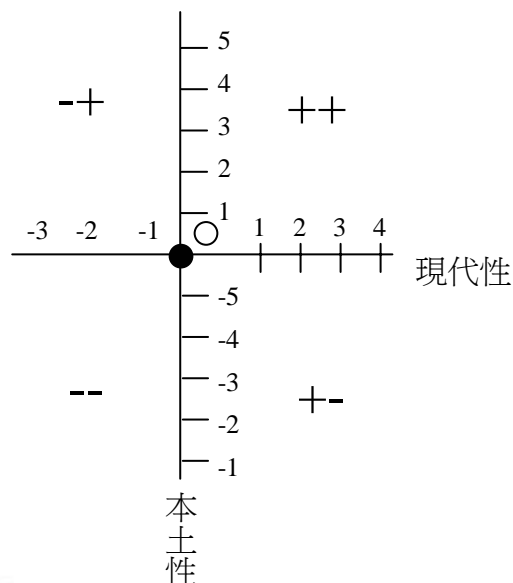
若將本土性這一主題當成一縱軸，中間點為零，零之上依序為 1·2·3·4…；同時地零之下依序為-1、-2、-3、-4…。零之上之正數，指的應是本土文化中積極的一面，它可能是一般庶民的生活習慣，可能是風俗，可能是信仰，它更是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精神堡壘。因為可以此來對抗殖民統治，保存自己文化的根。在零之下之負數，指的應是本土文化中的落後質素，這樣的落後文化當然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

³⁷ 林文寶 著《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2001，P302

³⁸ 轉引自林文寶 著《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2001，P301

³⁹ 彭瑞金 著《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199，P288

而在本土文化中，又如何界定它的積極性與消極性？首先必得先確認的是該項本土化活動的對象—人，這個「人」是無膚色之分，無種族之偏見、無階級之區別。也就是該項本土性活動是否能在以「人」為主軸的



架構下以庶民為主體、以眾多百姓之生活訴求為依歸。在理性思考的前題下區別出本土性的積極性與消極性。

再嘗試將現代性這一主軸畫置成一橫軸，中間為 0（原點），零之右依序為 1、2、3、4…，同樣地在零之左方依序為 -1、-2、-3、-4…。現代性這一主軸乃是某些不同歷史過程在特定歷史狀況裡一起作用所構成。這些過程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現代性」…是這些力量和過程的總和，沒有那一個所謂的「主要過程」就足以產生「現代性」。⁴⁰它可能包括現代化世界的科學與工業、現代文化的進步與開發、現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在現代性這一橫軸中正數與負數又如何區分呢？與前述本土性一樣在理性的思惟方式下，以人為主軸，無分膚色、無種族之偏見、無階級之區分。以庶民為主體，以眾多百姓為依歸來作區隔。當其作為對殖民者，被殖民者均蒙其利，則歸於正數，當該項措施對庶民長遠而言百利而無害，執政者卻排斥抗拒，甚而隱而不提則擬之歸為負數。

當把本土性之縱軸，現代性之橫軸兩條軸線以零點並置後會呈現出如附圖，在該圖形中由橫軸（現代性）、縱軸（本土性）之零點（原點）交會後產生區隔四個區塊，在數學上稱之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⁴⁰ 邱貴芬 著《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P74

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分別是：(++)、(-+)、(--)、(+ -)。

第一象限(++)：在這一區塊中現代性的指標是正數，代表著現代化世界的科學與工業的引進。現代文化的進步與開發；在本土性的縱軸上亦是正數，表示它是本土性中的積極面向，良好質素，不但值得保存，更得發揚光大。現代性的正數與本土性的正數代表著殖民者，被殖民者的正向肯定，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均是樂見其成的。

第二象限(-+)：在此一區域中，現代性的指標是負數，雖然現代性是理性的延伸，是理性的思考與價值判斷，但施政者故意隱而不提或排斥抗拒這樣的作為，對全民來說亦是負數。在第二象限中本土性的屬性仍是正數，積極的面向、知識份子極欲彰顯的精神堡壘仍是這一區間的特質。第一象限的(++)，使得殖民者、被殖民者是樂見其成、現代性與本土性相輔相成。第二象限的(-+)，當優良的本土質素碰上現代性中的殖民者隱而不提的議題，會衝撞出何種火花，在本篇章中將以《浪淘沙》中的小說人物之際遇來探討。

第三象限(--): 在這一區域中現代性軸線代表著殖民者隱而不提或排斥抗拒的議題，本土性的縱軸代表著本土文化中的落後質素、社會發展的障礙，當這兩軸線拉扯與對撞之後，又有怎樣的效應產生，筆者擬以《浪淘沙》中的小說人物親身經驗來解析此一現象。

第四象限(+ -)：在這一區間中，現代性的正數與本土性的負面質數相

交會。循著理性前進、進步是一定的嗎？負面的本土質數無發聲、發言的空間下，這種躍進對庶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嗎？亦或踩著百姓的肩、背，令統治者前進？邊緣位置的小民是短空長利，亦或長期被當成壓榨之對象？剝削之主體？

第二節 周福生與本土化之連繫

台灣社會的本質是個移民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較為快速、傳播亦較普及。回溯 1895、1945、1995，每五十年作一比較可發現各種觀念、作為之改變是令人驚訝的。不論在男女平權、環境保護、弱勢族群、消費概念…，以女性裹腳為例：1895 乙未之役時，台灣婦女纏小腳之風仍是普遍，經五十年的觀念更迭，1945 年時台灣婦女之裹腳風氣已少之又少。到 1995 年纏腳婦女更可能如鳳毛麟角更可說已是「歷史陳跡」。一項風俗、習慣的改變，當執政者並未以強力的政策硬性主導時，其改變最重要的應是「觀念」的更迭。「觀念」的更迭因素可能有教育、社會、政治…等。但其中一項不可忽略的是從其生存本質激發出來的。當嬌貴的小腳是尊貴的象徵，是階級的表徵，那裹小腳當然是盛行。當裹小腳影響到出外之行動、受教育的不便，自主性的局限，那逐漸式微必是趨勢。當裹小腳已變成一種「遺跡」只能在文獻中，照片中，影片中覓得時，這樣的現象（裹小腳）在現實生活中就不太可能再出現。這個例子可說明本土化的過程中，它是向前看的、是吸收式的、是去無存菁的，改變的時間不算短，在自然、平和的氛圍中，留下優良質數、去除不必要的習俗。

《浪淘沙》中典型的移民人物—周福生。他是個木匠，在福州出生，十五歲隻身渡海到台灣謀生，由學徒到木匠師父，接著又開了一家木器行。並娶了一位基隆的女子謝甜。因父喪回福州奔喪，返台時剛好碰上 1895（光緒二十一年）「台灣民主國」成立，兵荒馬亂之際，雖然福生的母親與親戚勸他留在福州，別回台灣。但周福生堅持既娶妻就得與妻白頭偕老，豈可脫逃，不顧妻子死活。從廈門搭船回台灣的過程，目睹船公司對未買票旅客之酷刑—將人的辮子吊在甲板上的蓬樑，隨船身的搖動而呼天哭地。周福生嘴裡雖詛咒著，最後也代付船票解決了問題。船長雖想歸還給周福生那四塊銀元（船票錢），但周福生卻推回那銀元說：「漢人雖賤，也不是每個漢人都賤。要坐船就要買船票，這是你們公司的規則，一個人也不能例外。這錢你拿去，我

絕對不收回。」從這兩件事例可以看出周福生是一位有自主性、生命內在有嚴格分際與要求的一位庶民。

本節擬從《浪淘沙》中理列出周福生在這一動盪的時局中，現代性的思維與本土性的執著：

一、 民族氣節的堅持：

周福生不為「台灣神社」釘一只鐵釘或鋸一塊木頭。雖然日本的菊池巡佐開出比平常多三倍的工錢，周福生不為所動。其妻謝甜更對他說他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周福生仍堅持「不愛替恁做工」⁴¹。

面對殖民統治者，必得靠自己。惡不會自滅，得救，必需靠自己。自己不救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周福生堅決的拒絕，是人性之最高美德。反之若向現實利益妥協、向金錢妥協、向權勢妥協，一個向有利者妥協的社會，只會讓小百姓變得更無力。

二、 大男人主義：

周福生與日本人之訴訟，當收到周福生無罪之判決，拿二十塊銀給其妻謝甜欲辦酒席宴親友。不料謝甜扣了大半當「私額錢」。周福生見不怎豐富的菜餚，勃然大怒，雙手一掀，把整張飯桌都給翻了。謝甜抽噎地說：「你若沒愜意，只為你加我打，那著在眾人面前掀桌糟踏人…」周福生用姆指反指自己：「我大丈夫男子漢打你一個綁腳查某人？小人！」⁴²

⁴¹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前衛，1992，P265

⁴²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前衛，1992，P271

周福生這種大男人主義的思考與動作在此一事件中表露無疑，一家之主的威儀更是無人能撼。在日據時代這種作風極為普遍。但「打某」這種行徑，在周福生理性的思維中仍是否定的。東方白對自己文化中封建保守性的批判，並不下於對日本殖民主的抨擊。這正符合了《逆寫帝國》所述：…屬於現在的混雜性，是恆常地努力於把自身從強調傳統及重視「純淨」(Pure)，而貶抑其相對的「攙合」(compose)的過程中，解放出來的。它以空間上的多重性 (spatial plurality)，取代了時間上的線性 (temporal lineality)。⁴³

三、固守土地不輕離：

周福生子周台生偕夫人想去南洋作生意，雖說「過蕃有一半，過台灣攏無看」。⁴⁴赴南洋的危險性並未高於台灣的黑水溝，但周福生更在意的是他的大孫一周明德。正如周福生所言：「…明德是造姓周，不是造姓姚，恁沒權利加我取去南洋…」。⁴⁵因之毅然決然到福州去帶他的大孫，完成「你子換我子」。

周福生本身也是從福州移民到台灣，胼手胝足深耕數十載才紮根於這塊土地，何以周台生欲赴南洋開創土地周福生卻不是那麼支持？究其原因：1.周福生之移民經驗，了解開疆闢土之艱辛。2.周福生本人在台灣已有一番局面，從學徒、師父，再自己開店，一家溫飽，無庸煩憂。周福生的現在之根與未來之根都緊緊地接連起來。不管在子女意見與傳統見解的激盪之間，在現實生活與理想社會的折衝之間，不但不易被撼動，著根愈深枝幹粗茂，視野亦隨之擴大。

巴巴 (Bhabha) 堅稱被殖民者是構設於殖民主義的癱瘓主導話語的，指定的一個腐化的本土人口，以合理化其侵略及接續而來

⁴³ Bill Ashcroft 等 著《逆寫帝國》板橋市，駱駝出版社，1998，P38

⁴⁴ 施淑青 著《行過洛津》台北市、時報文化，2003，P7「番」指的是南洋，閩南人渡海到印尼、馬來西亞、暹羅，有一半人還回得了家鄉，過台灣的幾乎沒有回得去。

⁴⁵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前衛，1992，P415

的統治。⁴⁶以外來殖民者的角度，往往把他們占領之前說成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事跡、沒有任何成就。對殖民地現在發生的事物構設出負面的話語。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我們更得用與殖民者不同的視角來看待，解析這些人、事、物，所以周福生的「你子換我子」，站在周福生的立場、站在周家的思維，我們是可以理解：當日本殖民者以封建或任何負面的話語描述這種作為時，周福生正站在相對的立場以來台第一代的立場來看，好不容易渡海來台有了自己穩定的工作，足以溫飽；有了自己的店面，足可撐起一個家。生存本質的追求是移民目標，更是生活的重心。當擁有這些後，兒子周台生卻無準備、無預警地要跑到南洋-----一個充滿變數的地方去。周福生固守已經擁有的生存本質的信念，家上長孫周明德的回台，讓周家家族的根基更為穩固。如此周福生移民的努力不致中斷，周台生與台灣的聯繫不僅是父親周福生，「你子換我子」後更多了一個周明德。因之「你子換我子」在日本殖民者眼中可能是不良作為、更可能是封建。但細查周福生的移民經驗、生活作為，卻更可理出來台第一代移民對自己辛勤耕耘的珍惜與對這片土地血汗灌溉下扎實著根之用心。

四、向殖民者據理力爭，不屈服權威：

周福生因關心孫子周明德在日本航空隊的狀況，每日數著每日從空中出航的飛機與飛回的飛機架數，遭密報觸犯「散播謠言罪」而被抓。在檢察官審問過程中，周福生理直氣壯地回道：「你知影伊是日本的航空隊，在飛飛機啊，我當然也著關心飛機，毋才每工攏在算天頂的飛機，算天頂的飛機也犯罪？我吃到今年七十歲還不曾聽見。」⁴⁷最後檢察官看周福生坦率，特別又查證他的孫子加入日本航空隊是事實，躊躇了幾番，終於把筆一勾，撤銷了原告，不給他起訴了。

⁴⁶ Bill Ashcroft 等 著《逆寫帝國》板橋市駱駝出版，1998，P193

⁴⁷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1669

周福生的對於別人汗巖的抗拒，可說是改寫了台灣庶民怕官、怕死的本土風貌。對汗巖的抗拒，其實就是對殖民者的批判。因此，捨棄自己的文化主體，而迷惘在殖民者的統治氛圍中，絕不是周福生所認同的，更不是東方白筆下所要形塑的台灣堅毅庶民。

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把殖民地的奴隸狀況診斷為「亦步亦趨」的症候。法農認為，主/奴關係培養出一種新的，使人喪失創造能力的不滿與怨恨，奴隸對於主人既充滿嫉恨又充滿羨慕，他要變得與主人一樣，因而比黑格爾的奴隸更少獨立性。黑格爾那裏，奴隸尚且力爭脫離主人而走向獨立。在法農這邊，奴隸趨向主人，想要取主人而代之。這種對於主人的嫉羨交加的心理使得奴隸注定成為衍生性的存在，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解放，而恰恰是創造性的喪失。⁴⁸

周福生無畏於殖民者肅厲的統治下，直誠坦率地訴說著「數飛機」的來由，未如法農所言：對主人充滿嫉恨與充滿羨慕，…而少了獨立性。這個獨立對周福生而言就是自主性，不用「亦步亦趨」、卑躬曲膝。最後檢察官不起訴，周福生的作為彰顯本土文化中的積極面，更使東方白《浪淘沙》的人物本土性代表未被殖民主義所污染，更深化了本土性人物的自我與再發現。

上述四例：周福生不為「台灣神社」釘一只鐵釘或鋸一塊木頭彰顯了周福生移民之根與台灣安身立命之根已緊緊地接連起來，盤固成堅石的本土根群。這樣穩定紮實的本土根群意識在與日人訴訟獲勝的狀況下，大宴親友，卻因妻子的私扣「私額錢」而掀桌表達忿怒。也直顯出了本土傳統文化中對女性的不尊重，傳統大男人主義的特質，在本土性與現代性的激盪軸線座標中應歸於：本土性的傳統代表，深具本土化之優良質數，但不可否認在現代性觀念的映照下，仍有待改善、去除的習慣與空間。

再回看第三例：「你子換我子」。對於周台生欲往南洋之否定，是

⁴⁸ 轉引自陶東風 著《後殖民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2000，P22、23

否表示著本土性與開創性之衝突？與現代性之背離？星光的燦爛是不是也該映照腳邊的土地，先進、前衛的風潮論述更得尋覓適切的立足點；在本土關懷的細緻過程中應可貼近國際變化，褊狹之所以褊狹最大根結在於著根不深，容易隨風搖晃，著根未沉不易抓隱根基，邁向自己的方向。因之周福生反對周台生赴南洋創業而想出之「你子換我子」，重點在於對腳邊土地的關照、子嗣綿延的尊崇，畢竟有再開闊的眼界與作為，沒有了土地、子嗣，那一切不都是空談嗎？周台生有再宏偉胸懷與論述，未能站穩立足點，一會兒台灣、福州、南洋，如侯鳥般的飄忽，那的確每一處都是異鄉、每一處都是邊陲。未著根的樹木，磐根未固，何來茁壯、枝葉茂密呢？「你子換我子」的作法，是否在本土性的堅持中與現代性背離了呢？現代性的作為與推展不應只是在乎其正確性的強弱，更得關照與本土性間的融合度，注意施展過程中的先後順序。周福生不為周台生的滔滔論述所動，可說在現代性與本土性的雙軸下，找得本土性安身立命的生命軸線。

當帝國殖民主義的中心勢力強加於邊緣（周福生的庶民生活）；使其失去秩序及欠缺真確性，…明顯地，必須棄用中心的支配性，及其認可的經驗，「邊緣」的經驗才可以完全地有效化。⁴⁹周福生不為「台灣神社」釘一只鐵釘或鋸一塊木頭，與日本人之訴訟、面對日籍檢察官的坦率，均印証了棄用中心的支配性，不理菊池巡佐的威脅利誘，不畏日本商人的無理取鬧、不懼日籍檢察官的威勢審問，最後「邊緣」經驗才可以完全地有效化。不為「台灣神社」釘一只鐵釘，最後菊池巡佐亦無可奈何。無理取鬧的日本商人訴訟失敗後亦知難而退，周福生的坦誠以告使得日籍檢察官以不起訴作終結。處於「邊緣」位置的周福生，未讓「中心」的作為及意念，無限地推延，其實現實並沒有「中心」，正如沒有不經中介的先事實一樣。假使語言可以構設世界，那麼邊緣亦是中心，也許會根據常規、期待及經驗的不同模式，而重新構設。⁵⁰周福生的習慣常規、生活期待及庶民經驗的確重新構設

⁴⁹ Bill Ashcroft 著《逆寫帝國》板橋市，駱駝出版，1998，P96

⁵⁰ Bill Ashcroft 著《逆寫帝國》板橋市，駱駝出版，1998，P98

出了異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本土性的良好質素。

第三節 丘雅信跨地域·跨性別之特質

光緒二十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以武力佔據台灣，遂在其殖民統治下，施行其奴化教育。到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1944），日台人共學學校，國民學校校數計一五五校，學生數台胞（筆者認為用「台人」較適宜）男二九四八八人，女二〇九八八人；日人男二五五一四人；女二五〇八五人。而單為台胞（筆者認為用「台人」較適宜）所設立之學校學生數計：一九二七四八八人；其中男一〇四五〇四人；女八八二四四人。在中等學校教育方面；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1944）計校數二二校，學生數一五一七二人；其中台灣同胞（筆者認為用「台人」較適宜）七二三〇人，日本七八八八人。⁵¹

在國民學校日台人共學學校看似日台學生數接近，但在台灣之日本人與台灣人人數相差是懸殊的，因之受教育的差別待遇是明顯的。在單為台灣子弟所設的學校學生數有一九二七四八八人，男一〇四五〇四人，女八八二四四人，男女比例可說是相當接近，可以說日據時代國民學校的教育日本人、台灣人是具有差別待遇，但在普及性，男女就讀的比例上是具有廣度及平均的。

但一到了中學教育日台之間的差異就更加顯著了，台灣子弟眾多學子中到民國三十三年（1944）中學生數七二三〇人，日人有七八八八人。兩者總人數相差懸殊下，日人中學生人數到日本戰敗前猶多於台灣人，在中學教育這一環節更讓日本人殖民統治的面目彰顯無疑。日台之間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已讓台灣同胞（筆者認為用「台人」較適宜）深感不平。另外站在男女平權的教育觀來檢視中學教育：日人在台灣創設女子中學，始於士林之日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本科女子部，至光緒三十一年（日明治三十八年、1905），改為中等程度之女子學校，光緒三十四年（日明治四十一年、1908）移至台北艋舺。直到民國二十七年（日昭和十三年、1938）才准許台灣同胞（筆者認為用「台人」

⁵¹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1990，P592，594
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

較適宜)創設私立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淡水有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台南有私立長榮高等女學校。⁵²《浪淘沙》女主角丘雅信在這個女子中學校剛起步、萌芽的階段受業於「淡水女學」，接受現代知識，揭開繽紛五彩的求學歷程。丘雅信的恩師金姑娘常提及雅信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台灣「五十年培育出的花果」⁵³。站在台灣的角度更可以說雅信是台灣在日治時期苦難的環境中突破日本政府重重的設限，層層的壓迫下所孕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她質樸的本土個性加上受教育而漸深漸廣的視野，因而造就爾後的「台灣第一位女醫生」。本節擬以丘雅信為主體，以現代性與本土性的角度來探究丘雅信不凡的一生：

一、「台灣成長、求學」期間

連雅堂《台灣通史》卷四《獨立紀》記載台灣史最沈痛的一章；起於「光緒二十年（1895），夏五月朔，台灣人民自立為民主國，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終於「台灣民主國亡」。短短五個月的時間，台灣民眾打了大小一百多仗，掀起「村婦佐磨刀，耕農自裹糧」的全民保衛鄉土的戰爭，同仇敵愾，抵抗了日本侵略者三師現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支援艦隊，犧牲慘重。⁵⁴丘雅信的父母林之乾、許秀英就在這「村婦佐磨刀，耕農自裹糧」的動盪時代中結為夫妻。丘雅信六歲時，繼父丘元家為了讓她念一些漢文，便送丘雅信到王秀才的「摩詰書房」跟王秀才學漢文。雅信八歲時收到台灣總督府發的一張入學通知單，叫雅信到剛建好不久的「大稻埕公學校」入學上課，丘雅信父母商量結果認為日文近年已慢慢通行，在「摩詰書院」既已學得一些漢文，再唸多也沒用處，況且鄰居已經有人把孩子送去公學校唸書，於是雅信就隨俗地到「大稻埕公學校」唸書了。在班上有三十幾個男孩子，女孩子連雅信只有兩個。

丘雅信從「摩詰書院」到「大稻埕公學校」的求學過程，看似平凡卻隱含了不凡的特質在內。在那個時代不但坐個火車是奇特的經

⁵²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1990，P594，595

⁵³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1107

⁵⁴ 轉引自 林瑞明 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市，允晨文化，1996，P88

驗，連看到火車都有異樣的情懷：

「我有聽人安倪講，但巡撫為什麼欲將火車頭搬來台灣，火車敢不是在唐山駛得好好的？」

「講到恁唐山人，上界迷信啦，本來恁有一條鐵路，聽講是由吳淞到上海的，已經全部鋪好丫，第二天就欲通車囉，彼一晚，一割人就將鐵路挖挖歹，講什麼彼鐵路下有一隻龍，火車若駛過，會加龍輾做兩段，彼時就有天災地變。就安倪講，你哪會知影？」

那鄉下人聽了，張大眼睛，也彷彿感染了唐山人的那份恐懼，不敢再問下去。⁵⁵

《浪淘沙》中鄉下年青人坐火車的經驗，從「真心色」，到感染唐山人的那份恐懼，的確顯示了日治時期台灣百姓對現代化之迷惘，對現代性觀念的闕如。火車的通行，象徵現代機械文明入侵到偏遠小鎮，衝擊到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村人在心理上或行動上極力抵抗。縱使最後悲劇英雄孟昭有慘烈的叫聲再驚人也淹沒在巨大的汽笛聲中。⁵⁶

如果火車是現代化的代表，那台灣百姓的恐懼不安便是對理性思惟的惶恐；如果汽笛聲是新時代的開啓，那〈鐵漿〉中孟昭有的頑強抵抗便是對價值判斷的非理性表現。這兩種負面質數並未發生在丘雅信的父母身上，雖上「摩詰書院」學習漢文，告一段落後也願送丘雅信上日本人所新設立`的「大稻埕公學校」，在時代的洪流中可能是順其自然，可能略帶無奈，更多的成分應是對教育的肯定，丘元家與許秀英在自然的氛圍中為台灣第一位女醫生鋪陳出寬廣的道路。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國民學校教育方面在普及性上具有相當

⁵⁵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40

⁵⁶ 朱西甯 著〈鐵漿〉收錄於許俊雅、應鳳凰、鍾宗憲編《現代小說讀本》台北市，揚智文化，2004，197

的廣度，但到了中學卻有了明顯的差別待遇，台灣人欲上中學少之又少，女子上中學更是難上加難。在丘雅信十二歲時適逢淡水教會附設的「淡水女學」開設，丘雅信父母贊成唸書，丘雅信對唸「淡水女學」更是執著而堅定。⁵⁷「淡水女學」的學習生活開闊了丘雅信的本土視野，更是將丘雅信的胸懷放諸四海的重要轉折點。

丘雅信雖在幼年失去生父，但繼父無微不至的照顧，豐沛的家境加上對教育的支持，成就丘雅信的自信，這份自信連日本人菊池巡佐也喜歡她，更因多次的說情而贏得「小救主」的稱謂。「摩詰書院」的王秀才對丘雅信的聰慧亦是讚譽有加，「大稻埕公學校」老師大苗先生對丘雅信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這樣順遂的成長學習過程，深深影響了丘雅信的一生。法農曾說：「所謂文化，只不過是白色的面具而已。只有黑皮膚才是他的生命的實相。」⁵⁸因為順遂而使丘雅信面對日本人、台灣人均能自信而理性，更因教育而成長使丘雅信面對殖民統治、現代性能爬梳而清晰。未曾因固守本土性而顧此失彼，未曾因執著現代性追求而遺落本土根結。丘雅信對日本殖民者的態度未採完全的敵視態度，應可說是理性的合作，智性的抗拒，歸結起來跟丘雅信順遂的成長受教育有相當大的關係。丘雅信父母所撒下教育的種子（「摩詰書院」、「大稻埕公學校」、「淡水女學」），雖未達成熟的狀態，也可稱得上是青澀的成熟狀態了。

二、日本「女子醫學大學」期間

丘雅信完成「淡水女學」的學業後，因學業優異再經金姑娘的協助，順利申請到東京女子醫學大學。雖母親反對，但想起兩個因肺病而逝世的父親，假如她是一位醫生，這些不幸的事或許可以改變，因而更堅定了她的意念，再經金姑娘的協助說服母親，母親最後終於首肯，在離家赴日時，鄭重其事地交待：「你若不愛給老母煩惱，上好不通去跟人插政治，千萬不通去反對官廳……」。這是日據時期明顯的庶民想法，更是今天很多台灣民眾對政治事物疏離的普遍觀念。丘雅信帶

⁵⁷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274

⁵⁸ 弗朗茲·法農 著《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P14

著母親的千叮嚀萬吩咐，踏上了日本的國土。

初次到日本，火車上看到日本老翁對富士山的崇敬：「真難得！真難得！富士山終於被我看到了，我這一生死也沒有遺憾了！」在電車上的車窗鮮麗奪目的廣告紙，都是一些新書的廣告。車廂裏不論男女老幼，幾乎都是人手一冊，垂著頭，聚精會神地在看雜誌或袖珍小書，初到日本衣、食、住、行均不習慣，更得面對周遭異樣的眼光，克服周圍歧視的問題。「你們還割人頭嗎？」「你們那一族的男人還到山下去割平地人的人頭嗎？」隔壁用揶揄調侃的聲調唱著：「清一國一奴一啊—，清一國一奴一啊—…」，丘雅信除了忍耐也只能簌簌地滾下眼淚了。

在廣浩的世界中每一片土地皆具有該土地應有的生活味道，日本的富士山對日本百姓而言是神聖的，不可褻瀆的。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同時也滲入了這種神聖不可侵、神龕式的文化優越感。當時絕大數的台灣百姓在烈日下，頭戴斗笠，短褲草鞋，爲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而奮戰，在無奈的宿命下這種日本殖民式的文化優越感就在顯著的差別待遇下一點一滴的滲入台灣庶民的腦海中。初到日本的丘雅信初次聽聞日本人對富士山的尊崇並未有特殊、異樣的情懷或激動。衣食不缺成長順遂的雅信原有一份從容、自信，再加上受教育的歷程，優異的成績更多了一份智性的理性。再看到電車車廂裏人手一冊的聚精會神的閱讀，丘雅信同樣地將這些印象存入腦海。她的從容、自信可以慢慢消化這些日本文化，她的理性更可以慢慢爬梳這些異文化。但是從容、自信或許可以解決某些問題，理性或許可以消解某些疑惑。周遭同儕的互動甚至歧視眼光卻不得不直接面對—「你們還割人頭嗎？」「你們那一族的男人還到山下去割平地人的人頭嗎？」日本政府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現代化從來就是以日本人的利益爲中心，資本主義不斷擴張，台灣人就不斷被邊緣化。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的丘元家（丘雅信繼父）提供了一個不虞匱乏的生活條件空間，使得丘雅信可以順遂成長，幸運受教育，更可以自信地與菊池巡佐互動，深受大苗老師的厚愛。優渥環境植栽出的自信，在台灣殖民體制

中尚有相當抗體，但一到日本本土，種族歧視益加嚴重時：日本人、台灣人仍是不同的。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印象仍是割人頭，這正如歐洲人把占領殖民地之前的歷史說成一片空白，沒有事跡，沒有任何成就。其實如果單單是一片空白，稱得上還好。日本殖民者不但在台灣禁報紙中文欄（1937），推行皇民化（1938）運動，更將台灣本土一些的不良文化質素在日本渲染、擴大，以拉大二者文化上的差距，形塑日本本身文化上的優越感，穩固日本本國殖民統治的位階。丘雅信在台灣的從容、自信，一到日本面對這種歧視性的問題當然也不得不憤然立起，離桌而去，躲進她自己的房間，暗暗的哭了。⁵⁹

托爾斯泰在他逝世的那一年，也曾對台灣說了幾句話，這些話就在《托翁之終年》這本書裡出現，就在1910年六月十三日那一頁下，Bulgakov 這樣記載著：

……我最近在大英百科全書上查看有關台灣的資料，你們知道台灣是什麼樣子嗎？台灣是日本人不久之前才佔領的一個海島。Konisi 經常去台灣，他告訴過我很多島上的事情。你們想想！那島上還有吃人肉的事情！……⁶⁰

台灣原住民曾有出草的習俗或文化，但那是台灣文化過往諸多面目之一，但由日本人對外發言，上述托爾斯泰對台灣的些微認識是「吃人肉」亦或「食人族」，這是多令人痛心扼腕的事啊！台灣的事情不能由台灣人親自對世界上的人說，卻必須由從前的荷蘭人，過去的滿清人、日本人去對外說，這的確是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人擴大渲染台灣「割人頭」、「吃人肉」的事，正如帝國主義對語言的控制，帝國化的教育制度，把都會語言的「標準」版本，設置為典範正統，使其他一切的「變種」(variants)，皆被邊緣化為駁雜

⁵⁹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454

⁶⁰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497

不純。⁶¹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語言上如此，文化、習俗上亦是如此，無時不刻將台灣推向邊緣化，推向駁雜不純之位置。這樣的過程與「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有異曲同工之妙，「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學者，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語文學家編出來的一個以歐洲中心主義的故事。⁶²殖民宗主國不論歐洲、日本，殖民統治不脫其經濟殖民，文化上、教育上更逐漸建構出其文化優越的假面，連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夾雜著壓制的面項，欲使本土文化改變，迫使本土文化落入次要文化或落入遺忘。

三、返台「執業醫師」期間

丘雅信完成日本醫學院學業返台服務，她是台灣第一位女醫生，更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優異而特殊的身份回台服務，一串串的困境待她開拓。求學期間曾回台休養、探親，因船公司的陰錯陽差，將丘雅信與男同學（紀家寶）安排同艙，紀家寶的反應：「衰屑！跟查某人住同間，真一衰一屑！」⁶³，丘雅信的內心更想著，做女人是多麼不幸啊…。在台中屯仔腳執業期間遇上大地震，救難人員只救男的，一知道是女的調頭就走。丘雅信台中屯仔腳執業時台灣男女不平權的現象是常態的，是普遍的。縱有醫生的身份，屯仔腳流氓搗亂醫院時也說：「也有查某人做醫生的哦！生日調也不會看過。」面對這樣男女不平權，極度歧視女性的社會，丘雅信並未挺身而鬥，她努力於她的醫學專業、致力於窮人的醫療改善。丘雅信未以匹夫自許，專業的背景加上理性的態度成就她大丈夫的作為。

人類文明的推展中，依賴的是反省與智慧。智慧需後天沈潛的學養與人生歷練方能換得。豐厚醫學背景的丘雅信，面對產婦家屬餵食孕婦香灰求平安是歎了一口氣，對家屬要她身上釦子以求平安，丘雅信更是大方從容地剪了鈕扣交給農夫。這種對台灣本土庶民習俗的尊重，讓丘雅信獲得了更多的敬重。在許可範圍之內，不違背自身理念

⁶¹ Bill Ashcroft 等 著《逆寫帝國》板橋市，1998，P8

⁶² 張京媛 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市，1995，P53

⁶³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534

不違反醫學常理下，尊重弱勢的聲音，傾聽邊緣的心聲，這應是丘雅信的特質之一了。這樣的特質正印証：一個成功的治療，往往建立在醫者與患者之間具有「共享的文化」⁶⁴

四、赴「中、日、美、加」經驗

丘雅信與彭英結婚後到中國蜜月旅行，在上海霞飛路與英租界到處零落著江南江北的乞丐，襤褸百結，更有身無寸布的乞丐，在巷角用錫箔點火吸起嗎啡。同樣的上海富家小姐出門散步遊街動用四、五十人跟著保護，就是怕被人綁票。南洋的橡乳王郭春榮之女郭秋香用一整瓶香水洗手抹面，丘雅信看她用香水之奢侈與闊綽，不免暗暗咋起舌來。

丘雅信欲往哈佛進修，赴美護照被收回只得轉往東京辦理簽證。在東京的「有樂町」發覺每家商店的二樓都懸起國旗，是日本的「日丸旗」、德國的「卍字旗」和義大利的「田字旗」，一律三旗串聯，在風中飛揚。更有人在地上臨時用朱漆與藍漆畫了一大幅美國的「星條旗」，任各人往回踩踏。太平洋戰爭正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日本國內這種戰爭的肅穆氣氛亦隨之可見。女學生縫製「千針帶」，男學生製作「萬力旗」，「相撲力士」列對出操、和尚也做軍事訓練，日本全國上下的男人都得參加軍事訓練。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因「到底上帝大還是天皇大」⁶⁵的問題導致金姑娘被關。太平洋戰爭肅穆氛圍下的日本本土女學生對「天照大神」的質疑，被摑了三記耳光後慘遭開除。⁶⁶

當丘雅信抵達自由光照世界（自由女神）的美國時，同樣地面對太平洋戰爭，美、日呈現出不同的氣氛。在火車上所結識的鄉下退休教師喬治夫妻，喬治太太繡畫功夫一流，房子四面牆壁是刺繡的圖畫。喬治的小房間裡掛著半百個時鐘，有單擺的、有懸錘、有彈簧的、有旋轉的，各式各樣，滴答競鳴，閉起眼睛，彷彿林中落雨一般，看得雅信瞠目結舌。到了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醫學院因全班只有丘雅信一位

⁶⁴ 弗朗茲、法農 著《黑皮膚、白皮膚》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P30

⁶⁵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996

⁶⁶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1040

女士，因之倍受禮遇，連婦產科主任歐文博士也對她愛護有加，體貼入微，種種「優先」的風俗禮節，都叫雅信萬分驚訝，久久才習慣，更暗暗告訴自己：「唉！來到美洲才知影做查某人真有價值，死也甘願丫！」。

由於日本的限制外匯，雅信無法帶足夠的錢到美國，加上愁悶，更不想仰賴福士特一家人。就在金姑娘的邀約下來到了加拿大。雖然金姑娘表示雅信是長老教會在台灣五十年培育出來的唯一花果，大家都急於想見到她，但一碰上 1941 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一切就完全改觀了。「出去！你日本人出去！」一位粗漢對雅信這樣喊者，因戰爭回不了日本，也回不了台灣，只得先找工作，當移民局請雅信到集中營當醫生時，雅信知道要加拿大政府寫一張保證書，證明雅信是「台灣人」而不是「日本人」。

丘雅信這段海外旅遊、求學、流離的經驗，到最後要求加拿大政府出具證明她是「台灣人」而非「日本人」，她的「台灣人」堅持並不是民族主義的推波，而是由挫折經驗的投射；她「本土化」的彰顯也不是國家意識的助瀾，而是因生活經驗的選擇。丘雅信的母親一再耳提面命不要插手管政治的勸戒，雖然丘雅信聽了、信了，也確實做了，但大時代的洪流卻也將丘雅信推回離政治越來越接近的區域。丘雅信「台灣人」的堅持較諸彭英這些留日創辦《台灣青年》的留學生可能慢了數十年，但因為是切身挫折經驗的投射而更顯扎實，她「本土化」的彰顯較諸烈日下的貧農可說是遲到的，但因為是生活經驗的抉擇，加上豐厚的背景知識而更具說服力。

在中國看到成羣襤褸的乞丐與富家女用香水洗手抹面的闊綽，這樣貧富差距極大化的現象是戰爭的波及，是經濟結構所形成的類別。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本土「全民軍事化」是戰爭的影響，是強力的民族主義與文化意符所貫穿的現象。日本偷襲珍珠港前的美國，富裕而優閒的庶民、男女平權觀念的普及，是經濟結構的健全形塑更是現代化概念的深根。加拿大長老教會對丘雅信的栽培與熱烈盼望，是人性善良本性的散發，是現代國家（組織）文化善根的播揚。加拿大粗漢

對日本人的排斥彰顯人類對戰爭的否定。貧富差距的極大化、全民軍事化，富裕而優閒的庶民生活、男女平權的普及文化善根的播揚，對戰爭的否定這些現象與事實一一在丘雅信眼前呈現，逐步在丘雅信腦海烙下深痕。這時候的丘雅信之於現代性應是一種肯定；對富裕優閒的肯定、對男女平權的肯定，對文化善根播揚的肯定。但丘雅信之於現代化也是一種否定；對貧富差距極大的否定、對全民軍事化的否定、對戰爭的強烈否定。

四、綜論

丘雅信幼年生父染病期間逐漸萌長的堅毅特質，到了母親把他送給別人當童養媳，三番二次的跑回家，對年幼的孩童來說距離是問題，膽識也是考驗，她都克服了。這樣的情境令人不忍更令人不捨。生父林之乾兒歌的教唱聲，繼父引以為傲的攜手同行都將愛填滿家庭，將心灌溉雅信。有心的灌溉、有愛的滋潤，雅信的成長自當是正向的。繼父丘元家的地主身份提供了優沃的經濟後盾，雅信得以在男女極不平權的時代接觸漢學，日本殖民政府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使雅信進入新教育的體系、長老教會女子學堂的設立更寬廣了台灣女子學習的路徑。丘雅信的堅毅特質、宏觀膽識加上時代的因緣際會，造就了爾後的丘雅信。愛的種子做肥料，有經濟的後盾當泥土，塑造出了這朵鮮綠、亮眼的花朵—台灣第一位女醫生。

在台灣求學、成長期間，有肥沃的愛、厚實的經濟後盾，丘雅信的生活是自在充實，面對日本人才能自信，隨著教育的成長，自信外更增加一分理性，優沃的泥土加上適當的肥料，使得殖民體制這個蛀蟲未侵蝕這株成長的小樹苗，教育的滴露讓丘雅信的現代性概念日益明晰。這個階段的本土性是飢來吃飯、困來眠的自然，現代性的指標更如東升之旭陽漸露曙光。到了留日期間由於現代醫學教育的追求，對於本土文化中蒙昧的習俗有了更科學的態度與方式（如同姓不婚），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種種譏笑與譏諷，也讓雅信有了自省的機會。深厚的現代性觀念有了本土化的自省，這樣的作為正是當時台灣被殖民的同胞所迫切需要的。留日期間台灣人身份的被鄙視與種種挫折更成為

丘雅信成長的養分，因為日本人對台灣人（文化）的歧視，使得丘雅信回台後更懂得尊重本土文化（剪鈕扣煮湯－壓驚、有給伊轉來做客，沒給伊轉來生子…），醫生的工作有最新的醫學教育背景與宏觀的現代性視野而蒸蒸日上。踏上中國的遊歷、太平洋戰爭下日本本土的軍事化經驗，美國哈佛進修的現代化生活與現代性理念、加拿大長老教會播揚善根的熱切與庶民對戰爭的態度，橫跨太平洋的經驗使得丘雅信對本土性更知取捨，本土性的樹苗更添增了豐厚而多元的養分。視野的延伸，使得醫生身份的丘雅信多了人文關懷、平權概念…現代性的指標之於這時期的丘雅信是具有深度之外還有長度與廣度的。



第四節 江東蘭「殖民性」的跳脫與「現代性」的依循

東方白曾言：「台灣的歷史是苦悶的歷史，而台灣的文學是苦悶的文學。難道這媳婦的血管擠不出一滴公主的血液？難道這邊疆的土壤開不出一朵京城的玫瑰？難道這自卑的怨嗟聽不到一聲歡笑的歌聲？難道這奴才的心胸育不出一絲英雄的情操？」⁶⁷在這樣的挑戰下，根據真人真事形塑了本土性人物周福生，台灣第一位女醫生丘雅信，更創造了在殖民時期特殊而優異的客籍代表性人物－江東蘭。江東蘭誕生在一個不幸的時代，日本殖民體制在台灣已逐漸穩固的時代。幸運的是他誕生於一個民族意識強烈，抗日思想濃烈的家庭。在幸運的背景之下他得以進私塾，上公學校，考上中學，留學日本，在家庭的薰陶下了解台灣人的角色，在鄉土的氛圍中體會被殖民者生活的困頓。在不幸的時代中他得以親身目睹日台不平等的種種措施！學生時代台籍學生的自我壓抑，走出社會體驗台灣各個角落百姓苦、哀、怒、愁的容言。在台灣的土地成長受現代知識教育的灌溉，更加上留日（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經驗的施肥，所孕育出的江東蘭，本土性的作為與現代性的思維是如何拿捏，面對日本殖民體制時他又如何調適，本節擬就此一議題作一分析探討：

一、江東蘭本土化特質

江東蘭成長於湖口鄉邊界的一個叫「波羅汶」的小莊裡。這是一個人口不滿一千人的客家庄，居民都是務農的農夫。這個時間已是烏鴉錦竹城城陷之後，全台的對日武力抗爭已告一個段落。江東蘭的幼年聽著白番公講鳳山的林少貓、阿田伯談大坪頂鐵國山柯鐵虎的歸順，討論最多的是悲劇人物－簡大獅。簡大獅在廈門官廳受審時的供狀：

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惟我一介小民，

⁶⁷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36

猶能聚萬眾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為滿清盡忠的簡大獅，最後滿清竟將其抓給日本人，一目少爺談及總是搖頭，父親江志龍更是對不義的滿清咬牙切齒。抗日的過往，不義的滿清加上「錢銀白心肝黑」⁶⁸的台灣漢奸這些聽聞伴隨了江東蘭的成長也深深地影響了江東蘭的一生。這些在自然氛圍所感受的事件中應該以「最悲哀的簡大獅」⁶⁹影響最大。李喬先生曾在《台灣人的醜陋面》一書中提及：

悲劇的事實中，當事者可以是「悲劇英雄」，也可能是「悲劇布偶」。悲劇英雄是覺悟下的犧牲，犧牲於生命內在的要求，理想主義的絕對堅持。悲劇布偶是死得不明不白—不知死於誰之手，或者不知道為什麼而死，死得心不甘情不願。⁷⁰

一目少爺對簡大獅話題的搖頭無鄙視之意，抽著鴉片的古典秀才談簡大獅更非存心揶揄，簡大獅向滿清求取奧援，或要求指示方針最後不但失望，更是由他希望所托的滿清押解給日本殖民政權。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心不甘情不願，正是李喬先生所說的「悲劇布偶」。江東蘭任新竹中學教師前的某一日穿著短衫和短褲，戴上斗笠，打著赤腳，買了一張二等車票，搭上火車往新竹。當短小的日本人領著車長，質疑這身打扮的江東蘭該坐三等車廂，江東蘭以十分流利的日語回應，令車長和短小的日本人略略一驚。江東蘭固執地回答，強硬的語氣，使得車長期期艾艾的欲驗票。車長吞吞吐吐的態度相對於江東蘭堅決

⁶⁸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172

⁶⁹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171

⁷⁰ 李喬 著《台灣人的醜陋面》台北市，前衛，1998，P83

而清晰的回應，江東蘭生命內在的要求展現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堅持，旁邊的台灣人更爲他翹起大姆指。

當被日軍強征爲軍屬翻譯官，在馬來西亞欲攻打「加美濃高地」過程中，到處可以看到兩兩三三的死屍，或衣或裸，一律都是可憐無辜的百姓，偶兒會有一兩具屍體橫陳在公路上，已被汽車輾扁了，東蘭的汽車也跟著其它的車子一般，再次把他們輾過，令他怵目驚心，垂下頭來，在心底暗暗爲他們唸「往生咒」。無奈的心境在殖民體制下顯露，在戰爭中更爲放大。當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代表輪流用三種不同腔調的英語與小澤大尉解釋、溝通時，東蘭的翻譯，又令大尉頷首表示稱許。但當東蘭與老華人熟絡的談開時，大尉瞪那華人對東蘭怒吼道：「中尉！譯官就該像個譯官，沒有命令，不得隨便與人交談！」⁷¹自覺受辱的東蘭自此消極罷工抗議，沒了翻譯東蘭，大尉猶如沒了嘴巴、沒有眼睛。最後在大澤大尉一臉懇求哀憐的表情，懇切真誠的道歉下，釋然冰解了。

亞里斯多德曾說：

悲劇英雄異於蠢蟲祿囊，他所追求的是人生一個圓或自己真正認同的一種身份，對自我認定的這一個抉擇英勇地以全副生命尋求真正的掌握與完成，無視於外在的撥弄、打擊，也無畏動輒得咎，甚至不惜面對絕望，忍受悲辱繼續徘徊於放逐之國；這樣堅韌的生命不屈從於苦難的壓縮和折磨是無疑近乎堅毅的超人—與超自然的強權對抗，悍然地堅持。⁷²

江東蘭雖非堅毅的超人，但絕不是蠢蟲祿囊。殖民體制所籠罩的悲劇色彩，充塞台灣每一角落、每一百姓。江東蘭雖爲高知識分子亦

⁷¹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1275

⁷² 東方白 著《露意湖》台北市，爾雅，1978，P4

無法避免。他的自我認定雖有無奈，卻是英勇地以全副生命尋求真正的掌握與完成，更無視於外在的撥弄、打擊，動輒得咎，悍然堅持。被強行征調南洋是無奈是殖民體制下的悲哀。在軍事上無視地上死屍，雖強行輾過只能在內心唸「往生咒」自我說服、自我妥協。堅韌的個性不屈從於大尉的怒吼，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戰爭烈火中有無奈的悲哀，有自我妥協、自我說服、有生命真正的掌握與完成，這是江東蘭是有血有肉的江東蘭。

這樣的江東蘭是本土性格的延續，他雖延續了上一代身為被統治者、被殖民者的悲哀與無奈，但這樣的自哀與自憐，質樸依舊的外型，一旦吸收了自我掌握與完成，面對殖民者（日本人）亦是從容自信。這樣的吸收一把舊的文化因素中之有價值與所需的新文化因素作一適當整合，正印証了殷海光先生所言：向前看的本土運動。因為有舊文化（悲劇布偶簡大獅）的前人經驗，在無奈的環境下擔任日軍翻譯，在生命真正的掌握下由面對小澤大尉的怒吼，得以消極罷工，這樣的抗爭是尊嚴的展現，這樣的抵抗是被殖民者的武器。被殖民者的心靈獲得了矯正，獲得了洗滌，隨之本土性亦得以矯正、洗滌，最後昇華。

二、江東蘭現代性之軌跡

江東蘭兒時玩伴水生、春生、秋生在波羅汶村共築了一段美好的兒時記憶，水生的狗小鐵拐因病死亡，在水生的指揮下打算扛上崎頂去埋，一鋤一鋤挖掘中繼之低啞深沈的填土聲音，只見一隻蚱蜢不偏不倚掉到土坑裡，任牠怎麼跳，也老是撞到土壁，始終都跳不出來。春生一味繼續的填土，只見水生撥開沙土捏住蚱蜢，往空中一扔，便見蚱蜢飛向草叢了。春生補了一句：「放你去逃生！」這是江東蘭的故鄉，江東蘭的玩伴。鄉土味的本土，極富感性的本土，當大夥將小鐵拐的墳墓處置妥當，還以石頭當墓碑，慎重其事的由水生為小鐵拐唸「往生咒」，秋生驚羨那麼長水生怎麼記得？水生回答：「要記就會記得」。鄉野的本土，感性的本土，在厚實的土壤中已有理性的概念在萌芽。這就是江東蘭的新竹，守拙的湖口、固拙的波羅汶。

當江東蘭由日本留學回國任教新竹中學，頂著「內地」著名的「早

稻田大學」英語系畢業的頭銜，頂尖的學歷散發著現代、前衛的光芒，鄉親歆羨，連台灣總督府的主任秘書（一谷有二）態度上也由冷漠轉為彬彬有禮。無奈日本伊澤總督推荐的「台北帝國大學」教職，經由一谷有二的種族分類竟變成「新竹中學」教師。無怪乎江東蘭認為這塊土地變了顏色，它被日本人統治著，……他們完全用另外一種眼光來對待故鄉的人，他們不把這些人當成他們的同胞，只把他們當成魚肉般的次一等人看待，在這兩個種族之間有一道鴻溝隔絕著，這鴻溝那麼深且寬……。⁷³江東蘭對自己降格當中學教員餘怒未消之際，面對鄉親的滿足，當作難得的禁鬱、悶氣梗在喉頭，雖想哭，終究沒有哭，心猶如石頭般無聲無息地沈到水底。心雖沈了，江東蘭沒有放棄，畢竟這才是殖民者對留學生江東蘭首次的殖民折練。清一色日本教職員的新竹中學，但由江東蘭的任教自有不同的火花，身為台灣人的校工阿清更坦誠的對東蘭披露他的心語：「江仙，我有一個感覺，你對恁日本仔真順，真有耐性，……」⁷⁴受「內地」高等教育的江東蘭在被殖民者校工的眼中「真順，真有耐性」說得婉轉，卻也道出了台灣人的心聲。難道受現代教育的台灣人只得耐著性子做下去？難道高學歷的台灣人也只能順著日本人，順著殖民體制？江東蘭一點也沒生氣，睜大眼睛望著阿清，一連數日感到鬱鬱不樂。日本同仁的客氣原來是裝出來的，他們的好意原來建立在利用他的基礎上，被同事踩在腳底下，而不自知的感覺，使他感到憤怒。

新竹中學的日子就在江東蘭書房「百忍堂」所散發出的隱忍中渡過。但日本帝國的野心，不放過東蘭的最後方寸之地—百忍堂。侵略的殖民體制借由紅酒凌遲了匾額上的金箔「忍」字，酒液順著「忍」字的刀痕一滴滴像血一般滴了下來。殖民體制下台灣人的無奈，庶民的無奈，高知識分子的忍最後亦得認命，更得屈從—被迫參加皇軍的「聖戰」。擔任日軍軍屬—翻譯官的江東蘭在馬來半島見識了英國殖民宗主國維多利亞式的石砌大廈，入口寬足容得下四部馬車同時進出，

⁷³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604

⁷⁴ 東方白 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1992，P614

江東蘭看得目瞪口呆。雖然小澤大尉宣稱：「我們來馬來西亞，是爲了把你們從英國的桎梏解救出來，……」。實際上僕役仍是印度人，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組成的鎮民代表不變，不同的只是林肯轎車的主人從英國人變成日本人，落荒而逃的英國兵換成耀武揚威的日本人罷了。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江東蘭理性與自信在回台任教職時首次遇挫，新竹中學的經驗體認了被殖民者的身份，馬來半島的見聞更認清了殖民者的面目，無關乎日本殖民者或英國殖民者，他們都是共同的貪婪、自以爲是的殖民體制。因之東蘭在小澤大尉的怒吼下採消極罷工，小澤大尉無奈地妥協了，最後更感激的對東蘭說：「……你不但爲我生了嘴巴，同時也爲我長了眼睛。」

尾崎秀樹所言台灣人面對殖民體制的態度，抵抗→認命→屈從→傾斜的模式⁷⁵，我們來檢視江東蘭的過程：年幼時節聽聞的簡大獅抗日、鳳山的林少貓、柯鐵虎的歸順均是上一輩的抵抗經驗，江東蘭生於一個無奈的被殖民體制，認命的宿命籠罩台灣；對於殖民體制的暴行，台灣人只得屈從；對日本的歧視（一谷有二，鬼木校長……），江東蘭更不得不屈從。抵抗→認命→屈從是台灣人的被殖民路徑（尾崎秀樹言），江東蘭亦同。身具知識分子身份的江東蘭惟一不同的是認命中仍具理性的思維；屈從的過程中仍具有理性的價值判斷。雖認命仍具抵抗的意識，雖屈從仍以知識與殖民權利互相制約。因抵抗意識的堅持而未有傾斜的轉折，更因與殖民體制的互相制約，減少殖民體制的壓制，知識權力的支撐多了那麼一絲難得的尊重。

三、結語

現代性的全球傳播並非西方人推廣現代生活給東方人，而是資本主義的再擴張，遂挾帶殖民體制而來。⁷⁶日本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改造，是挾其殖民與現代國家體制的雙重暴力，⁷⁷碾過伴隨台灣人成長的

⁷⁵ 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04，P187

⁷⁶ 陳芳明 著《殖民地摩登》台北市，麥田，2004，P30

⁷⁷ 游勝冠 著《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市，遠流，2000，P254

社會傳統及文化。殖民體制以「現代化」為誘餌，迫使台灣人放棄原有的一切：放棄節日、放棄習俗、放棄文化、放棄教育、放棄自我，最後放棄台灣的原型。江東蘭鄉居成長背景，古樸的本土質素，沈澱了心靈的歸屬，厚實了生命的依託。留學的經驗，中學教師的歷練，添加了現代性的密度，寬廣了現代性的視野。他的成長如果稱得上順遂應得力於知識背景。殖民體制對江東蘭的侵擾，是不斷的，卻也是漸進的。因為漸進所以智慧能量的抵禦尚足支撐。「百忍堂」的忍隱平靜了一段時日，當「忍」字在殖民體制催殘下滴下了血液般的紅酒，獨善其身不可得，只得任殖民主的戰爭腳步沖刷激盪。

江東蘭研讀佛經的過程中，「苦、集、道、滅—四聖諦」和「八正道」明白了，「輪迴」與「三世因果」懂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也清楚了。最叫他迷惑的是所有的咒偈，像「往生咒」，像「大悲咒」，只從梵文直接音譯，而不像經文從梵文音譯。現今的人都還在唸一千五百年前鳩摩羅什的古譯本，用字那麼艱深古怪，猶如一道一道的文字魔障。有幾個人能懂？有幾人能悟？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梵文未以本土化的型態出現。佛教經典的傳輸得經由「本土化」這個轉折器，更何況「殖民體系」或「現代化」這麼龐大的工程體制呢？

《浪淘沙》中有一打扮富麗的台灣中年婦女和一十八、九歲高等學校的男學生，並肩而行卻不發一言，只見那婦人同那學生不是用口卻是比手劃腳在互通訊息。⁷⁸原來這孩子七歲即由父母將孩子送到日本唸書，十九歲時母親赴日探視，母子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溝通。如果孩子赴日唸書是現代性的追求，母親是台灣本土代表，一味追求現代性的目標，捨棄本土於不顧，這樣的現代化對台灣母體來說是茫然的，對成長的孩子也是枉然。惟有在這現代性與本土性中間搭起通譯的橋樑，有溝通、有互動、有取捨，現代性的種子在本土性的土壤裡，始能冒出綠芽、茁壯，開出屬於本土的現代性花朵。

⁷⁸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十一章/千人大合唱，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 P511

第三章 《浪淘沙》小說人物抵殖民意識之表現

法農說：「進入法國的黑人之所以轉變，是因為對他而言，母國代表聖體龕；他之所以改變，不單單因為從那裏傳來了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還來了醫生、行政首長，以及無數有著絕對權力的小人物。」⁷⁹

這樣的被殖民者未具任何抵抗意識、徹底的認命、完全的屈從，向殖民主的傾斜更是一覽無疑。法國殖民之於非洲黑人如此，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百姓又是如何？現代化帶給台灣相當程度的進展，日本化也給台灣百姓在權力壓迫下不得不然的屈從，但現代化與日本化之間還存在的殖民化過程，台灣百姓是否已遺忘了呢？本章節擬就《浪淘沙》中小說人物之反殖民來探討：

⁷⁹ 弗朗茲·法農著 《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P82

第一節 周福生家族

一、黃皮膚、黃面孔：主奴清晰之殖民統治

台、日人外表均為黃皮膚、黃面孔，在外觀條件上不具劃分主從族群的「天然疆界」，……也不像非洲黑人面對白人被逼得很自卑地大演其「黑皮膚、白面具」的把戲。⁸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同是黃皮膚、黃面孔的有色人種，對其殖民體制有絲毫阻礙，亦或權力之穿透無關乎膚色？

《浪淘沙》第一章一開始即點出小漁村澳底的一家吳順伯五兄弟在日軍登陸時五個兄弟分別拿著筆、墨、硯、紙和水罐，沿著海岸向日本兵登陸的沙灘走去……，只聽見劈劈拍拍的一連槍聲，那五個兄弟便一個個無力垂頭彎腰，橫七豎八地倒在沙灘上了。⁸¹單純的農民想以獻糧或獻銀的方式與日軍講和，只求日軍不要殺他們。雖想到語言的不通，拿著筆、墨、硯、紙和水罐欲充當溝通的工具，無奈仍死在殖民宗主的槍下。殖民與被殖民壁壘分明之立場就此揭開序幕。

台灣人自然不是人人一開始就如吳順伯五兄弟乖乖順從談和，抵抗的義勇軍從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紛紛起義，日本能久親王更在嘉義周邊視察時遭一位刺客由樹林跳出，「一刀刺落」，死在冬瓜刀下。⁸²

吳順伯五兄弟的慘死、能久親王的被刺殺，無關乎黃皮膚、黃面孔，真正的關鍵應在於使殖民地人民受創的殖民體制。

「若孤土匪出來做土匪也好；上驚的是連官兵也出來做土匪。…」⁸³短短二句點出個人之亂不足害，制度上的的為害才令人驚悚，猶如苛政猛於虎之

⁸⁰ 盧建榮 著《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台北市，麥田文化，2003，P103

⁸¹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一章/清國奴，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2

⁸²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一章/查某子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14

⁸³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三章/台灣民主國，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27

譬喻。當周明德與遠山明同受訓練時，周明德提及之故事：一個軍官踢准尉，這准尉踢曹長，這曹長就踢軍曹，這軍曹就踢伍長，這伍長就踢上等兵，這上等兵就踢一等兵，這一等兵就踢二等兵，這二等兵找不到比他更下級的人好踢，只好到馬廄去踢他的馬⁸⁴。在殖民體制的軍隊中高階壓迫低階，殖民體制下的台灣，日本殖民者的壓迫更是無所不在。這樣的欺凌、如此的壓榨，重點不在於膚色，關鍵不是殖民地人民，而是使殖民地人民受創的殖民體制。無怪乎江東蘭說：「在本地的日本人與在殖民地的日本人截然不同，不但日本人如此，我看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也一樣，在本國都顯得和藹可親，一到殖民地就變得窮凶極惡，這可能就是人類的通性吧！」⁸⁵

二、從人性之堅持到抵殖民意識的流露

台北圓山開始建造「台灣神社」時，菊池巡佐力邀周福生以精湛的手藝為「台灣神社」出力，工錢雖比普通工錢多了三倍，日本人在建造「台灣神社」的三年中，周福生始終沒上過圓山一步，更未曾為日本人釘一只鐵釘或鋸一塊木頭。這樣的堅持實屬難得。面對日本商人中少數愛吹毛求疵，愛貪小便宜，周福生為顧全大局，忍氣吞聲也就過了。但面對無理取鬧「橫柴入灶」的日籍商人，雖被誣告，無奈中只得「死虎做活虎打」。最後終證實「一壺三斑也有一尾金魚」。

周明德於新竹中學時因日本同學武田的欺負而不自覺台灣話脫口而出：「無人情的『四腳狗』！台灣米攏給您吃了了！」因而與日本同學野口在教室門口揪打。雖經松下先生與東蘭的力保，最後仍遭鬼木校長的開除。

吳錦發先生在評論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時曾言：「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寫抗日，並沒有把它寫成民族主義的抗日，而只是寫這塊土地不是你們

⁸⁴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下冊，沙第六章/公正何在，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602

⁸⁵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下冊，沙第一章/和平之祖，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977

的，你們要來，我就要反抗。」⁸⁶從這個視角來觀察《浪淘沙》中人物的抗日：周福生木器行的生意往來講究的是真材實料與信用，不分日本人與台灣人。但日本商人一再藉著殖民者的身份吹毛求疵，能忍的忍氣吞聲；無法忍的上法庭。這樣的作為從生活出發，這樣的本質更是卑微地從生存立足。尙未有強烈的、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但日日蓄積的不滿，年年隱忍的憤恨，到了兒孫輩周明德念新竹中學時，情況有雷同亦有互異。雷同的是殖民主對台灣人的壓迫，同樣令台灣人悲憤而壓抑；互異的則是有人（周明德）在學校受日人欺負時敢站出來更點出：「無人情的『四腳狗』！台灣米攏給您吃了了！」與同學野口在教室門口揪打，引起日本學生圍住觀戰，操場上的學生跑來助陣，……。這樣的氛圍是生存本質的激發，更是民族主義的蘊釀。殖民主的壓迫，正逐日在台灣百姓的心頭種下反抗的種子。一次次的挫敗，卻也是一項項成長的養分，抵抗過程中強遭壓迫而認命，卻未止息；認命過程中即使再遭受凌遲亦只得屈從。但這樣的屈從過程是人性的扭曲，如此扭曲的人性只會造就更充沛的反殖民力量。面對殖民體制，周福生身上見到的是人性之堅持，到了周明德這一代彰顯的已是抵殖民的意識了。

三、小結

呂赫若在 1935 年發表的小說〈牛車〉，點出了現代化為台灣社會帶來了災難。日本人舖設鐵路、開闢公路，彷彿使島上的交通運輸更為方便。呂赫若的小說戳破了這種現代化的神話。當日本人誇耀進步的時候，台灣人的傳統產業與傳統勞力卻往往被犧牲掉，反而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裹著糖衣的日本殖民政策，其本質並非要改善台灣的百姓生活，實際上是壓榨本地的勞力、攫取台灣的資源。糖衣雖甜、宣傳雖美，終究有顯露真實面目的一刻。

⁸⁶ 林瑞明 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市，允晨文化，1996，P269

唐山過海的周福生，渡海途中代付船票一事顯露了他的古道熱腸；堅拒船長退回四塊銀元的代人代付之船票費用，更彰顯了他本身人已之分寸。日軍攻進台北城前夕，兵工廠大門被撬開了，門口有人絡繹不絕地走出來，面露微笑，手裡捧著槍械、機器、箱子、對周福生販售來福槍、賤售克魯柏山砲。周福生不為所動地逕自往前走，不理會週遭的譏諷。他的沈穩較於採在摔破一地的硫酸上的赤腳苦力⁸⁷，更顯理性了。周福生剪「頭髮尾仔」一事，更突顯其自省自覺；古代王船山不願薙髮，走入山洞，讀書寫冊。清朝朱舜水也到死都不肯薙髮，才亡命到日本教日本人儒學，不但所有日本人尊敬他，連德川幕府都尊伊做先生。⁸⁸周福生剪「頭髮尾仔」，只覺得滿清都已被推翻，民國已成立，都做了兩百六十年的奴才了，怎還留著「頭髮尾仔」。他不但身體力行剪了辮子，對週遭的親朋好友亦一以貫之，「磨刀利」不剪辮子，視為「奴才與狗」，門口貼著「奴才與狗不得入」。清國奴的辮子檔住美食的入口，在現實的考量下「磨刀利」也在隔天剪了辮子。「剃頭光」在寂寞無聊的情境下，過不了幾天也自動把自己的辮子剪了。從此，龍山寺附近的一帶再也看不到有人拖辮子了。

周福生熱心助人的古道熱腸，構成一種希望；周福生堅持立場的原則，構成一種慣性；周福生臨危不亂的理智，構成一種防衛；周福生自省自覺的作為，更構成一種氛圍。這樣的希望、慣性、防衛、氛圍在自然中蘊釀，在生活中展現。在自然中蘊釀的是從人性出發，生活中展現的是質樸的。從人性出發的質樸力量其實是面對殖民體制最重要、最有效的反制力量之泉源。

周明德——周福生之長孫，在祖父周福生的教養下（父親周台生在南洋）深受祖父影響，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日本人截然不同的差別

⁸⁷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六章/衛國安民，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51

⁸⁸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八章/你子換我子，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399

待遇感受應是益發深刻。在新竹中學求學過程中，因日本同學武田的欺凌，野口的羞辱，脫口而出的實話：「無人情的『四腳狗』！台灣米攏給您吃了了！」而惹惱了鬼木校長，挑動了殖民者不容碰觸的優越統治位置，結果被開除。過程中雖有見義勇為的日籍教師松下先生依理力爭，台籍教師江東蘭義正詞嚴地力挺，殖民威勢並未連接真理，權力貫穿的體制，扭曲的作為，只得使周明德被開除。辭別江東蘭先生的明德，頹喪因而背有些佝僂，猶如老了五、六歲，在先生江東蘭的話別中，「百忍堂」的忍字猶顯突出。無聲的壁虎嘴巴一張一合，卻是寂然沒有聲響，似乎傳達了一些訊息……。這件事在周明德的生命中應是一個重要的決裂點，這個決裂點形成的剎那火花，卻也改寫了他全部的生命。日本的殖民統治，不但無關乎黃皮膚、黃面孔與否，祖父輩周福生「人性之堅持」之作爲模式，已得不到殖民者的善意回應。因殖民者已爬上日本總督府的旗桿頂，從那兒俯看整個台灣社會；站在優勢者的位置，對台灣人濫施傲慢與偏見。在周明德內心的神龕裡，「抵殖民」已被供奉在無庸置疑的地位了。

畢業後的周明德投奔南洋的父母親，在母親刻意的忽視下，父親的軟弱性中，更粹勵出異於常人的心志。幾經波折仍回台灣回到爺爺周福生的懷抱。更擔任母校開南中學的英文教師，由於在馬尼拉跟美國來的教師學了純正的英語發音，加上一年來自己的苦修與博覽英文書籍，更兼自海外帶回來的豐富生活經驗，使他變成了全校最受歡迎的英文先生。這三個因素均從生存本質激發出來，此時的周明德不僅有自省、自覺的反省力，更了解「自立」對自己的意義。他的生活與生命已連結在一起，他的生活已變成「生命的」的一種文采。這種生命的文采在二二八事件前夕中更散發出不同的見解：「我講伊唐山人野蠻若生番咧。」一個穿西裝戴打鳥帽的中年人如此地說。周明德最後卻對大家說：「其實唐山人間有上等的有下等的，諸位抵才所講的攏是下等的唐

山人。有真多上等的唐山人，戰時攏集中在重慶，戰後轉去伊南京、北京、上海、天津都會赴Y，哪有時間通來台灣？現在在台灣，講一句較歹聽咧，大部份攏是在大陸有路沒地去的，姆才會一下光復就走來台灣。我去過大陸，各種的唐山人攏看透透Y，啊您咧？孤看著下等的唐山人，就講所有的唐山人攏安倪，這實在是真沒公平的代誌。」日本殖民者有濫施傲慢與偏見者：鬼木校長、鬼塚隊長……。卻也有仗義執言的松下先生、人道理性的遠山明。所以他（周明德）的「抵殖民」是非分明、不以偏概全，是觸撫自我抵抗意志的脈博，絕非激進的愛國主義者，更無庸俗、偏狹與粗暴，生命與生活連結所散發出的光采，更是一份寬宏、善良的人文關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國民政府威權旗幟下，都在這樣的光采下而呈暗淡。

第二節 丘雅信家族

一、丘雅信成長背景

有些種子要做肥料，有些種子要做泥土，有些種子是天生就要開美麗的花朵。丘雅信這粒種子，在二次喪父的試鍊、殖民體制下能開出不凡的花朵，大環境中有其特異的時代背景、社會因素、家庭背景，個人特質上更有著殊異的歷練。相對於殖民主是弱者，但不屈辱；相對於日本人是庶民，但不乞憐，為起碼的生存條件而奮戰。在「人心彎彎曲曲水，世事重重疊疊山。」⁸⁹的雜沓紛亂的殖民體制下，走出一條人性堅持的不凡里程。

雅信六歲時，在繼父丘元家的支持與引領下，受業於王秀才。循古禮對孔子像叩了九下頭，對王秀才叩了三下頭。開始了日治殖民體制下台灣第一位女醫師的求學歷程，十二歲開始的「淡水女學」更啓開了封建社會下桎梏的心靈，在殖民體制下，深一層感受到台灣人與日本人之殊異，更體會到封建社會下男女之不平權。學成回台，執業台中期間，對台灣的落後醫療，貧困小民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地震發生時，眼看救難者「挖孝生，沒閒通挖查某子」更有深刻之感受。與林仲秋因「同姓不婚」的傳統教條而阻隔的愛情婚姻，更是歷歷心頭。面對自己的母親，雅信懷孕待產時亦得到外租屋待產。因習俗上「嫁出去的查某子若像潑出去的水，有給伊轉來做客，沒給伊轉來生子。」⁹⁰的傳統。

在丘雅信的成長中，面對殖民者雖無顯著的抵抗意識，順遂的求學歷程、堅毅的方向目標，擴大了她的視野，也間接促使丘雅信對殖民者的本質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殖民地的小知識分子挫敗、黑暗的心靈世界，雖未在丘雅信

⁸⁹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下冊，沙第十一章/和平之祖，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2021

⁹⁰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中冊，淘第十六章/支那之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799

身上駐足，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界線已在求學過程、工作上漸顯分明。當天下層社會裡的一般世間女子，他們面對的是生活與生存，是外在的滔滔濁世，舉步維艱，甚至處處是陷阱，荊棘的險地惡境。丘雅信雖同為女人，在父親支持下，卻可以優遊於私塾、淡水女學、日本的女子醫學大學。一般女性的問題關鍵就在於男性的絕對權威，加上女性只是附屬品的傳統社會價值觀。這二項問題，至少沒有沈重地加諸在丘雅信身上。繼父丘元家的疼惜，對念書的支持，更沒有絕對權威的作為。一路的求學，加上自身的堅持，母親在傳統的觀念下（反對赴日本念醫學）亦被說服。無男性絕對權威的枷鎖，傳統社會價值更被校園的藩籬作適度的阻隔，丘雅信的成長便在這種優質的環境中呼吸茁壯。

二、地主家庭與殖民者

「殖民時期」意謂國土淪陷割據於異國，從軍事、外交、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皆由異族殖民者直接支配統治之時期。「後殖民時期」則為民族重獲主權後，國土脫離異國統治，復歸統一，成為獨立的軍政實體的時期。兩段時期於政治分期上，是截然有別的。但文化脈絡上卻持續地被帝國話語的不同運作模式所支配。愛德華·薩依德早已指出，許多反殖民主義者，其實暗地裡皆認同帝國主義的價值觀。⁹¹

丘雅信繼父丘元家是一典型地主家庭，在殖民統治下與日本殖民者的關係又是如何？在傳統封建的社會環境下，丘雅信從私塾、公學校、淡水女學、日本女子醫學大學一路求學過程，雖有父親的支持，間有母親的反對（赴日），但除了丘雅信本身之努力與資質外，背後家庭經濟上的支援絕對是重要的支柱。而這樣的地主家庭面對日本統治者是批判？是接納？在《浪淘沙》本文中，對這方面著墨甚少。丘元家送雅信上私塾是：雅信已經六歲了，丘元家想應該

⁹¹ 比爾·阿希克洛夫特等 著《逆寫帝國》，台北縣，駱駝出版，1998，Pi（譯者劉自荃導論）

讓她念一些漢文，於是便去跟「摩詰書房」的主人王秀才說妥，把雅信送來書房跟王秀才學漢文。八歲時，母親秀英收到台灣總督府發的一張入學通知單，叫雅信到剛建好的「大稻埕公學校」入學上課，秀英、丘元家商量的結果，終於認為雅信在「摩詰書院」既已學得一些漢文，再念多也是沒有用處，倒是日文近年已慢慢通行起來，到公學校學一些日文，將來對她總是會有更多的用處，何況附近的幾家鄰居已經有人把孩子送去公學校念書，於是他們也就隨後把雅信送到「大稻埕公學校」念書去了。

從丘元家送雅信上「摩結書院」與「大稻埕公學校」這二件事的過程中來看，丘元家面對日本殖民統治者，在他身上似乎已經找不到「抵抗」的氣息，上「摩結書院」是為習得一些漢文，上「大稻埕公學校」是因日文已慢慢通行起來，對將來總是有更多的用處，更何況附近鄰居已經有人把孩子送去公學校念書。這樣的氛圍呈現的是認命，對現實生活的認命，更帶有著對殖民者一絲絲的傾斜。「抵抗」意識的消弱，「認命」觀念的擴張，不由自主的「傾斜」在強大的殖民體制下已變成一種普遍的空氣。從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地主階級均籠罩在如此的殖民統治中。抵抗→認命→屈從，這樣的改變是殖民者強制的統治而不得不的轉變，但內心中的那份人性的堅持仍在諸多有意識、有自主的台灣人心中蓄積，益加偏執的統治作為只會蘊釀更雄健而壯闊的反作用力。丘元家的地主身份雖未有顯著的抵抗意識，卻積極順勢地培養了丘雅信、灌溉了這位台灣第一位女醫生。抵殖民的概念，也由於丘雅信視野的擴展，而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三、從淡薄的「被殖民意識」到認清殖民體制的真實本質

被日本殖民的台灣百姓生活是困頓的、精神是抑鬱的，尤以基層的庶民感受最深。制度上層層的剝削，生活上種種的壓迫，難以喘息的空間自然由生

存而激發出對日本殖民者的不滿與怨懟。不滿與怨懟是苦楚經驗、是苦楚記憶，這苦楚經驗與記憶是苦澀的，卻也是抵殖民能量的蓄積。當溫度與能量達到一臨界點時，自然產生動能，發出異質力道。撼動殖民本質可能力道不足，但侵蝕的效益卻隨著殖民體制的剝削、壓迫的增減而增減。然而在地主階級丘元家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在文本《浪淘沙》中對丘元家的描述：他頗有一些儲蓄，而且又在淡水河對岸的二重埔和五股有些田產和山地；……有時坐渡船到二重埔的田地去收租，或到觀音山下的五股去收山租，……⁹²經濟上丘元家在當時稱得上是優渥的，在日本殖民時期是不多見的。生活上是富足充裕的，拜家產之賜，有著相當的揮灑自如的能量。不用日夜因「柴米油鹽」而奔走如凡夫、走卒般的勞苦。丘元家因士紳地主的階級，少卻了殖民者的欺凌與壓迫。文本中，雅信公學校日籍教師大苗先生的倍加關注，菊池巡佐的呵護有加，源自丘雅信的瞻識、脫俗表現，但不可否認的丘元家豐厚的家產背景應有相當的加乘效用。夾著濃烈優越感的日本殖民者，面對一般庶民的欺壓手段，在面對地主階級如丘元家者，態度上至少溫文許多。當然《浪淘沙》跳脫一般對日本殖民的一般論述，著眼於「善」的觀點，公學校大苗老師是典型令人敬重的師者、菊池巡佐身上不見殖民者暴戾之氣，反而突顯了人性之光輝。丘元家一家從生活本質上觀之是無憂無慮的，地主階級不愁衣食的日子中與周遭日本殖民者的互動是人性的、是綿密的。但這種綿密的、人性的互動是忘卻被殖民的現實、不見一般百姓窮困生活而產生。

殖民者的性格是餵飽自己的肚囊、錢囊為職志，一切照自己為所欲為的「規矩」來，從不會站前一步，主動為人設想。依附殖民者自當順從殖民者的意志，抵抗的意識已全然消失，認命的觀念已不由自主深植人心，更濃烈的

⁹²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一章/查某子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38、139

印記深烙在無憂無慮的地主階級，丘元家應是當時地主的一個典型範例。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應不是單純相對的概念，也不全然是一種彼興我亡的的取代，而是一種有重疊、有排斥、有接受的複雜現實。丘元家豐沛的背景，與日本殖民者大苗老師、菊池巡佐綿密、人性的互動應是殖民與被殖民者人性的交疊。丘雅信自小優足的生活無法感受殖民者的威迫，但一跨出台灣赴日留學，「台灣——被殖民者」的烙記是深印在日本人心中，歧視的眼光、排斥的作為是身為被殖民者不分貧富均得面對。回台執業期間，深入一般庶民的生活，加上夫婿彭英在理念、行動上的反殖民，所學、所見、所聞，已使丘雅信感受到平安生活外，阻絕大多數人生活的關鍵所在——「殖民體制」的存在。

四、小結

殖民者及其體制的批判應該是被殖民者無可退讓的立場。⁹³然而批判的程度不但得視殖民者的統治態度而變易，更由被殖民者——台灣百姓階級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基層百姓為起碼的生存條件而奮戰，雖跨越不過殖民主的剝削、壓榨，註定必然是困頓、淒慘的宿命下，依然終日勞苦。地主階層、鄉紳頭人，生活無虞者，當「抵抗」的氛圍消失，向殖民者低頭認命時，回到生活本質，未有立即的傷害與影響時，自保苟活是大多數人的選擇。殖民主義充塞的台灣天空，就這般永無止境的延續？細察台灣百姓的思考脈絡，細思丘元家的作為：台灣普羅大眾的終日勞苦是為生存為生活，但不公不義的殖民體制使得生活更艱苦，一切的宣傳均是空言，眼前擺出的事實，是無止境的剝削、無情的壓迫。扭曲的施政在強勢的推展下，台灣百姓不得不認命，但認命的同時也在蓄積抵抗的能量。丘元家無抵抗殖民的具體行動是大環境的不得不然。然

⁹³ 學者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傷痕—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收入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市，五南出版，2004，P277

而送丘雅信上「摩詰書院」習漢文是對漢文化的認同，相對地在文化上應也是抵殖民的行動。順勢而為的支持丘雅信上公學校、淡水女學不但不應視為對日本殖民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對下一代啓蒙的注重。當武力抗爭已無力作為時，惟有在文化上、教育上引領子弟與殖民主抗爭，文化上的自主、教育的啓蒙在殖民主義籠罩的天空中，只要有一絲曙光，那終有陽光普照之日。「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臥，爾與佛不別，但莫外求。」生活禪「只是平常事」，同樣抵抗未必只有武力抗爭，各個時間點應有其不同的階段任務與作法罷了。

丘雅信在愛情的路途中，本有機會力圖婚姻的自主，但她沒有勇氣向同姓不婚的習俗挑戰，最後接受了媒妁婚姻的安排，當時社會眾生的自我覺醒不足，受高等教育的丘雅信亦無法掙脫出這層封建的桎梏。而對龐大的殖民體制，自當更有無力感。自幼堪稱順遂的求學過程，雖曾為赴日習醫與母親相左，求學求知的理性並未彰顯在婚姻的自主上。但強烈的求知慾的轉化與延伸，卻絕不止息於學業上，她的被殖民者身份、日本求學經驗、執醫生涯，厚植了她的自信、深耕了她的能力、擴展了她的視野，更重要的擦拭了自己那道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不明的界線。以知識背景療醫庶民疾苦、以被殖民者身份發聲、以撒豆成兵的方式散播醫療衛生的種子、以台灣人身份受日本皇后的褒獎與賜金。

惡不會自滅，得救必需靠自己，自己不救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而反抗的手段沒有可否而且沒有上限。反抗是人性中最高美德。⁹⁴

⁹⁴ 李喬 著《藍彩霞的春天》台北市，五十年出版社，1985，P2

當武力抗爭無以為繼，最需要的不是盲目犧牲而是深耕本質，不是狹隘的排它或虛假的包容，需要更多更好的方式幫助民眾解決問題，認清方向。丘雅信是被殖民者的身分，卻未刻意站在與殖民者對立的立場。以一個台灣庶民的立場積極轉化、延伸力量於學業、工作。是被殖民身分，但是在醫療體系中照耀週遭，溫暖了這個被殖民的台灣氣溫。所以把殖民主與被殖民者的衝突對立的負數，轉化成台灣庶民的積極意義，應是丘雅信最為卓著的抵殖民行動。

第三節 江東蘭家族

一、江東蘭成長背景分析

當波羅汶村的新設學校「湖口公學校」在傳杏先生的籌劃下，將近竣工時，傳杏先生力邀江龍志（江東蘭之父）參加開校慶典。江龍志回答：「到時再看看，到時再看看，……」傳杏先生再三重提參加開校慶典的事情，而江龍志也老是沉默不答，非得等待傳杏先生三催四請之後，才勉強回答：「到時再看看，到時再看看，……」當天慶典，傳杏先生留了一個大位要給江龍志，江龍志卻缺席了。他翻過了屋後的竹籬，走向崎頂，坐在一叢矮破布子的樹下，仰望著天空兩隻盤飛穿梭的老鷹。江東蘭問「阿爸，你怎麼沒去？」江龍志淒笑了一下，卻不回答，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又抬頭去望天空的那兩隻老鷹，望了好一會兒，才又慢慢低下頭來，對東蘭說：「你以後白天去公學校讀書，晚上回來還要繼續跟阿爸學漢文，你知不知道？」東蘭猛點頭，回了一聲：「知道」江龍志才會心地微笑起來，伸手去攬東蘭的腰，把他拉近來坐在他身邊，然後父子兩人同時抬頭去望天空的那兩隻老鷹，這時崎頂上起了一陣微風，那兩隻老鷹彷彿飛得更高了……⁹⁵

這就是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江龍志，在堅持理念的前進過程中揚棄瑕疵。在抵抗的環境與意識已淡薄的殖民體制下，雖無奈的認命卻也有著認命的原則。教育對村民子弟是重要的，所以對於「湖口公學校」的設立江龍志贊同且支持。但對於開校慶典得與日本殖民者齊聚一堂，江龍志是敬而遠之。當要求江東蘭白天去公學校讀書，晚上還要繼續學漢文，江東蘭滿口答應時，江龍志會心的微笑看著崎頂上的老鷹，高興得彷彿老鷹都飛得更高了。對日本殖民

⁹⁵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四章/小鐵拐的往生咒，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201、202

者的敬謝不敏與對漢文化的孺慕之情正好成爲強烈的對比。江龍志的理性思考影響了江東蘭，智性的轉化作爲更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中薰陶了江東蘭，德性的堅持更蓄積了江東蘭爾後的能量與方寸。

另一位影響江東蘭至深的人物應是——一目少爺。一目少爺因始終找不到對象可以成家立業，便隻身與老母同住，老母過世，他便搬來江龍志家，幫他種田，講故事給江東蘭聽，不然就是掛上那只配了單仁玻璃的老花眼鏡，讀那讀過幾十次的線裝石印的「三國誌演義」。當東蘭從公學校畢業，在家賦閒了二年。一邊幫父親、一邊讀他自己手邊得到的漢詩和日文書。雖然畢業前的幾年，他都得全班第一名，但經一目少爺多方探訪的結果，得知台北的幾個中學都是日本官方專門爲在台灣的子弟建的，台灣的子弟不用說不能進去讀，連報考也不允許。直到林獻堂一些人合議要在台中創設一間中學，叫「台中中學」，專門爲台灣子弟而設的中學。江東蘭才在一目少爺的陪同下趕赴台中考試，結果不但考取，還以第一名狀元高中。

當江東蘭赴日念「神戶商科大學」因得肺蛭病而茫然時，一目少爺支身趕往日本，靠比手劃腳的『萬國話』，找到江東蘭，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理念勸江東蘭回台養病。養病期間東蘭接觸佛經，與一目少爺討論佛經中梵文音譯難懂，經文意譯易解的問題。一目少爺囁嚅地說：「……我只管我的人『三寸頭頂有神明，做好做歹神都知』就已足夠，還管其他做什麼？」回台養病雖擱置了學業，但回台灣再次接觸到的人、事、物讓江東蘭慢慢矍鑠起來，心情清彩，更確認了放棄商科改念英國文學的方向，放棄「神戶商科大學」，直接到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自己喜愛的英國文學。

「爲者常成，行者常至。」江東蘭以優異的成績赴日留學，「神戶商科大學」一開始雖有挫折，但堅毅專注的作法倒也克服學業上的障礙，無奈肺

蛭病的引發，只得回台養病：自己舔自己的傷口，自己撫平自己的心靈。成長歷程中江東蘭雖有自己明晰的影像，但期待自己是怎樣的一種人，自己的志趣，明顯地缺乏了這些極其重要的、穩定自己的良劑，徬徨和無依隨時充斥，加上病魔肺蛭病的纏身更使自己的生活變成一種空茫茫的存在。回台灣養病猶如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一目少爺的言語作為雖是守拙、固拙，但「夫子固拙，於用大矣。」這時的江東蘭身心的呼吸已接上台灣社會脈搏的跳躍，「神戶商科大學」病魔挫折歷練出的養分，「早稻田大學」涵養出之氣度，雖穿短衫和短褲，戴著箬笠，打著赤腳，亦可自在、自信地面對殖民者文化優越感。江東蘭沈潛的學養與一目少爺生活禪的豁達觀感染，在人生歷練上益臻智慧的光彩。

二、江東蘭家族與殖民者：從反抗、批判到隱忍

抗日的客家英雄羅希典，武力抵抗止息後改名江龍志，落戶在湖口鄉邊界的一個叫「波羅汶」的小莊裡，改名換姓的江龍志，此時也有一個小男孩，取名「江東蘭」，有「江東子弟」與「磊落不泥」的雙重意味。羅希典、江龍志（羅希典改名）、江東蘭，面對殖民體制，不同時代、不同世代，又有怎樣的因應作為：

「兄弟，我的人異於生番之處何在？就是不割人頭！今日我的人割日本人的頭，明日日本人割我的人的頭，那麼大家和生番又有什麼差別？我對大家言明，今後絕不許有人再割人頭，割人頭者死！」這是抵抗日本殖民者的羅希典，英姿煥發的羅希典，威風凜凜的羅希典。異議的抵抗作為中，仍不乏宣揚「寬恕」、「容忍」的因子⁹⁶。烏鴉錦之役中惟一能懾服日軍的武器——荷蘭砲，其實也只是懾服於它的第一砲而已，只要它發了第一砲，它便形同廢鐵，

⁹⁶ 東方白 著《真與美》(三) 青年篇(下)，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1，P110

羅希典的義軍卻巧妙智慧地運用了這一砲，智性的一砲：今日軍像潰堤的洪水像洪水齊向通道湧進，……致命的一砲，更令日本兵彷彿是中了散彈而掉落在地上的烏鴉。羅希典點燃荷蘭砲的引火線時，不但將他抗日的義行推向最高峰，更將他生命的厚度、深度、密度一舉射向無限。

烏鴉錦竹城城陷之後，羅希典也像其他烏鴉錦的鄉民一樣杳無消息，原來他落戶在湖口鄉邊界一個叫「波羅汶」的小莊裡。一個人口不滿一千人的客家莊，羅希典買了幾畝田地，一邊耕農，一邊設私塾教人漢文。他本人亦改名換姓叫「江龍志」。江龍志在佳節例假時喜歡與莊上鄉紳耆老講天說皇帝：談到鳳山的林少貓雖身上擁有總督簽給的「歸順証」與後藤長官合簽的「歸順條件書」，仍被日本軍包圍打死。這時的江龍志只能歎了一口氣，摩娑起滿腮濃密的鬍鬚說道：「啊！不信免說了！」

談到柯鐵虎的歸順、張呂良的事件，特別是最悲哀的簡大獅——那般對滿清盡忠，而滿清反而背其，將其抓給日本。江龍志咬牙切齒地說：「啊！不義免說了！」。

言及像陳秋菊與林少貓，對其日本人說起來，一樣是土匪，但是後來，一個做到高官貴爵，一個死無葬身之地，江龍志的結論是：「啊！不平免說了！」。

江龍志的「不信免說了、不義免說了、不平免說了」是對日本殖民者一針見血的批判，這批判雖未見積極的元素與作為，卻是台灣百姓內心不平的共同心聲。相較烏鴉錦的羅希典與波羅汶的江龍志，雖同是義軍，居民仰望追隨的對象，但面對殖民者已有顯著而不得不的改變。當武力抗爭止息，但殖民體制所發出不公、不義、不平的作為仍無止境的加諸台灣百姓身上時。台灣百姓雖無武力抵抗的的相對力量，但江龍志在鄉紳聚首的場合，仍一再地對這種

不信、不義、不平的殖民作為，不斷發出批評論述。這樣的批判也在台灣庶民間植下抵殖民的種子、深化了抵殖民的概念。

當日本殖民者在波羅汶村興建「湖口公學校」，面對傳杏先生的一再邀約參加開校典禮，雖一再推託：「到時再看看，到時再看看……」，最後仍是缺席了。羅希典的反抗，抵抗已成過去，面對日本殖民者放聲的批判更無其氛圍，這時只能來到波羅文全莊最高的地方，從全莊的地方也可以望見「崎頂」。在破布子的樹下，仰望天空盤飛穿梭的老鷹雖是隱忍，但當欣見兒子江東蘭白天上公學校讀書，晚上仍願跟阿爸學漢文，那隱忍的躊躇仍微露著稀微的曙光，隱忍的噤聲中更默默地植下希望的種子。

三、江東蘭在認命、屈從中之抵抗

江龍志之相較於羅希典，猶如枯萎的花朵，雖凋謝卻也孕育出新的種子（江東蘭）乘風而去，飛向遼闊無垠的世界。對於天災以及某些人禍，也許忍受是生存之道。但是對於人為的壓迫、欺詐與剝削，如果仍然只知一味地忍受，那便是愚昧了。⁹⁷羅希典對於日本殖民者入侵的抵抗是生存的基本法則：江龍志對日本殖民體系的認命是一個無奈的和解，是基於對未來和平迫切的渴望。對於「湖口公學校」的設立，江龍志願與傳杏先生（公學校籌劃者）閒聊或商議未來學校的計畫，也常帶東蘭去看傳杏先生指揮一切。可看得出江龍志對公學校的設立是認同的，這樣的認同更是基於對子弟未來教育的需求。而開校典禮的缺席，不願與殖民者共處，其主要原因在於江龍志具有洞穿殖民者現代化之真正企圖的「反殖民意識」。⁹⁸羅希典的抵抗是其主要特質，江龍志在認命的氛圍中仍具有鮮明的抵殖民意識，這種溫而不烈的抵殖民意識正是延續

⁹⁷ 鍾肇政 著《滄溟行》，台北縣，遠景，2005，P117

⁹⁸ 學者 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收入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台北市，五南，2004，P121

台灣人命脈的火苗。

江東蘭成長於日本殖民的初期，接受的雖是日本殖民教育，但漢民族代代相傳的風俗習慣更是耳熟能詳。這樣的台灣庶民雖在日本殖民下，認命的態度雖淒苦猶能過日。但好景不常，日本帝國擴大戰事，軍部需要英語譯官到前線，從全島二十七個中學的英語先生中每個中學抽一個。認命而靜默的江東蘭，只因不配合皇民化政策——改日本姓名，而被鬼木校長視為眼中釘，因而被鬼木校長「特別推薦」到前線。殖民體制下不得不認命，軍部的徵召更不得不屈服，認命是忍，屈從亦是忍，但這「忍」字已蹦緊人性，「忍」字已開始滴下一滴滴的血水。

台灣人做伊日本兵，江東蘭搖頭感歎地說：「嘍沒法度，這是命運。」⁹⁹這樣的認命，這樣的屈從瀰漫了台灣全島，更籠罩在台灣人民的每一個人身上。接受過「早稻田大學英語系」現代化教育的江東蘭更有著本土傳統漢文化中的理性與堅持，並未全然隨著殖民者起舞。小澤大尉在「加美濃高地」面對代表和顯要的鎮民時說：「我們日本爲了拯救滿州免於俄羅斯的侵略，爲了拯救支那免於軍閥蹂躪，乃不惜犧牲一切物力與財力，派兵去保護他們，而現在我們來到馬來亞，也就是爲了把你們從英國的桎梏下解救出來！」¹⁰⁰殖民者將自己的利益裝扮成全社會、全人類的利益，將自己的觀念當作普遍性的真理，而「非功利性」作爲一種策略有助於支撐統治者對於普遍性的虛妄聲稱。¹⁰¹這種虛張聲勢，假仁假義的說詞，江東蘭自洞悉其真面目，但身爲譯官只得「輕描淡寫」地譯給在座的人聽。但當小澤大尉對東蘭怒吼道：「譯官就該像個譯官，沒有命令，不得隨便跟人交談！」。這時的江東蘭臉色鐵青，牙根一咬，

⁹⁹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中冊，沙第三章/將多難，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258

¹⁰⁰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中冊，淘第三章/將多難，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272

¹⁰¹ 朱雙一 著《台灣文學與思潮》，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P93

決心緘口不語。後經小澤大尉的道歉，一臉懇求哀憐的表情，江東蘭的決心與固執才釋然冰解了。當卡車被炸被送往野戰醫院時小澤大尉更感激地對東蘭說：「……這次『加美濃高地之行』，真的全靠你一個人，你不但為我生了嘴巴！也同時為我長了眼睛！」

江東蘭在認命中接受殖民教育是無奈，卻也是一種成長。在殖民體制下上前線是屈從，但屈從中有底線的忍耐雖淒苦，卻也是反彈時機的等待。認命是無奈，屈從更是淒苦，無奈中成長、淒苦中保有些微的自主意識應是殖民體制下江東蘭所理出的蹣跚之途吧！

四、小結

一百年前「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花了二十六年完成了《資本論》。儘管《資本論》是一本促使半個地球赤化的「惡書」，但它何嘗不是促成社會進化的「善書」？如果不是它，今天的資本國家也不可能改良社會制度（如「全民健保」、「老人津貼」、「貧民救濟」……）更不願保障勞工福利（如「工會組織」、「勞工保險」、「失業保險」……）¹⁰²。同樣地細察江東蘭家族：羅希典的武力抵抗、江龍志的異議與隱忍、一目少爺的批判、江東蘭的認命與屈從，不同角色不同世代的不同策略中均可鍛鑄出相同的反抗元素：或強或烈、或枯或萎、或鮮或明、或暗或淡、塑造出一個反殖民的生命。以發生在台灣生命流中，以生命存在為義的境界為藍本，去經營與這個境界恰可相容的抵殖民。《浪淘沙》中東方白將「愛」寫進小說，而不單是將抵抗寫進小說。「愛」的模式，是否生活中習知的「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象徵，「人本主義的精神、內涵」以及「人本主義的吶喊」江東蘭家族在本文中所傳達的理念，不管讀者認同或反對，這種意念都會激起讀者的思考。所以此感覺或境界是不

¹⁰²東方白 著《真與美》（五）壯年篇（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1，P307

屬於藝術作品所有，而是屬於人心所有。¹⁰³當文學作品此一錦盒，足以存放明珠，更置明珠於其中，境界唯存於生命流中，境界更於作品、人心間激盪。《浪淘沙》中「人本主義的精神、內涵」、「人本主義的吶喊」¹⁰⁴氣韻互動，日本殖民主義籠罩的台灣：江東蘭成長的堅毅、羅希典抗日行動中所宣揚的「寬恕」、「容忍」、江龍志在隱忍中默默植下希望的種子、一目少爺的守拙、固拙、江東蘭淒苦中所保有些微的自主意識、智慧理出的蹣跚之途，於一世而言或許暗淡，於個人而言更可能是潦倒；但萬世而言卻是燦爛，對台灣庶民而言更是莊嚴悠遠生命流的表徵。無奈、淒苦的殖民歲月，正因有著這樣的抵抗、認命、屈從，昇華了深邃的抵殖民力量。

在 1870 年普法戰爭中結怨的德、法兩國國內之猶太人有一明顯特質：面對民族國家對其忠誠的質疑，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不約而採取了共同的反應方式，也就是進一步加強他們對個別寄居國的效忠，以換取接納與認同。換言之，他們不約而同地變得「比德國人更德國，比法國人更法國」¹⁰⁵。日本殖民下的台灣「比日本人還日本」是三腳仔的行徑，是不見容於人心、被人唾棄的。台灣庶民的性格，是在抵抗、認命的時代錘擊之下塑造出來的。因為屈從，更體認到生命本質原就是不完整的，也正是因為不完整，所以我們得用愛不斷地去追逐、去填補、去修正。如同甘地所說：愛是世界上最強烈的力量，但它卻是想像裏最謙卑的東西。¹⁰⁶由抵抗、認命、屈從中所發出的人性智慧底光芒，逐漸渠引了台灣社會集體意識的型塑。

¹⁰³ 曾昭旭 著《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漢光文化，1993，P 91。猶如道家美學所言：藝術作品這一錦盒，只是足以存放明珠，而並不是已有一明珠置其中。原來境界或意識是唯存於生命流中，因為只有如此才足以稱為整體存在。所以此感覺或境界是不屬於藝術作品所有，而是屬於人心所有。

¹⁰⁴ 學者林鎮山 著〈人本主義的吶喊－試論東方白的《浪淘沙》〉，收入東方白著，《浪淘沙》下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 2057

¹⁰⁵ 吳叡人 著《他人之顏》，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5，P7

¹⁰⁶ 東方白 著《真與美》（六）壯年篇（下），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1，P39

第四章《浪淘沙》三代人物對殖民現代性的抵抗與屈從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殖民時期，引進現代性。台灣知識分子要如何處理殖民性、現代性所可能產生的調適問題，與現代性如影隨形的殖民性糾葛、混雜，如何釐清，是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時代課題，也是今日筆者在本章所欲嘗試解開之歷史糾葛。學者陳建忠指出：

台灣在日本殖民主義入侵後，日本為了在台灣進行持續的資本與原料的壓榨，事實上並非一味的巧取豪奪，而是有限度地進行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改造工程，例如現代製糖工業與新式教育、衛生改善等便是顯而易見的「現代性」事物。比喻地說，正是在「養雞取卵」這點上，殖民與現代性在此找到接合點，於是遂有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說法出現。因而挾帶著被殖民主義話語所先驗地斷定為優越的殖民主所引進的現代性，讓本土知識份子在追求現代性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將殖民性與現代性的意象疊合在一起。¹⁰⁷

養雞非愛雞，只為取卵。這是日本殖民現代性的貼切寫照。台灣文學之耆老葉石濤先生在《台灣文學史綱》中將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的起點設定在1920年「台灣青年」創刊號的誕生，而把終點設定在1945年的台灣光復，葉老更將這二十五年分做台灣新文學的三個階段：

（一）搖籃期：1920～1925年，1920年「台灣青年」創立，

¹⁰⁷ 學者陳建忠〈殖民現代性與本土性—台灣文學的歷史命題〉收入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04，P4。

1925年賴和的第一篇散文「無題」發表於「台灣民報」為止。

(二) 成熟期：1926~1937年，1926年賴和的「鬪鬪熱」，楊雲萍的「光臨」出現於台灣民報開始到1937年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停刊，七七事變發生的這一年為止。

(三) 戰爭期：1937~1945年，1937年開始到1945年台灣光復的大約八年間稱做「戰爭期」。¹⁰⁸

這樣的時間斷限或許仍有其不足之處，但不失為一鮮明值得參考之分類，筆者擬參照上述方式將《浪淘沙》中主要人物在日據殖民體制下細分成三代：

(一) 武力抵抗的一代：(1895~) 這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周福生、丘元家、江龍志、林之乾、許秀英、一目少爺……

日本殖民政權1895年侵台，親身經歷、目睹抗日風雲的一代。

(二) 壓不扁的成長的一代：丘雅信、江東蘭、彭英這一代。出生約在1895前後，1920年(台灣新文學之搖籃期)這一代正值熱血沸騰、理想性高之青年書生時期。1930年(台灣新文學之成熟期)更是結束學業，進入社會。接受完整殖民體制現代教育的一代，本土種苗在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成長的一代。

(三) 戰火掙扎下的一代：以彭亨、彭立、江河清、江東寧……為代表。這一代誕生於1941年二次大戰前後，當時日本殖民體制在台灣已是猶如盤根錯結之大樹。1935年在台北的「始政博覽會」是向台灣百姓示威，是殖民體制之高峰。屈從傾斜的氛圍中成長的一代，在這一世代本土性的優良質數在日本殖民現代性的光芒下已不得不隱身、不得不淡然。

「武力抵抗的一代」彰顯的是具備自己的主體思考，「壓不扁的成

¹⁰⁸ 葉石濤 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1987，P28、29。

長」一代是否具備了這樣的主體思考，接受日本殖民體制現代性教育的一代是否具備了高度吸收與轉化的能力？「戰火掙扎下的一代」又是在戰爭烈火下如何理出一條生存之道？「壓不扁的成長一代」在接受日本殖民現代性教育之後，他們的抵抗是更為多元而豐碩或亦是認命而屈從甚或傾斜？受害的經驗變成受惠的遺產？現代性的教育是反殖民之養分？本章節擬就日據殖民體制下《浪淘沙》小說中三個世代主要人物殖民現代性與反殖民之關係來思索，探討二者之關係。

第一節 武力抵抗的一代

一、生存本質之抵抗

有一位日本昆蟲學家，因注意到有一種「松蟲」總是本能地列隊行動，他捉了領頭的一隻，把牠放在一個不大不小的花盆盆緣上，再將其餘的一隻接一隻地放上去。這一隊松蟲好像只顧前隻尾部的特定視標，一直跟著往前走。過了一天又一夜，整個隊伍還在圓形的盆緣上不停地走。如此不食不停地走，那隻領頭的終於不支而滾落地上，其它的也都落地而死。可憐這一群小蟲只知循著「一次元」的圓周行走，而不知這樣的路線無始無終，除非有無限的生命，否則那是一條死路。¹⁰⁹1895年日本殖民體制據台，台灣百姓短短五個月的時間，台灣民眾打了大小一百多仗，掀起「村婦佐磨刀，耕農自裹糧」的全民保衛戰爭，同仇敵愾，抵抗了日本侵略者三師現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支援艦隊，犧牲慘重。雖然最後台灣仍淪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手，被迫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但比起前一年的甲午之役，海陸軍的迅速潰決，台灣民眾實可仰天無愧。¹¹⁰這種為生存的抵抗，未依循掌權者的特定視標路線，卻為自己的民族血液增強了白血球抵抗功能；這種為土地的抵抗，更為後代厚積了反殖民的能量與實力。

《浪淘沙》開卷第一章「清國奴」敘述提及：澳底是面對太平洋的一個小漁村，恰好在鼻頭角與三貂角的海岸間，是一個有幾十戶的小村。其中最大的一家農戶姓吳，照排行依次叫「順伯」、「順仲」、「順叔」、「順季」、「順五」。當日軍登陸，雖有由頂雙溪開來的兵勇，胸前與背後都貼著大紅心，揹著槍、扛著刀，浩浩蕩蕩要去把日本兵掃到海裡去，可是過不了多久，便見那原班人馬從海灘潰敗下來，落荒而逃。此時吳順伯的策略是「備來去跟恩講，講備這漁村，只有抓魚的和作田的，沒兵也沒槍，絕對不會跟恩抵抗，不通來剷備，看欲獻糧

¹⁰⁹ 黃娟 著《楊梅三部曲》，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3，P7。

¹¹⁰ 林瑞明 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市，允晨叢刊，1996，P88。

還是獻銀，只爲恁講，但是千萬不通來刳備。」五個兄弟拿著筆、墨、硯、紙和水罐欲與日軍談和，但劈劈拍拍的一連槍聲，五個兄弟一個個無力地垂頭彎腰，橫七豎八地倒在沙灘上了……¹¹¹

吳順伯不抵抗的策略，倒臥沙灘的下場之於日軍的反應是：「真不可思議哪，這些『清國奴』！」¹¹²反觀《台灣人三部曲》中之《沈淪》寫的也是乙未年（1895）清廷戰敗，割台與日，台灣人爲保衛鄉土而從事抗日戰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清廷割台之議宣傳已好久好久了。如果這事實現了，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大好河山平白地送給異族，於是日本蕃就會來管台灣了。受那可恨的東洋人統治，簡直是不堪設想的事。他們陸家人自從十三世祖榮邦公渡台開基，傳到他們這一代已經一百多年，就是曾祖天貴公到這地方來從事墾殖，也過了將近六十個年頭。那些先人們都是用無數的血汗才奠定今日家業基礎的，這樣建立起的家，難道能夠雙手捧著送給人家嗎？如果不呢？……」¹¹³陸家決定保衛自己的家園和鄉土而戰，爲了生存，他們開疆闢地，與大自然爭鬥，亦與大自然共存。爲了生存，他們願意拋頭顱灑熱血，與敵人周旋，從不低頭屈膝。在莊嚴肅穆祭祖禮，信海老人唸的禱詞是：

「皇清光緒二十一年寅次乙未閏五月初六，九座寮庄信民陸信海謹禱告于在天諸神暨列祖列宗之靈曰：惟我台土，神州之邦，倭奴覬覦，賊軍猖狂，掠我桑梓，侵我聖疆，天人共憤，黎民倉皇，惟我神州，豈容淪喪，信民子弟，仁勇、綱青、綱崙、綱岱、綱嵩、維秋、維建及家僮廖阿庚等六名，執戟攘夷，誓與存亡，伏祈庇佑，諸事吉祥，滅彼醜虜，日月重光，此禱。」¹¹⁴

¹¹¹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一章/清國奴，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8~12。

¹¹²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一章/清國奴，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3。

¹¹³ 鍾肇政 著《沈淪》，台北縣，遠景出版社，2005，P8。

¹¹⁴ 鍾肇政 著《沈淪》，台北縣，遠景出版社，2005，P218。

全文大氣凜然，保衛鄉國的決心溢於言表。其實無論《浪淘沙》中之吳順伯、《沈淪》中之陸信海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庶民，土地是生存的基本條件，為土地與殖民者抵抗只為萬般無奈中保有呼吸的空間；不抵抗，就得依賴殖民者的特定視標前進，這樣的路線終究是一條死路。

《浪淘沙》中與日軍抵抗的典型首推「烏鴉錦之役」，這些義勇軍是由三峽與大溪一帶組織起來，約有三千多人。這些義勇軍都是散居每個小村落的客家人。因為天天與下山來獵人頭的生番格鬥，人人都養成了使用火繩槍與匕首的習慣，早已成為經驗豐富游擊隊。當年法國侵占基隆與淡水時，當時的巡撫劉銘傳就是用這一批客家兵打退了登陸上岸的法國兵，建立起他們驍勇善戰的聲譽。日本伊藤首相原以為馬關條約一簽，台灣就是日本帝國的腹中之物。¹¹⁵那曉得這塊肉這麼多骨，實在難吞嚥！日本挾其現代化軍隊，面對烏鴉錦義勇軍落伍過時的火繩槍與荷蘭古砲，被打到彷彿是一群中了散彈而掉落地上的烏鴉。¹¹⁶這場抗日戰役的勝利，足令日軍懾服。這場抗日戰役塑造反抗英雄羅希典（江龍志），也看到了台灣人樸實、率直所激發出的智慧。

117

二、殖民體制強制、強壓之執政

大凡帝國主義國家攫取殖民地有幾種方式：一是先以經濟，徐徐浸透，俟水到渠成而條件成熟時，始以軍事政治力佔領之。另一種乃自始即以軍事政治力一舉壓倒對方就範，然後運用其經濟力經營。日人攫取台灣則屬後者。因此，台灣總督自始即以具有絕對性之支配者姿態出現。首先竭力肅清統治經營之障礙，驅逐來自英美及中國大陸之資本，強力推行日本資本容易進入之各種政策措施，歡迎日本資本，鼓勵日本資本家來台創設企業，保護其生產活動，此實屬當

¹¹⁵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八章/烏鴉錦之役，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85。

¹¹⁶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八章/烏鴉錦之役，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07。

¹¹⁷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八章/烏鴉錦之役，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08。

然之結果。日本國民經濟在此地盤上，在廣泛之社會經濟上完成支配及獨佔，此乃其帝國主義活動之方式。而獨占形態亦由此而生，其基本政策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顯現之現象，日本據台之殖民政策有二個主要特徵：

- (一) 台灣與中國大陸隔離政策：據台後，立即採取各種措施，務使台灣同胞不能再與中國作任何聯繫，而忘記自己之淵源，以及在文化上之「交道」。
- (二) 「差別待遇」與「歧視」：日本殖民者任憑口口聲聲以「一視同仁」、「待遇平等」、「內台如一」等美麗謊言來哄騙台灣百姓，實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除政策措施有明顯之區別外，不但公私機關有不平等待遇，教育上有差別教育，甚至在其投降前夕之物質配給，日台人亦各有別。此種措施均成為刺激台灣百姓民族意識，引起反抗運動之因素。¹¹⁸

《浪淘沙》中周福生拒入日本籍，堅持改做在台灣的清國僑民一事，便是日本殖民者欲隔離台灣與中國大陸之明顯策略。警察分別到各家調查戶口，調查居民改隸國籍的意願，那些願意改成日本籍的，便填列表格，那些願意回唐山的，便叫他們早日變賣財產，務必在期限前搭船回大陸。在這武力抵抗的一代中，此期間之初各地義民風起雲湧，群起反抗，在這國籍改隸的關頭，一些潛伏地下的抗日領袖召集了幾千個義勇軍，聯合起來向台北進攻，最後義勇軍雖不支敗退，但日本當局除以武力鎮壓，竭盡全力建立其「殖民地體制」，部署「統治」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且設法「安撫」居民，對於台灣同胞原有風俗習慣，無暇干涉。周福生為剃頭光老婆懷孕未能清掃環境，遭菊池巡佐怒斥，最後在通譯說明台灣習俗——胎神的原委後，「真不可

¹¹⁸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491。

理解哪！你們這些『本島人』！」菊池巡佐搖搖頭說。¹¹⁹因之除認為妨礙「治政」，有礙觀瞻之辮髮纏足，藉台人之口大倡改革外，不敢妄動，而美其名曰「尊重」。一切措施寬猛應時適度運用，一切以樹立台灣殖民地體制之全面基礎為首要，這段時期可稱為「綏撫時期」。¹²⁰

三、羅希典（江龍志）噤聲與抵抗之轉向

自 1895 年馬關條約割台，台灣在日治五十年間，歷經十九任總督及三次政策轉變：（一）前期（1895～1919）：為第一至第七任的「武官總督」時代，其治台任務在於鎮壓台人的武力抵抗及招撫番人，並意圖奠基開發台灣；（二）中期（1919～1936）：是八至十六任的「文官總督」時代，為對治台灣人的政治運動，改採「日台一體」的懷柔策略；（三）後期（1936～1945）：是第十七任至第十九任的「武官總督」時代，此期任務重點在於整備台灣為太平洋戰爭的南方作戰基地。

121

日本殖民政權據台五十年，分前、中、後三期有不同的總督派任，同樣地以這五十年為背景，不同的是以台灣為主體，筆者將之劃分為武力抵抗的一代、壓不扁的成長、戰火下掙扎的三代。但在武力抵抗的一代中並非以武力抵抗殖民者而一成不變，惟此時期，依其抗爭之先後、涵義、方式、形態，又可分為三階段：（一）衛台之戰。（二）全面抗爭之游擊戰。（三）革命蜂起事件。¹²²此三階段，各具有其特徵及意義，然反對敵人侵占，不願異族統治，揭竿起義，而其以武力撲鬥以及不甘屈服之民族精神則是一致的。然而到第三階段革命蜂起事件時期，一般庶民的反應內心雖支持抵抗日殖民政權，但外顯的行為已漸噤聲。以烏鴉錦之役為例，他全身黑衣黑褲，包著黑色頭巾，胸前一條銀錶鏈，腰上繫一條發亮的皮帶，一只扁鑽掛在右腰下，左皮帶上斜插一只黑柄的左輪手槍，英姿煥發，威風凜凜。一見到他，所

¹¹⁹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淘第五章／豬狗兄弟，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263。

¹²⁰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493。

¹²¹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492。

¹²²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656。

有義勇軍便即刻歡聲雷動高呼起來：「羅希典！羅希典！羅希典！」¹²³這是武力抵抗的羅希典，也是衛台挺身而戰的羅希典。再看《浪淘沙》文中的另一章節「皮痛肉不痛」：有一段長久的時期，羅希典也像其他烏鴉錦的鄉民一樣杳無消息，一直到五、六年後，才有幾個相知的故友探知他終於落戶在湖口鄉邊界的一個叫「波羅汶」的小莊裡。這是一個人口不滿一千人的客家庄，住的都是農夫，羅希典便在那裡買了幾畝田地，一邊耕農，一邊設私塾教人漢文。這時，他已有一個七歲的男孩，因為他本人已改名換姓叫「江龍志」。¹²⁴從烏鴉錦之役的羅希典，五、六年的時間，武力抵抗由衛台之戰經全面抗爭之游擊戰而至革命蜂起事件，羅希典的英姿煥發、威風凜凜已轉變成一邊耕田、一邊設私塾教人漢文的「江龍志」了。這樣的轉變外在上是噤聲了，但噤聲中何嘗不也是一種抵抗之轉向。轉向深入幽微，在日本殖民政權已完全宰制的情況中，找出抵抗的可能。如果「一邊耕田」是一種生活態度應也是與日本殖民體制的一種「相處」；那「一邊設私塾教人漢文」不但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對日本殖民體制的一種「抵抗」。在看似噤聲的江龍志，仍以「設私塾教漢文」對日本殖民者發出異聲，對殖民者發出抵抗的微弱異聲。

持平而言，被納入資本主義編制中，台灣社會一改舊貌，各方面明顯地有長足的進步。但是事實上，卻產生更多弊端。學者陳芳明即認為：

台灣社會之所以會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並非來自台灣歷史條件的要求，而是由於淪為殖民地而受到日本經濟體制的支配所致。日本在台灣進行的現代化改造，……是為了加速扶植日本資本主義的成長。……藉著現代化的假面，日本殖民者可以更為科學而理性的對台灣人的身體與思想進行

¹²³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八章/烏鴉錦之役，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92。

¹²⁴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上冊，浪第三章/皮痛肉不痛，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167。

控制。這種跛腳式的資本主義，構築了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基石。¹²⁵

進一步來說，日人治台時期在農業成就上不可謂不大，甚至使得光復後來台的大陸農業專家大開眼界。不過，他們之所以「對當時台灣盛加稱讚，當係以大陸的狀況作為參考背景的」¹²⁶而能注意到日本殖民經驗所留下若干傷痕者，仍大有人在，如蔣夢麟即指出：電力及化學肥料雖十分普及且大量應用，但是台灣並無製造電器用具的工廠，也無大規模之肥料製造廠，「理由何在，一言以蔽之，殖民政策是也。」¹²⁷

這樣的殖民政策對台灣百姓而言，它尚未由現代性加以塗脂抹粉，它的血腥本質對武力抵抗的一代、對親身經歷目睹抗日風雲的一代是永遠磨滅不去的深層記憶。不論是為生存本質而抵抗，或噤聲與抵抗之雜揉，其抵抗的意識是不變的。在日本殖民體制戴上偽飾面具的現代性尚未籠罩全台時，台灣的傳統社會尚未被改造，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亦未完全消失。羅希典的武力抵抗是抗日、江龍志的設私塾教漢文是一種抵抗、周福生堅拒入日本國籍亦是抵抗，對日本殖民體制的抵抗。對羅希典、江龍志、周福生等抵抗的一代來說，在殖民現代性氛圍淡薄下反殖民的溫度是滾燙的，令日本殖民者不得不顛顛驚驚、小心翼翼。

¹²⁵ 學者陳芳明〈現代性與殖民的矛盾〉收入，江自得 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0，P65、66。

¹²⁶ 黃俊傑 著《戰後台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市，正中書局，1995，P155。

¹²⁷ 蔣夢麟 著〈適應中國歷史政治及社會背景之農後會工作〉收入《孟鄰文存》，台北市，P155、156。

第二節 壓不扁的成長的一代

1920 年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史的分水嶺，從 1895 年 5 月 31 日，日軍登陸三貂嶺以來，總督府雖然於 11 月宣布「全島平定」，但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實際綿延二十年之久，除登陸初期，全島持續性的戰鬥之外，其後更經歷了北埔事件（1907）、林圯埔事件（1910）、苗栗事件（1913）等重大起義抗暴行動，直迄 1915 年傷亡及被捕殺害達數千人的西來庵事件——最後的大規模武裝抗日行動——熄止。¹²⁸雖然無法改變被統治、被殖民的命運，但在長久的抵抗過程中，也因此改變了台灣社會的體質與結構。1923 年爆發的農民集體請願運動，以及 1925 年爆發的二林蔗農事件，便是高度掠奪下造成的官逼民反的結果。學者陳芳明便指出：

在 1927 年以前，台灣只看到零星的農民運動。到 1927 年以後，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才普遍展開。從史實可以看出來，日據時期台灣人民與日本統治者的最大經濟矛盾，乃是土地問題。日本殖民者對台灣土地、山林的掠奪，象徵著台灣從農業社會走向近代工業的一個劇痛，承擔這個劇痛的傷口者，便是台灣廣大的農民。從 1895 年日本據台以後，……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日本統治者在台灣社會為其資本主義的侵略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土地問題上，日本人在這段時期的台灣完成了兩件重要的工作：

第一：確立現代的法權，那就是把傳統的大租、小租予以近代合法化，使其成為地主。

第二：進行土地山林的沒收，這是完全資本原始累積的重要手段。

¹²⁸ 彭瑞金 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7，P3。

這兩大工作的重要目的，便是爲了進行新的土地分配。¹²⁹而日本殖民者的壓迫與剝削都是瘋狂而殘酷的手段，楊逵的《送報伙》提到這一段：

村裏的××製糖公司說是要開辦農場，爲了收買土地大大地活動起來了。……警部補老爺，本村底警察分所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就用了凜然的眼光望了一圈。……「我不願意賣，所以沒有帶圖章來！」……「拖去！這個支那豬！」警部狠狠地打了父親一掌，……第六天父親回來後，父親身上全是鹿一樣的斑點。¹³⁰時價二千元的土地，製糖公司說六百圓是高價，拒賣者一頓毒打加六天拘留刑求。日本殖民政權以這種方式強壓百姓就範，殖民經濟即在此地盤上，在廣泛之社會經濟上完成支配及獨占。

自民國七年（1918）至八年起經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蘆溝橋事變前後止，此一時期之初，正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自由思想風靡一世，民族自決主義瀰漫全世界，日本國力亦在此期間中急速發展、膨脹，列入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此新暴發戶躊躇滿志，台灣經營亦大有進展，台人則隨時勢之變遷，社會之進步，教育之普及，民智大開，民族覺醒顯著，日人爲籠絡台人，便其「統治」順利計，轉取「同化政策」，侈談「一視同仁」、「內台一如」，高倡「內地延長主義」。故亦稱「同化政策時期」。¹³¹

同化政策時期（1918～1937）相對照於《浪淘沙》中主要人物丘雅信、江東蘭，約略正值求學時期。這一代的父執輩可能親身經歷抗日的大小戰役，可能感受過日本當局武力鎮壓的手段。但這些風起雲湧的抗日事件到丘雅信、江東蘭這一代，只能耳聞長輩在佳節例假休閒時，鄉紳耆老講天說皇帝時談及：鳳山的林少貓被日軍包圍打死、大坪頂鐵國山柯鐵虎、張呂良與日本講和結果被機關槍掃死、說自己是清朝子民卻被清朝官吏逮捕交給日本當局的簡大獅……。不管是堅

¹²⁹ 學者陳芳明〈先人之血，土地之花—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的背景〉收入 台灣文學研究會 主編《先人文血·土地之花》，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P277、278。

¹³⁰ 施淑 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93～97。

¹³¹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493。

持抵抗的羅希典到爾後這些抵抗後轉向求和的作為對丘雅信、江東蘭這一代來說已變成上一代的故事，日本殖民體制已由「綏撫時期」進入「同化政策時期」。

一、丘雅信

丘雅信成長於漢人社會、文化傳統尚未被日本現代文化完全取代的氛圍中。丘雅信和生父相處時間雖短，但那首「草螟公」唱得令生父林之乾眼淚奪眶而出，令繼父丘元家得意飛揚。進入私塾「摩詰書房」，丘雅信接受漢文教育，中國士人的文化傳統對她也有一定的影響。八歲進入公學校，接受殖民政府的現代教育，則為她打開不同於傳統的文化視野，讓她在時代思潮的變化中，接受新的文化價值。這兩種不同文化的影響，讓丘雅信在面對殖民現代性與反殖民的價值衝突時，有保守傳統的作為、有理性有人性的堅持更有融合與再生的反省力，時而呈現不同的面向。

雅信幼年時母親每天都替雅信梳頭打辮子，把她打扮得像個洋娃娃，不但厝邊隔鄰喜歡她，連一個叫「菊池」的日本巡佐也喜歡她。菊池是個中年的獨身警察，他巡邏的主要對象是沿街叫賣的攤販，遇到食攤不潔有蒼蠅飛繞的，就當場取締，大罵他們一頓，甚至拳打腳踢，關進派出所。但菊池對一些富豪或有受教育的人，倒也彬彬有禮，對雅信這樣可愛又乾淨的小女孩，則又把她當成小天使一般看待了。從這樣的成長歷程看出同樣在台灣受日本殖民體制統治，雅信的成長在父親優勢庇蔭下是不同於一般受經濟困頓所苦的基層庶民。當同年齡的孩子可能因家庭經濟因素無法升學，得為生活、為生存、為一口飯而流血、流汗時，丘雅信有幸從私塾、公學校、淡水女學一路在家人支持、周遭親友祝福下成長。厚實的經濟支援，免除了雅信接受現代教育的後顧之憂，同樣地也相當程度阻絕了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庶民為生存而奮鬥的親身體驗。但也因為這樣的順遂，讓她的成長，改變是溫文而理性。

當丘雅信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淡水女學時，在金姑娘鼓勵下欲赴日本東京報考女子醫科大學。起初母親反對，鄰人更言：「……恐驚後拜續趣一個子轉來也沒可定哦……」這樣的流言堅定了母親反對的決心，但也更堅決了丘雅信的意志。二個因肺病而逝世的父親，加上受現代教育的成長歷程，最後在金姑娘費了不少唇舌，終於說服了母親，同意讓雅信到日本去求學。丘雅信更咬牙切齒，暗暗對自己說：「好！您加我看！我死也欲讀到畢業給您看！」傳統與現代觀念的衝擊在赴日求學這件事上，丘雅信在輾轉的波折上取得了繼續成長的空間。這個成長空間是以調適勝過反對的精神，不斷往現代性修正、靠攏，這個過程也不知不覺形塑了「現代等於進步」的概念。優越的環境阻隔了殖民主義對丘雅信相當程度的侵蝕，對日本殖民體制所帶來的現代性，此時期為止的丘雅信有著高度的接受力，卻無反思力，或可說她耽溺於個人主義色彩中，對周遭生活困頓、窮苦的大眾尚未多一分關懷，反殖民之思考自是尚未開展。

再回頭觀察丘雅信欲赴日報考女子醫學大學時台灣的時空：丘雅信拜訪大伯林之本，林之本說：「你將來欲做醫生，……若遇著好額人，你只爲你加揩，大百大百加揩，只爲你免細膩！」「親生子不值自己財；自己財不值荷包內」。到澳底向大姨相辭，大姨皺著眉頭說：「讀醫生是真好啦，但是…… 彼死日本仔…你知影？您姨丈一家五個兄弟攏給打打死，一時攏去做水鬼，你著會記得哦！」拜別母親時，母親許秀英的叮嚀：「你若不愛給老母煩惱，上好不通去跟人插政治，千萬不通去反對官廳……」。大伯的態度是典型資本主義的利益至上。大姨贊成當醫生求學，對五位姨丈的慘死，尙能訓勉下一代記取。母親的態度要求丘雅信遠離政治，不得反對官廳。此一時期的台灣社會已臣服於日本現代化殖民糖衣之下，喪失了抵抗、批判日本現代化面具下的殖民實體，與上一代抵抗的一代涇渭分明，以現代性馬首是瞻似成社會主流。

丘雅信到日本唸書，吃飯時周遭竊竊私語，低聲問她：「你們還割人頭嗎？」睡覺時隔壁用一種揶揄調侃的聲音唱著：「清——國——奴

——啊——，清——國——奴——啊——……」這時的雅信不想去理會他們，只咬緊牙根，把被往頭上一蒙，眼淚又簌簌地滾下來……。沮喪氣餒只得「打斷嘴齒含血吞」，與日本學生的疏離感，這一切都得忍。這些情景應讓丘雅信感受到殖民烈日的光焰，在台灣未深刻體悟到的被殖民身份，在日本因語言、習慣，台灣人身份而突顯被殖民者的不同。殖民烈日下仍得尋求求生管道與轉向，藉由日本殖民者的女子醫學大學為己身護持，專注課業，重新尋回凝視的目標。在台灣因富足的生活背景，未深刻感受被殖民者的悲悽、困頓。到了日本因風俗習慣差異與日本對台灣之歧視，彰顯了被殖民的身分。考取女子醫學大學是現代性的追逐；台灣被殖者的確認是被殖民者的身分釐清。現代性、殖民性的交錯，唯一能使他心寬的是——終有一天，他會變作醫生，然後回到台灣，去救濟島上那許多窮苦的病人。(500)此時的丘雅信看似屈服、流放的姿態，卻已透過不同的方式，在某程度上對殖民現代性重新評估，取得自我的發聲位置及歸屬。

二、江東蘭

江東蘭為烏鴉錦之役大將羅希典（江龍志）之子，有「江東子弟」與「磊落不泥」的雙重意味。誕生時間約 1901 年左右。羅希典在烏鴉錦之役後改名江龍志，在湖口鄉的波羅汶的小莊裡買了幾畝田地，一邊耕田，一邊設私塾教漢文。農閒時家中大廳常聚集了好多人，談農事、談台灣人抗日事件。農事、抗日應就是江東蘭成長過程中聽聞最多的話題了。「湖口公學校」的設立¹³²正值江東蘭適學年齡，在江龍志不置可否下，江東蘭欣然地前往就讀。畢業後在家賦閒了兩年，雖畢業前的幾年，他都得了全班第一名，但一目少爺多方探訪的結果，才知道台北的幾個中學都是日本官方專門為在台灣日本子弟建的，台

¹³² 台灣省文獻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591。當時日人為推行殖民地教育，先設日語原稱國語學校及日語傳習所，以實施日語訓練。不久，改為小學校與公學校。小學校幾全收日人，公學校則全部為台灣同胞，此兩種學校均為六年制，另又有專為山地人而設之教育處所。至民國九年（1920）始許台灣同胞與日人共學。

灣人的子弟不用說不能進去讀，連報考也不允許。¹³³直至林獻堂一些人合議要在台中創設一間中學，叫「台中中學」，專為台灣子弟而設的中學，江東蘭的求學路徑才有了新的成長空間。¹³⁴

日本人自一開始即以對台灣人之教育作為其殖民地政策重要的一環。當然其出發點絕非提昇素質，而是配合開發及建設，消滅傳統文化為前提，推行其日語教育。據台翌年即 1896 年，即相繼創設「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後國語傳習所屬於初等教育機構者則普設公學校。中學寥寥無幾，且初不准台人創設，如民國四年即 1915 年林獻堂所創立之台中中學校，後亦被迫改為公立台中中學校。其教育方針，除推行日語教育外，對台灣人則普設代價低廉之普通教育為主體，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則故意加以漠視。民國二十一年即 1932 年實施台日人「共學制」，實乃配合時勢，配合「同化政策」、「一視同仁」、「內台一如」之樣板，僅屬裝飾門面之舉。依照這些時間軸檢視江東蘭（1901～）成長求學時刻中，幾個重大的時間座標：

1896：日本殖民政權相繼創設「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後國語傳習所大有改變，屬於初等教育機構者則普設公學校。

1914：這一年之前台北中學校、台南中學校，台灣同胞是不得入其門。

1915：由於台灣同胞之請願，設立公立台中中學。

日本的入侵，殖民體制的崛起，尤其是 1915 年台中中學的設立是否使當時的江東蘭在不知不覺中，傾向現代教育、傾向裹了糖衣的殖民體系？對台灣的種種、對抵抗的意識是漸次疏離？到日本「神戶商

¹³³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593。日據時期之中等教育，始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日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設尋常中學科，為日籍兒童之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稱中學部。至光緒二十三年（1907）中學校官制實施，改該中學部為獨立之台北中學校，分第一部及第二部。第一部修業年限為六年，分前期與後期各三年；第二部修業年限為五年。並於第一部另設高等科，年限為二年；第二部另設補習科年限一年。民國三年（1914）於台南設立五年制之台南中學校，此二所均為州立之中學，台灣同胞不得入其門。

¹³⁴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593。民國四年（1915）由於台胞之請願，設立公立台中中學，校址、校舍之創建及一切經費概由台胞自理。學生須寄宿學校宿舍，宿舍管理及學生生活方式，純為日本式，部分學生甚感不慣而退校。此種中學校為四年制，畢業生無資格投考日本專科以上學校。

科大學」留學更是浸淫於知識殿堂，放棄商科轉念「早稻田大學」開始專心一意研究自己喜愛的英國文學。其實 1896 年日本殖民體制的逐年普設公學校是為配合開發及建設、為消滅傳統文化為前提。1914 年之前設立之台中學校、台南中學校是為其在台之日本子弟而設，1915 年台中中學之設立是迫於民眾之請願，校舍之創建及一切經費由台灣同胞自理，後亦被迫改為公立台中中學校，¹³⁵這些現代性作為、現代化措施從來就是以日本人的利益為中心，殖民主義不斷擴張，台灣人就不斷被邊緣化。也就是說這些日本殖民作為一無是處？當然不是，當江東蘭欲就讀「湖口公學校」時，江龍志的態度是不置可否，相較於江東蘭那是強烈對比。

養雞非愛雞，只為取卵。廣設公學校是為配合開發及建設、為消滅傳統文化為前提。台中中學校的設立亦非日本殖民體制主動作為而是被迫。日本殖民體制的這些作為以展示現代性為信仰，對傳統的論述加以撻伐。在這樣失衡的接受下，逐漸地，最為知識份子所推崇的「知識」與「教養」，只剩下工具性價值以及毫無實質意義的空殼。然而，就算想轉而追求物質生活之改善的手段，卻還是困在殖民統治不平衡的經濟結構中，而造成「時代的陰影」。江龍志的「不置可否」不敢說洞悉全局，至少他看出日本殖民體制的方向。幸虧他塑造出的環境是本土的、是傳統的、更是抵抗的氛圍，令江東蘭在接受日本殖民現代性的過程中多了一些白血球的抗體。湖口公學校入學前，江東蘭答應父親晚上回家仍繼續與父親學漢文，這時淡漠的江龍志才「會心地微笑起來」。當一目少爺帶江東蘭赴台中考試途中，在新竹城隍廟抽籤問考運，東蘭的反應是「沒有任何意見」、「頗為好奇，想親眼看看」。在神戶商科大學患肺蛭病的一目少爺接回台灣的船上，發現江東蘭將一目少爺送他的紅色香符夾在書裡，便將它戴在東蘭的脖子上。從這三個點來看：公學校入學前父親要求仍得學漢文，江東蘭的反應是「猛點著頭」。進中學前入城隍廟抽籤是「沒有任何意見」。赴日就讀神戶

¹³⁵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499、593。

商科大學前一目少爺送的護身符是夾在書裡，患了肺蛭病返台休養時，一目少爺發現了才又幫他戴上。如果漢文、拜拜抽籤、戴護身符彰顯的是本土、是傳統，那麼江東蘭隨著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深化，與本土傳統的距離是漸行漸遠，當然更不見抵抗的意識於絲毫。

當江東蘭從早稻田英文系畢業，帶著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的公文信，等待台北帝國大學英語系教職時，在主任秘書一谷有二那付媚上傲下、瞬息萬變的分派下變成新竹中學教師。江東蘭潛在的反感與愠怒，一時氾濫開來，握拳往桌上一槌，咬著牙根走出家門，往那田間的小泥路漫步走去……。在新竹中學任職，每晚代日本教職員巡更值夜，一句話都沒。經工友阿清點破，他才有一種被愚弄、被人欺哄的感覺，這種感覺使他感到憤慨，被同事踩在腳底而竟不自知。受總督府欲從全台灣島上的二十七個中學校，每個中學校選出一位英文先生到軍隊去充當翻譯官，鬼木校長飛揚眉毛，綻開猙獰地推薦了江東蘭。江東蘭倏地從沙發立起，對鬼木校長連回也不屑回，跨著大步逕自往門口走出去。

江東蘭新竹中學的教職是早稻田大學畢業展現現代性的光輝，從台北帝國大學教職變成中學教職是殖民主義的陰暗。在只有認命與屈從的氛圍下，不見一絲抵抗，江東蘭亦是調適的精神勝過反對的精神，而殖民現代性同時具有的光輝與陰暗，也就對江東蘭發揮了它的作用。任職新竹中學雖未因無力抵抗而逐漸放棄、墮落而絕望，卻也努力在殖民體制下，不管是物質或精神盡最大努力以調適自我。這樣的調適流露的卻是菁英知識份子的自恃（不經工友阿清點破，什麼都不知），更結合了知識分子對知識高度權威化與理想化，以為具有知識就能排除低俗基因的想法。新竹中學任職之初，自願值夜長達一年。但當江東蘭看清同事平時客氣的笑容，揭開顯露出那藏在面具後猙獰的真面目，原來他們的笑是虛偽的，他們的客氣是裝出來的，他們的好意是要利用他，他有一種被愚弄、受人欺哄的感覺，這種感覺使他感到憤慨，被同事踩在腳底下而竟不自知。（616）江東蘭更在不知不覺或錯覺中將日本、台灣知識份子與群眾結合成「知識份子／日本文化」

與「庸碌群眾／台灣文化」的迷思。最後當江東蘭的「知識」變成生存的工具與技能，而不是「向權勢說真話」的籌碼時，不管外部表現態度不同，於內部精神層面而言，現代性的調適勝過反對精神，看不見或視而不見造成時代陰影的真正因素——「殖民現代性」的制肘。

第三節 戰火下的掙扎的一代

本節擬探討《浪淘沙》文本中第三代主要人物，包括彭亨、彭立、江河清、江東寧為主要代表。這一代誕生於 1941 年二次大戰前後，亦正值日本殖民政權正如火如荼推展「皇民化」時期。蘆溝橋侵華戰爭之後，日本泥足深陷，全國逐漸進入所謂戰時體制，繼而孤注一擲，發動太平洋戰爭，國力消耗至鉅，人力物力羅掘俱窮，需要台人全面協助，出人力供驅使，出物資俾挹注甚殷，然而深感倘要台人「真誠」、「同心協力」，實非台人完全「日本化」不可，因此，乃由同化政策更進一步，積極從精神上圖消滅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生活樣式及色彩，全力推行所謂「皇民化運動」，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乃大倡台人之全面日本化，此一施策一直至 1945 年台灣光復為止，本時期通稱為「皇民化時期」。(1937~1945)¹³⁶根據學者陳建忠指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本土為因應長期戰爭與國防經濟體制的需要，於一九三八年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在台灣，也推行所謂「皇民化運動」，主要項目有：國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宗教、風俗改革，目的就是把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或「皇國的臣民」，也就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人，在性質上屬於極端的同化主義，而實際上則配合戰爭的需要。其中，一九四二年開始實施志願兵制度，造成許多台灣青年從軍的熱潮，所謂「皇民文學」有不少正是描繪台灣人如何嚮往從軍、成為真正皇民的心路歷程。

當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西來庵事件在 1915 年熄止，在 1918 年日本殖民體制成功收奪土地以後，日本殖民體制對台灣的掠奪，對百姓壓榨猶如「水銀滲透人體」一般。雖零星地有「台灣文化協會」(1921)、「台灣農民組合」(1926)的出現，但日本殖民體制之於台灣，

¹³⁶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80，P494。

已深入血脈肌裏、盤根錯結，非一陣風所能撼動。遺忘抵抗、遇事認命、面對壓迫只得屈從，如此挫敗，黑暗的心靈逐漸籠罩了台灣的天空。也正當抵抗的遺忘和認命、屈從的瀰漫、一切悲劇歸諸於命運的無奈，在 1941 年二次大戰開始後，歷史的狂風更將台灣吹向暴風圈中。《浪淘沙》中人物彭亭、彭立、江河清、江東寧在這滔滔激流中，如何生存、如何忍受，擬在本節中討論。

一、彭亭、彭立

日本殖民體制不僅是一種制度更是日本的一個象徵性的勝利。在本質上，台灣提供日本主要的食物來源，使日本能夠利用台灣的農業潛力，來彌補本身逐漸成長的工業部門。除經濟措施外，日本也提供台灣社會改善的基礎，使台灣意外獲致邊陲國家一向缺乏的資源與開發。然而，日本的若干開發雖對台灣產生正面影響，台灣人的利益永遠在日本人的利益之下。因此，這是一面剝削，一面開發的一個例子。台灣的工業化是與日本的戰時體制同時推進的；日本軍事的勝敗直接影響台灣工業化的腳步。¹³⁷換言之，台灣的工業化程度，完全取決於日本殖民國發展的需要與設計。日本更為鞏固其殖民霸權，迫使台民為保身而遠政治；並以控制經濟活動為手段，將台民鎖納於既經設計的生活模式中，其對土地的併奪及勞力之壓榨，對台灣人來說是血跡斑斑，即令日本人都難以自圓其說，無怪乎矢內原忠雄便一語道破：甘蔗糖業的歷史，正是殖民地的歷史。¹³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來日本殖民統治者眼中的他者——台灣人，被視如日本同胞一樣接受動員徵召，作為志願軍及砲灰。當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烽火蔓延，台民被迫鎖困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共犯結構之中，大陸與台灣的關係益顯複雜。在此期間遠赴大陸者，有少數知識分子是明目張膽地自願以次等日本人身分，操弄流利的日語，與大陸新興自治政府合作。不過，最常見的是像吳濁流筆下《亞細亞的孤兒》

¹³⁷ 涂兆彥 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93，P148。

¹³⁸ 涂兆彥 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93，P92。

的主角一樣，小心翼翼地不願傷害彼此的感情。這些種種的根源在於日本殖民體制，更由於「皇民化」政策的深化，所暴露出來的是殖民者那高高在上的不可一世的神氣。這種神氣，透過他的仰慕者的「模仿」顯得更加盛氣凌人，其「味」難擋。¹³⁹

彭亭的誕生在《浪淘沙》文本中著墨極少：當丘雅信陣痛終於來臨，彭英連忙去雇了一輛黑頭仔車，把雅信送到「馬偕醫院」，那生產是太快也太順利了，還沒等接生醫生與護士來幫忙，一個女嬰已呱呱落地了，彭英見了，好高興，他給她起了名字叫「彭亭」。而彭立的誕生也最簡短：雅信和彭英，連著由日本帶來的雪子，便來台中，在台中公園附近，向林獻堂的近親租下了一間大厝，經過一番翻修與整頓，正式開業做起婦產科醫生。……不至兩年，醫院已經有了許多固定的患者，而雅信也有一筆相當可觀的儲蓄，也這在這一年，雅信又生了一個孩子，因為是男孩，彭英給他取名字叫「彭立」。

彭亭誕生前祖母許秀英堅持「嫁出去的查某子若像潑出去的水，有給伊轉來做客，沒給伊轉來生子」，丘雅信看母親語氣堅定，無法違拗的樣子，只得在老屋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等待臨盆之日。當醫院業務穩定欲在台中火車站附近買地建醫院時，地主松島先生見是醫生要向他買地建醫院，便笑眼逐開地說：「不是我不願把地賣給『本島人』，實在是一般『本島人』都很髒，而這附近的又都是『內地人』，你們也都知道『內地人』都有『清潔癖』，我若把地賣給『本島人』，這些內地人大家都要起來說話了。不過話說回來，我看你們兩位都是到『內地』念過大學的，一定很清潔，而醫生又是救人的，醫院更非乾淨不可，所以你們如果要買那塊地，我可以放心賣給你們，這些『內地人』不但不會出來說話，相信還十分歡迎你們呢。」¹⁴⁰

彭亭誕生的時間約 1930 年代殖民現代性已漸植台灣社會，殖民者以現代文明為餌，誘使台灣人放棄原有的一切。但「嫁出去的查某子

¹³⁹ 學者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收入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市，遠流，2000，P55。

¹⁴⁰ 東方白著《浪淘沙》中冊，淘第十六章/支那之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801。

若像潑出去的水，有給伊轉來做客，沒給伊轉來生子」的台灣習俗仍根植人心與社會，「同化政策」（1918～1937）影響力雖無遠弗屆，但畢竟仍有其侷限。彭亨誕生後的兩年，彭立也誕生了，雅信欲建醫院，地主松島先生的回答，乍聽是客套、無惡意。但正也是這種客套、不經意、自然，而將台灣人固定、將台灣人禁錮、將台灣人原始化、反文明化，正是這種不經意讓人惱火。無怪乎學者呂正惠言：

日本殖民者那高高在上的不可一世的神氣。這種神氣，透過他的仰慕者的「模仿」，顯得更加盛氣凌人，其「味」難擋。

141

地主松島先生將台灣人與髒亂劃上等號，正是典型日本殖民者將台灣固定在這形象上，將台灣人沾黏、將台灣人囚禁，將這種負面特質成爲台灣人之本質。髒亂＝台灣人、清潔＝日本人自然中建構起來，日本內地＝有水準，台灣本地＝髒、亂，也在不知不覺、台灣人不置可否中成爲論述中自然、不經意的顯現。這就是 1937～1945 的皇民化時期，表面上似乎已逐漸現代化（建醫院、接受教育當醫生）的台灣，深一層的觀察更可說被殖民的程度也更深化了。（土地資源的擁有、髒亂／清潔的論述）都在日本殖民主的手上，歷史記憶與社會論述已全然被日本人主導甚或改寫了。在這樣的皇民化時期，依照殖民者的範式，欲徹底改造台灣人。皇民化的強制開展，並非只停留在語言的層面，而是欲滲透到台灣人的內心，直到靈魂深處、骨髓深處。在相當一部分的台灣人身上與社會氛圍，只知殖民現代性，抵抗意識不是淡薄、更可能是不見絲毫。彭亨、彭立這一代在大環境感染下，殖民現代性是生活主軸，抵抗意識已漸沈睡，反殖民的力量也在這樣的情勢下，逐漸消退。無怪乎有人認爲：皇民化運動，的確是打擊台灣人脊

¹⁴¹ 學者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收入江自得 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市，遠流，2000，P55。

梁骨的政策。¹⁴²

二、江河清、江東寧

江東蘭、陳芸夫婦的兩個孩子江河清、江東寧，依《浪淘沙》文本之推算誕生時間約 1936、1937 年，亦即是「皇民化政策」開始之時期。這時的江東蘭租到一幢平房的日本宿舍，在清靜的小巷裡，前後各有一個小花園。後來在新竹市找到一塊空地，是一位有錢的日本人擁有的，聽說東蘭在「新竹中學」教英文，那日本人便一口氣把那塊地賣給東蘭了。東蘭請設計師設計一幢四房一廳的日本宿舍，前後各有花園，那屋後的花園裡有池塘、有假山，池邊種了一棵柳樹，那柳枝幾乎垂到池塘的水面上，池塘四周另外種有石榴、蘇鐵、秋海棠、宮人草、芙蓉、八仙、天竺葵……而屋前的花園則種有柚子樹、杜鵑花，所以春天的時候，當柚子開了白花，那花香四溢，加上那粉紅大的杜鵑花，把路過大門的行人都吸引住了，他們都在門前向屋裡的花園探望，留戀不忍離去。¹⁴³

如此景緻，繁花點點，綠葉成蔭，幸福氛圍嗅不到殖民氣氛，這一自在空間是江東蘭努力在殖民體制下，不管是在物質或精神上，盡最大努力所改善、創造出來的。江河清、江東寧在這樣的環境，聞得到殖民氣味？江東蘭更發覺他心靈底處的秘密，原來也不愛奢華、不愛喧囂，只愛樸素與安謐，於是在這花園裡，他找到自己。¹⁴⁴這相當程度也代表著對外面殖民體制的絕望，受制於殖民統治的壓迫，因無力抵抗而逐漸放棄。學校是殖民者所展現的現代性，江東蘭雖未以殖民者展示的現代性為信仰，卻在生活上已產生依賴情結。江河清、江東寧在父親感染下，在日本殖民主面前如何能昂首挺胸？靜默、噤聲在皇民化時期已是很多人的共同面相。像江東蘭般努力的知識份子，傳達出對時代的生存希望，應是想為自己掙得一處呼吸空間，更讓江

¹⁴² 吳濁流 著《亞細亞的孤兒》，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2005，P232。

¹⁴³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中冊，淘第十五章/大蘭花，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761。

¹⁴⁴ 東方白 著《浪淘沙》中冊，淘第十五章/大蘭花，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P761。

河清、江東寧得以喘息吧！

同樣描寫日據時期皇民化時期作品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作者龍瑛宗筆下的知識份子，對現實社會失望，對明日絕望，更失去了民族意識，這種扭曲的心態以及脆弱得不堪一擊的空虛心靈，正構成了戰爭期間黑暗的法西斯世界來臨的前夕之縮圖。¹⁴⁵《浪淘沙》中江東蘭在這個時期進新竹中學是失望，代日籍同事值夜一事經工友阿清點通後亦徹底絕望，無怪乎他稱在花園裡找到自己，只愛樸素與安謐。知識分子躲進自己構築的世界，「知識」只是生存的工具與技能，殖民現代性的天空下，皇民化的催化，留日知識份子對面殖民現代性只能調適再調適，這「毫無抵抗」的陰影持續籠罩在下一代江河清、江東寧身上。既然在台灣社會戰爭陰影覆蓋下沒有百姓敢於抵抗日本的統治、殖民的壓榨、皇民化的操弄，整個社會也就變成了沒有風聲、鳥聲、沒有生氣的死林了。

¹⁴⁵ 古繼堂 著《台灣小說發展史》，文史哲出版社，1996，P113。

第五章 結 論

日本學者垂水千惠在研究他所謂的台灣的「日本語」文學時，發現周金波對「皇民化」所提倡的「進步文明」欣然接受，而呂赫若卻欲拒還迎，似乎顧慮重重。她對周金波讚揚有加，而對呂赫若的態度在困惑之餘卻頗有微詞。她完全無法體會呂赫若想在「近代性」與「本土性」之間取一種平衡的苦心。¹⁴⁶台灣現代化進程，可分為晚清洋務期（1858～1895）與日據殖民期（1895～1945）兩大大段。在這期間，台灣現代化之先驅者為劉銘傳。洋務期後段劉銘傳的新政改革，非常宏偉而富有前瞻性。特別在清賦、建設鐵道和振興新式產業三方面，留下了台灣近（現）代化的光輝史蹟。日本代表性學者史家均給予高度評價。

洋務近代化是由外而內，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近代化。相比之下，殖民近代化是外在的，從屬近代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是非台灣主體的近代化，乃不可取。¹⁴⁷

再從台灣史的觀點來看本土化，也就是從台灣人民的「本土意識」和台灣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來切入。什麼是台灣意識？「台灣意識」指的是一種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觀點，反映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住民對自我身份和所處實況的「認同」。因此台灣意識是動態的、可變的、開放的，重視「住民自決」的過程和信念。¹⁴⁸基本上，台灣意識有二個向度，一個是土地的向度，代表一種逐漸將台灣視為「鄉土」的認同感；另一個是社群的向度，代表一種將台灣住民所形成的生活社群視為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作為一種本土意識，台灣意識的「土地」向度是隨著早期農

¹⁴⁶ 學者呂正惠〈殖民地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收入，江自得 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市，遠流出版，2002，P50。

¹⁴⁷ 學者劉進慶〈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與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收入，洪宜勇主編《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2004，P1。

¹⁴⁸ 張德麟 主編《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台北市，前衛，2003，P136、137。

業移民的落地生根而自然形成的。台灣早期移民的心態大大不同於移居南洋的華僑心態。前者是農業取向的，以土地為重，一方面種稻，一方面種經濟作物。土地是終極關懷，他們的生活重心也就隨之定根台灣了。相對的，後者是商業取向的，以金錢為重，孳孳營利乃為要落葉歸根、衣錦還鄉。金錢既是首要的終極關懷，他們的心也隨之漂泊不定。在「社群」向度方面，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群也藉著商圈、共同防禦體系、祭祀圈的建立，逐漸揚棄舊有的「祖籍地」或地方意識，擺脫肇因於利益爭端的「分類械鬥」的陰影，並擴大、融合成新的生活共同體。不過，整個台灣意識的形成，卻是日本人在台灣建立近代化殖民體制以後的事了。一方面，由於全島行政、交通、通信網的建立，幣制和度量衡的統一，被日本大和異族統治殖民經驗，也將全島各族群受支配、壓迫的自我意識逐漸凝聚成一個「命運休戚與共」的環結。因此，在原先本土意識的社群向度裏就又加上了「命運共同體」的要素。¹⁴⁹

在筆者論文第二章：小說人物對現代性的認同與本土性的堅持，文本中主要人物周福生、丘雅信、江東蘭有各自不同的環境與時空：對所謂「現代」、「文明」渴求可見一斑，對本土的堅持更深印在每日的生活中。當價值體系中因日本殖民者刻意抽離「傳統」之後而留下的空位，幾乎由「現代」所填補，因此，所謂的「理性」的思考也吸引了知識分子的目光，認為只要透過理性思考就能解決問題。但一旦驟然感受到「現代性」的上空有更深一層的「殖民主義」籠罩時，不斷經歷希望與絕望，最後「拋棄所有的矜持、知識、向上與內省，抓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沉的頹廢之身，恍見一片黃昏的荒野」¹⁵⁰，亦或成為努力經營生活的知識份子？當現代性的橫座標與本土化之縱座標因交會所區隔出的四塊區域中，周福生、丘雅信、江東蘭各因自己本身獨特的生活經驗與受教育背景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迴應，各隸屬不同之區間：

¹⁴⁹ 張德麟 主編《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台北市，前衛，2003，P137、138。

¹⁵⁰ 施淑 編《日據時代小說選》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著，台北市，前衛，1992，P258。

一、周福生

屬第二象限（-+），在此一區域中，現代性的指標是負數，雖然現代性是理性的延伸，是理性的思考與價值判斷，但主角可能故意隱而不提或排斥抗拒這樣的作為，在現代性的彰顯上即屬於負數。在第二象限中本土性的屬性仍是正數，積極的面向、知識份子極欲彰顯的精神堡壘，抵抗殖民統治、保存自己本土文化的根之利器。周福生本土性特質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固守土地不輕離：他是個木匠，在福州出生，十五歲隻身渡海到台灣謀生，由學徒到木匠師父，接著又開了一家木器行，並娶了一位基隆的女子謝甜。因父喪回福州奔喪，返台時剛好碰上1895「台灣民主國」成立，兵荒馬亂之際，雖然福州的母親與親戚勸他留在福州，別回台灣。但周福生堅持既娶妻就得與妻白頭偕老，豈可脫逃，不顧妻子死活。當周福生子周台生欲赴南洋開創新天地時，從福州移民到台灣，胼手胝足深耕數十載的周福生並不是那麼支持。因周福生的移民經驗，了解開疆闢土之艱辛。周福生本人在台灣已有一番局面，從學徒、師父，再自己開店，一家溫飽，無庸煩憂。周福生的現在之根與未來之根都與台灣這塊土地緊緊地接連起來。最後折衝之下，兒子周台生赴南洋開創新天地，孫子周明德留在台灣與周福生共同生活。在現代性與本土性的思量與作為中，這兩件事突顯了周福生在顧及理性層面而彰顯出固守本土性的作為。

（二）向殖民者據理力爭、不屈服權威：周福生不為日本殖民體制的「台灣神社」釘一只鐵釘或鋸一塊木頭。開出比平常多三倍的工錢，周福生亦不為所動。周福生堅決的拒絕，是人性之最高美德，亦為台灣庶民在殖民體制下注入、增強了白血球的抗體。因「數飛機」而遭密報觸犯「散播謠言罪」，但對別人污蔑的抵抗，面對日本殖民體制猶如小蝦米對大巨人。對污蔑的抗拒，是對殖民者的批判；堅持的立場，更是自我主體的彰顯、本土化認同的典範。

（三）大男人主義：當周福生與日本人訴訟，收到無罪判決後，大宴親友。不料妻子謝甜扣了大半當「私額錢」。周福生見不怎豐盛的菜餚，勃然大怒，把整張桌子都掀了。謝甜抽噎地說：「你若沒愜意，只爲你加我打，那著在眾人面前掀桌糟踏人……」。周福生用姆指反指自己：「我大丈夫男子漢打你一個綁腳查某人？小人！」。

不顧妻子立場把整張飯桌掀了，是大男人主義的極至了，大丈夫男子漢不打綁腳女子，乍聽似乎有相當分寸，但仔細思量更突顯當時（日據）男尊女卑之不平等狀況。日據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庶民面對殖民者是主從有別、是日主台從的差別位階。在當時社會上、家庭中男女關係亦是主從有別、男主女從的不平等關係。日據殖民體制下的女性面臨的猶如「雙重被殖民」的困境。¹⁵¹

綜合上述三點可看出周福生已將台灣這塊土地視爲鄉土的認同感；將台灣住民所形成的生活社群視爲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這「土地的向度」與「社群的向度」構成紮實的台灣意識。周福生的三個本土性特質中，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就是說在本土性的範疇中有良好質數，也有負面的質數。正面的本土質數是台灣庶民的精神堡壘，盲進、冒動、停滯、落後的本土質數更是台灣社會發展的障礙。周福生現代性的思維雖淡薄，但在本土化的作爲中有傳統、有負面也有理性的一面，這就是日據殖民體制、1895 後在台灣立足的周福生。

二、丘雅信

屬第一象限（++），在這一區塊中現代性的指標是正數，代表著現代化世界的科學與工業的引進，現代文化的進步與開發；在本土性的縱軸上亦是正數。表示它是本土性中的積極面向，良好質數，不但值得保存，更得發揚光大。現代性的正數與本土性的正數代表著殖民者、被殖民者的正向肯定，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均是樂見其成的。但從另一視角：以現代性、本土性來衡量丘雅信，其座標落

¹⁵¹ 盧建榮 著《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P108。

點亦是（++）區間，歸納如下：

（一）有深化的本土氛圍生活，有強勢經濟後盾當圍籬，未讓殖民體制的負面質數侵蝕、剝解。

丘雅信的父母林之乾、許秀英在「村婦佐磨刀，耕農自裹糧」的動盪時代結為夫妻。丘雅信的誕生在日本殖民體制開始不久，台灣本土氛圍尚濃的一個時代。雅信一首「草螟公」唱得令生父林之乾，不禁悲從中來，眼淚不覺便奪眶而出了。繼父丘元家地主身份，令丘雅信母女無庸煩憂衣食，厚實的經濟實力，相當程度防堵了日本殖民體制的異質侵蝕。同樣一首「草螟公」令繼父丘元家聽得心花怒放、得意飛揚。「摩結書院」的王秀才：「真有造化……，嚙不知欲做到什麼狀元也沒可定。」對丘雅信如此評論。「大稻埕公學校」大苗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菊池巡佐的疼惜。在那個悲劇的日本殖民體制中，猶如一朵茉莉，淡淡的香味，啓開了周遭人物的嗅覺，淡淡幽香更啓發了人類善良的本性、溫馨了四周。

（二）在兩位父親及母親愛與包容下，本土性中的理性得以逐次開發，感受知識的重要、堅決求學之意志。

本土性優質建構下，發展出的現代性更為宏觀，更具包容力。

濃郁的本土氛圍建基在厚實經濟實力下成長的丘雅信，他的愛與包容來自周遭的感染，更來自自信，自信的源頭便是接受現代性的教育。過程有悲，所以知努力；過程有苦，所以懂包容。面對愛慕者林仲秋的追求，以「同姓不婚」拒絕，突顯的是對傳統習俗的尊重。「清信醫院」開業期間，面對農夫要丘雅信身上的三粒鈕仔，丘雅信身為醫師的立場卻順勢隨俗的、自然地給了農夫。這樣的本土傳統丘雅信並未大加撻伐，順勢隨俗的作為建基在醫師的科學判斷、現代性的思維。她並未以現代性為唯一準則，並以之做為評價標準；未一味貶抑本土價值，理性的尊重中，讓本土傳統有空間，更令現代性的價值更為提昇。

（三）本土性、現代性細緻慢調的步伐中有接受、有淡然，雖無擎天撼地的步履，但在溫文的作為中猶如溫暖的火花，照亮自己，

更照澈周遭的人心。

丘雅信赴「淡水女學」就讀的態度是「執著而堅定」顯示對知識的渴求、對現代性的嚮往。爭取赴日本唸「女子醫科大學」時面對極力反對的母親時，更咬牙切齒，暗暗對自己說：「好！您加我看！我死也欲讀到畢業給您看！」昂揚執著的態度、寬廣了雅信的路徑、深化了雅信現代性的深度。「同姓不婚」的堅持是對傳統的尊重，「剪鈕扣煮湯——壓驚」、「有給伊轉來做客，沒給伊轉來生子」的尊重有著丘雅信對本土傳統文化的理解尊重，更有丘雅信吸取現代性後對本土習俗的理解與調適。面對「進步文明」的現代性時丘雅信是欣然接受，在「現在性」與「本土性」之間的平衡丘雅信更從容、自在地求取了平衡。紮實的本土化觀念有現代性知識的省視、現代性知識有本土性的調節，進步文明的概念適應本土的氣候、雨量、水質、土壤，人們得以學習現代性、尊重傳統。雅信尊重本土文化、橫跨太平洋的經驗使得丘雅信對本土性更知取捨、現代性視野的延伸、人文關懷、平權概念的深化，照亮了自己，照澈了那個悲劇年代的人心，本土性、現代性之於丘雅信是具有等量的光芒與溫暖。

殖民體制所帶來的現代性：殖民與現代性是密不可分的。但我們在丘雅信身上所見之光與熱是現代性的能量，殖民的陰影縱使出現，卻常被這股熱源（現代性）所遮蔽。除了自幼本土生活之淬練，優沃之經濟厚盾、執著於現代性之追求……，尚有一關鍵之轉折點：1937~1945 日本殖民體制如火如荼展開之「皇民化」運動。《浪淘沙》文本中有「食物配給」的提述（1003），這對經營「清信醫院」的丘雅信並未波及，尚且有餘力資助長老教會之牧師與宣道師。而「皇民化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台灣總督府規定：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台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徹廢。戰爭的嚴酷氛圍逐日漸濃，避開戰爭的肆虐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的意念成形，在1940年彭亨14歲、彭立12歲時先由雪子送往日本就學，丘雅信也在1940年日本加入德義日三國軸心同盟（9月27日）前抵達日本，準備轉往美國，幾

經波折，在日本之美國大使館 1940 年度學生簽證第 1 號是由丘雅信取得。在台灣贊助牧師受警察威脅，到美國之護照被取消、警察與刑事監視的次數更加頻繁，態度日益粗暴，殖民體制的殖民現代性裡現代性已漸失光芒，取而代之的是殖民的蠻橫與豪奪。丘雅信在這樣的氛圍中終於在 1940 年輾轉經由日本前往美國進修。這趟「哈佛大學」進修之旅雖坎坷，卻幸運地避開了日本殖民體制拆屋取薪的「皇民化運動」。現代性的追尋，暫時遠離了歷史的傷口，遠離淒苦的哀歌，但尋覓的現代性（留美）終極是「再回來把學得的新進醫術貢獻給台灣」（1009）。在丘雅信的信念中，她的醫療已和患者本身的本土文化密切聯繫，她的成功醫療，是建立在醫者與患者之間具有「共享的文化」。¹⁵²她的理念中，現代性與本土化是雙循環、有接受、有篩選，互相理解，更互相尊重的。所謂文化，對法農而言，只不過是白色的面具而已。只有黑皮膚才是他生命的實相。¹⁵³對丘雅信而言，所謂留日、留美，是現代性追求的踏板，只有救人、救苦，才是她生命的實相。

三、江東蘭

如果說，城市文明、現代化意味著社會的進步、歷史的救贖；那麼，鄉村一古樸的民族生存則意味著心靈的歸屬，生命的依託。¹⁵⁴然而，有所歸屬就意味著拒絕拯救？而拯救的降臨，就意味著故園的沈淪？如果以江東蘭的成長為例：他成長於古樸的鄉居生活，隨著年紀的成長而接受現代性的教育、城市文明的洗禮，安於教職後自謂：「他不愛奢華，不愛喧囂，只愛樸素與安謐，於是在這花園裡，他找到了自己，……」（761）從「湖口公學校」、「台中中學」、「神戶商科大學」、「早稻田大學」現代教育的薰陶，並未阻絕他自身心靈的歸屬，生命的依託。在江東蘭身上現代性與本土傳統是互涉的，

¹⁵² 弗朗茲·法農 著，陳瑞樺 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P30。

¹⁵³ 弗朗茲·法農 著，陳瑞樺 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P14。

¹⁵⁴ 張京媛 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市，麥田，1995，P328。

有時現代性指數昂揚，本土意識微弱，又有時傳統聲勢激昂，現代性側身幽微。無論是現代性還是本土性，都給江東蘭莫大的影響，甚至震盪。江東蘭的歷史觀照，已不單純是殖民地的反抗或本土意識的確認，「日本」與「台灣」的身份取捨。在重重的反抗、確認、調適與抉擇中，衍生出更多矛盾、混纏的思緒與掙扎。筆者以現代性、本土化來衡量江東蘭，其座標位置座落（+ -）區間，歸納如下：

（一）江東蘭鄉居成長背景塑造了古樸的本土質數，沈殿了心靈歸屬，厚實了生命的依託。留學的經驗，中學教師的歷練，添加了現代性的密度，中學校長的夙興夜寐，寬廣了現代性的視野。

如果殖民主義操作是透過認同機制，透過殖民暴力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綁在一起，透過將殖民者建構成現代性的體現，簡言之是對於殖民者的認同，那麼本土主義的操作則是透過對於被殖民者「自我」的認同。¹⁵⁵

江東蘭厚實的現代性密度——一口十分流利的日語，雖著短衫和短褲，戴著箬笠，打著赤腳。亦足以令火車列車長略略一驚，轉換成客氣的語調（600）。東蘭的固執與強硬，最後令車長頻頻點頭。寬廣的現代性視野，令殖民者（小澤大尉）感激地對東蘭說：「真是感謝你哪！江東蘭中尉，這次『加美濃高地』之行，真的是全靠你一個人，你不但為我生了嘴巴！也同時為我長了眼睛！」（1282）古樸的本土質數個性任新竹教育科長，是知難而退。新竹中學校長任期是夙興夜寐，適得其所的職務，是心靈之歸屬，寬廣的現代性視野更勤業敬業，十多年而不輟。（1966）

江東蘭自主的追求現代性，卻也不經意的參與帝國文化的統合建構（講流利日語、擔任日軍翻譯官），身為受殖者的江東蘭卻未不自覺產生官製意識的自我複製並內化。在現代性這一主軸上，江東蘭心態上是執著；作為上更是驚捍前行。

（二）對現代性的追求熱切、渴望，具有度的接受力，亦能站

¹⁵⁵ 弗朗茲·法農 著，陳瑞樺 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P55。

在本土立場反思。面對殖民體制，有忍、有調適，行動力較局限，局限於自我。

江東蘭自「湖口公學校」、「台中中學」、「神戶商科大學」、「早稻田大學」一路接受現代性之教育，有意無意中對殖民現代性的優越認同，無形中自當日益深廣。雖具有本土立場之反思，但常在不知不覺中默認了台灣文化的從屬地位。（第四章，P89）對現代性的高度接受力，熱切渴望與追求的江東蘭之成長與殖民現代性纏繞一起後，顯然就必須面對更多的試煉。而日本殖民現代性具有無與倫比的正當性，江東蘭的本土聲音常無力與之對話，更遑論反詰，江東蘭的本土性事實上隨著受教育的深廣而淡薄、甚而消亡。也就是說接受殖民現代性教育之江東蘭，鄉土記憶卻日益稀釋，但彼長我消的境況下，逐日退守，退守至劃地自限的我。

新竹中學的教職是早稻田大學畢業展現現代性的光輝，從台北帝國大學教職變成中學教職是殖民主義的陰暗。接到中學教師任命書後：東蘭是「咬著牙根走出家門，往那田間的小泥路漫步走去……」。雀屏中選到軍隊充當譯官，是被殖者的悲淒，更是殖民體制橫徵暴斂的表徵。殖民主鬼木校長將東蘭踩在腳下，棄若敝屣的態度，令東蘭「倏地從沙發立起，對鬼木校長連回也不屑回，跨著大步逕自往門口走出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一個沒有做人權利的時代，一個沒有說『不』的權利的時代，質問誰比誰更勇敢，或誰比誰更具抗議性毋寧是太天真的。……我們也應從人性的角度思索人在極端受壓迫的情境下可能的各種反應，思索人之所以為人的多面與多變。」¹⁵⁶的確比較誰的行動力強、誰的抗議性高不見得有意義，從人性的角度思索江東蘭留日回台後，接受中學聘任起，出眾的學歷，難得的現代性知識，局限於「忍」對江東蘭是可惜；屈隱於「調適」的心態對普羅大眾更是令人扼腕。

¹⁵⁶ 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市，五南，2004，P282。

鍾肇政先生之《台灣人三部曲》剛好代表台灣人三種不同階段的抗日過程，最早是武力抗日，慢慢再轉入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變成順著世界潮流——民族運動的角度來抗日。¹⁵⁷

武力抗日 → 議會設置請願 → 民族運動的角度抗日。這是《台灣人三部曲》不同階段的抗日過程。《浪淘沙》文本中筆者所細分的三代：武力抵抗的一代（第一代）、壓不扁的成長的一代（第二代）、戰火掙扎下的一代（第三代），這三代從周福生、丘元家、江龍志（第一代）、丘雅信、江東蘭（第二代）、彭亭、彭立、江河清、江東寧（第三代），一代傳一代，敵峙的對抗、迂迴游擊、固本權行的抗爭、噤聲的潛沈，每個世代作法不同、每個家族作為互異，時間與反殖民又有何關聯：

周福生（第一代）的抵抗在自然中蘊釀，在生活中展現的是質樸的。從人性出發的質樸力量是面對殖民體制最重要、最有效的反制力量。丘元家（第一代）地主身份雖未有顯著的抵抗意識，但在那個沒有說「不」的權利的時代，從人性的角度思索，他卻積極順勢地培養了丘雅信、灌溉了這位台灣第一位女醫生。抵殖民的概念，也由丘雅信的延伸，有了層面的擴展，有了不凡的貢獻。江龍志（第一代）由武力抵抗的羅希典，衛台挺身而戰的羅希典轉化成一邊耕田、一邊設私塾教人漢文的江龍志。在外表上是噤聲了，卻也在堅持抵抗理念的過程中調適自我，雖無奈的認命卻也有著認命的原則。江龍志的理性思考也影響了江東蘭，智性的轉化作為更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薰陶了江東蘭，德性的堅持更蓄積了江東蘭爾後的能量與分寸。抵抗火炬的傳承：周福生「人性之堅持」作為之模式，雖得不到殖民者的善意回應，但兒孫輩「抵殖民」奉為內心

¹⁵⁷ 林瑞明 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市，允晨文化，1996，P230。

神龕的周明德，更清晰、透澈了殖民者的傲慢與偏見。丘元家所構築的愛的機制、善的循環，使丘雅信免於生活的壓迫、制度的剝削，自在的空間，無被殖者滿腔的不滿與怨懟，得以在殖民體制貧瘠的本土土壤中成長。當武力抗爭已無力或無心作為時，在文化上、教育上紮根，何嘗不是為抵抗填加基石。

武力抵抗的一代在抵抗和涉險時，周福生自在自為的質樸的實在，才得以自我完成；羅希典的英勇抵抗意味著超越生命，朝向一個至高無上的善；丘元家順勢地從順於自己的專屬價值。在殖民體制烏雲籠罩的日據時期，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不同家族、相異的作為，卻飢來吃飯、暈來眠的自然轉化「抵抗」為普遍有效的客觀真理，這就是「抵抗的一代」。有過他們，是台灣庶民的幸運，失落他們，是台灣庶民的遺憾。

「壓不扁的成長」的一代：

一：「壓不扁的成長」這一代，代表人物周明德，他在歷經一次次的挫敗，卻也化為一項項成長的養分。抵抗過程中強遭壓迫而認命，卻未止息；認命過程中即使再遭受凌遲亦只得屈從。但這樣的屈從過程是人性的扭曲，如此扭曲的人性造就更充沛的反殖民力量。「抵抗的一代」周福生身上見到的是人性之堅持，挫敗、壓迫、認命、凌遲、屈從中所淬練出來的周明德彰顯的已是抵殖民的意識了。他的「抵殖民」非激進的愛國主義者、無庸俗與粗暴，是在生活中觸撫自我抵抗意志的脈搏。由生命與生活連結所散發出的光采，更具一份寬宏、善良的人文關懷。爬上台灣總督府旗桿頂的殖民體制，都在這樣的光采下而呈暗淡。

二：這一代另一代表人物丘雅信，父親地主的地位躋身資產階級加上本身知識份子的位階，原先與殖民者的種種矛盾似乎在經濟利益、階級地位可獲得補償而脫離普羅大眾解放的情形，這無異是走到普羅大眾的對面去而與殖民者共謀共犯，在有意無意之間順應了殖民者的殖民策略。¹⁵⁸丘家能不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而與周遭有

¹⁵⁸ 陳建忠 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市，五南，2004，P55。

綿密的、人性的互動是忘卻被殖民的事實，視一般百姓窮困生活為正常而產生。在有意無意之間依附殖民者，抵抗的意識已全然消失，認命的觀念已不由自主深植人心，自然地濃烈的印記在丘元家身上。丘雅信順遂的成長與求學過程相當程度也建基於這樣的基礎。直到日本求學，才清楚地認識了被殖民者的身份，執醫生涯厚植了她的自信、深耕了她的能力、擴展了她的視野，最重要的是擦亮了自已那道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不明的界線。「壓不扁的成長」這一代，對日本殖民體制的抗爭已走到文化的絕境上來，本來就隱含迂迴前進、固本權行的本質。¹⁵⁹當武力抗爭無以為繼，丘雅信清楚台灣最需要的不是盲目的犧牲而是深耕本質，不是狹隘的排它或虛假的包容，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幫民眾解決問題、認清方向。她以知識背景療醫庶民疾苦、以被殖者身份發聲、以撒豆成兵的方式散播醫療衛生的種子。丘雅信不僅由理性與現實思考而已，而是從人性與生活的角度從事反殖與啓蒙工作。把殖民主與被殖民者的衝突對立的負數，轉化成台灣庶民的積極意義，應是丘雅信最為卓著的抵殖民行動。

「現代化的過程在第三世界所發生的效用，一面是啟蒙的，如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之可以「新民」；但另一面則是壓制的，如迫使本土文化的改觀，迫使本土文化落入次要文化或落入遺忘。」¹⁶⁰

三：「壓不扁的成長」一代第三個代表人物江東蘭，雖在父親江龍志刻意薰陶下有漢文基礎、有本土的視野、有鄉土的情懷…，但隨著接受殖民現代性教育的增長，本土關懷日益淡薄，當然他的本土質素並未「落入遺忘」，但可以確定的是已「落入次要文化」。神

¹⁵⁹ 彭瑞金 著，《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市，春暉，1997，P24。

¹⁶⁰ 張京媛 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市，麥田，1995，P137。

戶商科大學就學期間，因肺蛭病的纏身使自己的生活在變成一種空茫茫的存在。回台灣養病猶如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這時的江東蘭身心的呼吸已接上台灣社會脈搏的跳躍。再進步的現代性知識無土壤之紮根，猶如花瓶之鮮花，鮮豔卻難以有長久之生命力。這是江東蘭之癥結。任職新竹中學教師更明顯感受殖民體制無所不在的束縛，沒有抵抗只有忍讓、只有調適，調適到自我的一方，但這卑微的方寸也逐日侷限，終於在派往前線前宣洩：江東蘭一陣狂笑，匾額的金箔「忍」字潑滿紅酒，那酒液順著「忍」字的刀痕一滴滴像血一般滴了下來……。「加美濃高地」之行與小澤大尉的摩擦齟齬而後的互諒互信，終於讓江東蘭跨出了一大步。江東蘭過去的「苦楚記憶」為新生的一切提供了能量。……所堅持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文化間，「彼此侵蝕」的關係。¹⁶¹這樣的「彼此侵蝕」關係讓江東蘭走出了忍、跨出了調適，殖民體制下淒苦、無奈依舊，但無奈、淒苦中保有些微的自主意識，江東蘭的空間應較噤聲不語前寬闊些許了吧。

「戰火下的掙扎」一代：

在殖民地生存的知識份子，任你如何能忍耐善處，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皇民化」猶如雪上加霜，戰爭的逼進更令庶民飢迫噤聲：

後方的人要忍受一切困難，把物質「供出」。有蛋，還有馬草和柴等，據說都是要給軍部的。拿不出實物的，也可以繳代金。如果有人不肯「供出」，那就是「利敵行為」，會給扣上一頂「非國民」的大帽子。……一般民間除了這一類「供出」之外，還有所謂之「奉仕作業」，或叫「奉公」，替官方做工，得不到半文錢工資，甚至還必須自帶便當。……至於從事的工作，不外是築跑道或挖戰壕之

¹⁶¹ 比爾·阿希克洛夫特 著，《逆寫帝國》，台北縣，駱駝出版，1998，P55。

類，挖土掘石，挑挑扛扛，吃力是不用說的。可是誰敢不參加？莫說反抗或抗議，連吭一聲都不敢。因為這就是「滅私奉公」，是為了亞洲人的亞洲，是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啊！¹⁶²

殖民體制下之台灣庶民，已如同蜘蛛網上掙扎的可憐蟲，「皇民化運動」浮虜了一群無奈的百姓的精神與生活，¹⁶³戰爭的逼進，更強烈地啃食了百姓的肉體。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台灣又成爲日本侵略華南、南洋地區的前進基地。以農業爲主的台灣經濟，快速轉移到軍需工業化的新局面。正如經濟學者劉進慶的見解：

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在台灣近代化的進程上是非常的、一時的，好比曇花一現而消失，又如盆栽扎根不落地，基本上沒有改變台灣社會經濟的低度開發狀態，令台灣戰後從頭開始工業化和近代化建設。¹⁶⁴

日據殖民體制使台灣庶民不得不屈從，皇民化政策令台灣庶民爲生活而認命，戰爭的逼進更令台灣庶民爲生存而傾斜。殖民者的壓迫是爲殖民體制的推行、皇民政策的推動猶如軋轢之於百姓、戰爭的逼進更視百姓爲芻狗。一切以殖民宗主國的利益考量爲前題，罅隙中生存的百姓雖甚之尤甚，但也只得在惘獨的情況下喘息。「戰火下的掙扎」一代，彭亨、彭立在殖民體制烏雲已密佈全台，雷聲、

¹⁶² 鍾肇政 著，《望春風》台北市，草根出版社，1997，P324。

¹⁶³ 洪宜勇 主編《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2004，P317。

1940年2月11日，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通過「改姓名運動」，據統計，一直到半年後的8月11日止，台灣人改姓名的卻只有168人而已。同年11月25日，爲了鼓勵更多的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日本當局又制度一種獎勵方式，規定說日語的家庭爲「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質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這樣到1943年6月時，改姓名的台灣人已達10萬人之多。

¹⁶⁴ 洪宜勇 主編，《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與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劉進慶著，海峽學術，2004，P13。

雨聲不斷的皇民化政策吹襲、戰爭陰影肆虐下，走避日本，江河清、江東寧也只能閃避於屋內，側身於自身的一隅，這一代的心靜在這樣的天空下是沒有風聲、鳥聲，沒有生氣的死林了。

「武力抵抗的一代」鮮明的抵抗意識之外，更轉化「抵抗」為普遍有效的客觀真理。「壓不扁的成長」這一代，江東蘭在「彼此侵蝕」的互涉中走出了「忍」、跨出「調適」，無奈、淒苦中保有些微的自主意識，寬闊了噤聲不語前之空間。這樣的作為，即使有缺陷，那也不是在心靈，而是在環境的心靈。¹⁶⁵這一代更積極之作為「棄用中心的支配性，及其認可的經驗，『邊緣』的經驗方可被完全有效化。」¹⁶⁶殖民現代性、本土質數揉雜下成長的丘雅信，接受完整之現代性教育，卻能面對、挪移殖民者之支配，甚而棄用，邊緣的（本土經驗與本土加現代之經驗）方能逐漸有效化。「戰火下的掙扎」一代，過去的苦難不但在這一代成為烙印和負擔，而且是愈深且重，而這個時代的青少年可以說都受過日本帝國的麻醉教育。¹⁶⁷這種所謂「皇民意識之發揚」的教育，同時也使台灣人民的民族自我意識消沈。要不就逃避體制，追尋自我，但戰火試煉下，側身幽微的空間已愈來愈小；要不就放棄自己，順應體制，也就是說「戰火下掙扎」的一代，「忠於自己的感受，忠於自己的思想的權利」已是奢談，如何坦白地面對自我？調適、逃避已無法立足這「戰火下掙扎」的生活時，在灰濛濛的天空中，這一代遲滯的眼神裡是罩翳著多重時代的陰影。因此，本論文提出三個問題的總結與反思，突顯《浪淘沙》所呈現的宗旨，同時也可以作為本論文開展的研究面向及獲致的研究成果：

首先《浪淘沙》文本中主要人物面對現代性／本土性的態度，

¹⁶⁵ 弗朗茲·法農 著，陳瑞樺 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P302。

¹⁶⁶ 比爾阿西克洛夫特 著《逆寫帝國》，台北縣，駱駝出版，1998，p 96

¹⁶⁷ 學者藍博洲〈尋找祖國三千里〉收入，洪宜勇 主編《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集》，海峽學術出版，2004，P317

1943年起，為了使台灣人民在「皇民化」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台灣總督府又進一步實施六年制所謂「義務教育」制度。據統計1902年，台灣孩童就學率僅及3.12%。1942年，台灣人的就學率為64.8%，「義務教育」的強制實施後，台灣人的就學率在壹年內激增至85%。

有何積極意義？

周福生在文本中突顯的土俗的生命力、草根型的思考，也是當時群眾思考脈博的代表。日本據台之初，現代性作為仍淡薄的殖民主義下，本土性的彰顯有其相對的空間。在周福生身上現代性／本土性的特質，相較下本土性的質數遠多於現代性。而在這諸多周福生身上所突顯的本土性中更有著良好而理性的特質，如固守土地不輕離，向殖民者據理力爭、不屈服權威。但也有負面而封建的特質，如大男人主義。如果現代性是無可抵擋的趨勢，在周福生身上看到的卻是本土性的光輝彰顯，足令現代性相對地暗淡無光，對周福生來說本土性更具有抵抗現代性的任務，他的本土性正是從人性與生存主軸開出旺盛的生命綠意。

不同於周福生之丘雅信，面對現代性／本土性，卻相同於周福生並未刻意尋求相對策略。面對理性的現代性是認同其中心的支配性，熱烈的追尋；面對具有封建、理性雙重特質的本土性，並未有鄙視、遺棄的蔑視態度，在規律與失控中尋找解答、尋覓理解，在真確與非真確性中，覓得支撐點。在對立的兩極中，累積理解、累積支撐。在丘雅信身上所散發的光環並非只是現代性的光芒，更因有著因厚實的本土性所建構出來的能量，而持續照耀。也可以說現代性的展現在丘雅信身上的持續、無限推延，是因對邊緣的本土性從未棄斥，根據常規、期待及經驗，重新構設，在丘雅信的光輝中，現代性與本土性是具有等量其觀的地位與價值。

再看江東蘭，面對現代性／本土性，是平凡的人物。平凡人的生命與經歷沒有激烈的、悲壯的性格。遇到現代性的籠罩，嚮往追求是不假思索。在父親江龍志刻意建構下本土基石是厚實，但當面臨現代性／本土性的激盪時，就像每個活生生的在你身邊的人，它的痛雖未至令人窒息，但卻令人呼吸都感困難。當面臨這樣的衝擊，剛開始只能躲在房內，自暴自棄；隱藏在內心幽微處，暗自悲悽。但當能打開房門、敞開心門，回歸生命、生活的本質，貼切地反應、調和現代性／本土性的衝擊。去除現代性絕對化的概念，轉化、調

整被貶抑為「他者」的本土化，不以扼殺本土性為代價，那現代性的種子在本土性的土壤與雨露中，成長雖苦澀，卻也因著根的深化，置換出成熟的狀態。從本土性的自然認同到現代性的熱切追尋，本土性的疏忘，最後不再視邊緣的本土性為邊緣。構設出現代性／本土性，均衡的價值體系，當邊緣的本土經驗被相對程度的有效化時，江東蘭曾被扭曲的心靈也獲得了矯正，獲得了洗滌，獲得了昇華。

再看《浪淘沙》人物抵殖民意識／行動的可貴，突顯了什麼樣的台灣精神？

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在日本殖民時期並沒有一套穩健的價值觀，也沒有明晰的自我肯定，人生觀是灰白，一切都是令人感到懷疑。深一層的探索也就是缺乏一種真正核心的精神與價值體系，也未有特有的形式。日本殖民烈日的照耀下，出現了抵殖民的行動／意識。周福生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前夕，移民台灣。漢文化的深化，是移民的動機之一；與大和民族的區隔，更是間接促使紮根台灣的泉源。不願入日本籍是抵殖民之意識，剪辮子時更言若滿清皇帝若再統治中國，周福生是「甘願死在台灣」。(403) 與日本殖民者對立位置，不做滿清奴才，認同土地、深耕台灣已是必然。十九世紀末葉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其住民尚存漳泉客家社群意識，因而時有械鬥；割台後共同面對日本殖民時，在以日本人為對比的情況下，竟超越了原有的社群意識，擴展成台灣／日本相對的概念。在這個概念的形成過程中抵殖民行動／意識的推波應是一大主力。移民社會的台灣，因移民時間、宗族意識本就不易在短時間形成共同的核心精神，但因抵殖民的一致立場，咀嚼苦難與災難的被壓迫位置，台灣本土對抗日本殖民主義獲得了更明確而一致的立場。瘖啞的被殖民者、無法向外界呈現靈魂和精神，這種深處的聲音，都因反抗精神，源自悲苦歷史記憶延續反抗，因反抗而凝結一體，對丘雅信而言現代性與本土性是雙循環、有接受、有篩選，互相理解，更互相尊重。但當殖民主義籠罩瀰漫時，也只能艱難的繼續，這樣的繼續卻也一點一滴銷蝕她的生命基底。銷蝕過程中抵殖民的滋長

卻也無時不刻，抵殖民的滋長成就批判的精神，批判的匯集壯實了反抗。丘雅信的抵殖民意識的提升讓她與台灣庶民的呼吸脈博更為貼近。江東蘭最後慢慢走出忍、跨出調適，殖民體制下淒苦、無奈依舊，但無奈淒苦中保有些微的自主意識。這些微的自主意識即是抵殖民的萌芽、批判精神的開展。長期受殖民性與現代性的牽引，而不自主地擺動，反抗精神的加融較噤聲不語前的江東蘭空間寬闊幾許，與台灣普羅大眾的距離也因反抗而不再扭曲、不再虛無，對台灣庶民是更具親近感、透明度、可靠性。

日本殖民者的殖民現代性雖詭異地劃定了台灣人的身心活動領域，雖非具像的牢籠，那深廣的壕溝卻也深深烙印在台灣人每個人心中。《浪淘沙》人物抵殖民的意識／行動，雖無從翻越那桎梏，但反抗的精神也相當程度鬆綁束縛，撫平那心中無際的壕溝。

最後《浪淘沙》三代人物對殖民現代性的抵抗與屈從，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不同階段下人民的因應模式，台灣人為何最終對殖民現代性失去抗拒力？要如何正視、清理這樣的歷史傷痕？

在最苦悶的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人沒有逃避現實，也沒有自甘成為殖民主義的附庸。恰恰相反，他們是貧瘠土壤的根鬚，土地雖貧瘠，著根依舊。現代性猶如水份之滲入根鬚，造成躍動的生命力。周福生送周明德唸書、上新竹中學、轉學開南中學是現代性的認同。丘雅信對醫學的執著態度，有其生成背景的影響，更有著對現代性的嚮往。江東蘭從童蒙無知經歷壓抑是依循現代性的路徑的波折過程；具備自主意識而成熟有定見，更是對現代性的體悟。但當現代性並非單純的現代性，而是殖民性強烈的殖民現代性時，根鬚吸水，雖自知卻無法抗拒。「武力抵抗」的一代因抵抗氛圍仍濃，殖民者面對百姓仍在清理治理模式中。菊地巡佐對剃頭光之妻光嫂懷孕，不能大掃除，「胎神」的台灣風俗的尊重，是人性的光輝展現。深一層探究也是殖民者摸索前行中，抵抗氛圍仍濃的顧忌。「武力抵抗」的一代，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殖民者的顧忌，殖民現代性相對淡薄的天空下，萬般無奈中，仍保有一絲絲呼吸的空間。

「壓不扁的成長」這一代，相對於日本殖民體制已由「綏撫時期」進入「同化政策時期」。爲了日本的南進現代性是加深加廣、爲了統治壓榨的便捷殖民性亦是劇烈。殖民現代性所造成的齟齬與勃谿，只能照單全收。在殖民現代性下台灣人覓得的不是自我，而是委曲求全、忍辱服從。日本殖民者強制、強壓的施政是主要，殖民主義下的台灣反抗的意識相對淡化、噤聲，更是隱而不顯的因子。「壓不扁的成長」一代，雖因現代性而逐漸呈現狀似有反省力，更因殖民性無實際行動力的狀態。每當殖民現代性強勢而來，猶如貧瘠根鬚長出的嫩芽，遇阻礙、石塊，只能繞道而行，迂迴前進。

「戰火下掙扎」的一代，他們與現實是疏離的，他們無法貼近社會脈動，他們活在那個社會，卻也無法真正融入社會。關懷政治、思索自己存在價值均是奢言。在種種皇民化意識洗腦下，殖民者與被殖民分別被定位爲污濁與潔淨。被殖民必須與過去的自我斷裂，上一代產生的錯亂，在這一代因戰爭的陰影不得被收編、壓服。「壓不扁的成長」一代，因現代性能量的灌溉，雖有不凡的成長，雖曾疏離社會真實脈動，亦因對殖民現代性的反省與重新體悟，而發展出嫩芽。但日本殖民者戰爭的嗜血性，疏離、虛無是常態。人性的撕裂也因戰爭而令殖民者視而不見。假若保有一滴點現代性作爲，也是爲了戰爭。「戰火下掙扎」的一代，面對殖民現代性，其實真正面對的是戰爭。對日本殖民者來說，這場戰爭是南進政策、是東亞共榮圈的聖戰。對台灣百姓來說卻是背著一個繭進入另一個更巨大的繭，閤啞如繭，找不到自己的聲音了。

要如何清理這樣的歷史傷痕？國民政府來台，某一程度上複製了同樣的殖民模式。台灣人始終陷在認同的混亂之中，要如何正視殖民的歷史，用理性的態度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本土認同，是我們今天必須深思及努力的方向。從《浪淘沙》的回顧中，也許可以獲得更多有用的啓示。

參考文獻

一：東方白著作：

- 1：《浪淘沙》上中下 台北，前衛，1990
- 2：《真與美》一～六冊 台北，前衛，1995
- 3：《OK歪傳》台北，前衛，1991
- 4：《魂轎》台北，草根，2002
- 5：《小乖的世界》台北，草根，2002
- 6：《臨死的基督徒》台北，水牛，1969
- 7：《黃金夢》台北，學生，1977
- 8：《露意湖》台北，爾雅，1978
- 9：《東方寓言》台北，爾雅，1979
- 10：《盤石的腳印》台北，爾雅，1982
- 11：《十二生肖》台北，爾雅，1983
- 12：《夸父的腳印》台北，前衛，1990
- 13：《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1993
- 14：《父子情》台北，前衛，1994
- 15：《芋仔番薯》台北，草根，1994
- 16：《神農的腳印》台北，九歌，1995
- 17：《雅語雅文》台北，前衛，1995
- 18：《浪淘沙之誕生》台北，前衛，2005
- 19：《東方白集》台北市，前衛，1993

二：專書（以姓氏筆劃為順序）

- 1：下村作次郎著：《從文學讀台灣》台北，前衛，1997
- 2：王寧著：《全球化與文化研究》台北，揚智，2003
- 3：比爾、阿西克洛夫特著：《逆寫帝國》台北，駱駝，1998
- 4：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1990
- 5：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市，前衛，1989
- 6：矢內原忠雄著 周憲文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市，海峽學術，1999
- 7：古繼堂著：《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96
- 8：朱雙一著：《台灣文學思潮與淵源》台北，海峽學術，2005
- 9：李喬著：《小說入門》台北，時報，1986
- 10：李喬編：《台灣文學導讀》台北縣，允晨文化，2006
- 11：邱貴芬著：《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 12：林文寶等合著：《台灣文學》台北市，萬卷樓，2001

- 13：林瑞明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縣，允晨文化，1996
- 14：林鎮山著：《台灣小說與敘事學》台北市，前衛，2002
- 15：洪宜勇主編《台灣殖民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2004
- 16：施叔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台北市，前衛，1992
- 17：施懿琳著：《跨與、漂泊、釘根》台北，春暉，2000
- 18：張德麟主編《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台北市，前衛，2003
- 19：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1995
- 20：張明雄著：《台灣現代小說的誕生》台北市，前衛，2000
- 21：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
- 22：陳芳明著：《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
- 23：陳芳明著：《殖民地摩登》台北，麥田，2004
- 24：陳建忠著：《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台北，五南，2004
- 25：陳學明著：《文化工業》台北，揚智，1996
- 26：陳昭瑛著：《台灣文學與本土運動》台北市，正中，1998
- 27：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市，春暉，1997
- 28：彭瑞金著：《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市，前衛，1994
- 29：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1998
- 30：愛德華、薩依德著：《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
- 31：歐宗智著：《多少英雄浪淘盡》台北市，前衛，2005
- 32：盧建榮著：《從根爛起》台北市，前衛，2002
- 33：盧建榮著：《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台北，麥田，2003
- 34：鍾肇政著：《望春風》台北市，前衛，1997
- 33：鍾肇政著：《濁流三部曲》台北縣，遠景，2005
- 35：鍾肇政著：《台灣人三部曲》台北縣，遠景，2005

三：期刊論文（以姓氏筆劃為順序）

- 1：方群：〈滾滾江流浪淘沙〉，《聯合報》，1991年11月17日，39版。
- 2：台灣文藝編輯部：〈《浪淘沙》文學座談會記要〉，《台灣文藝》123期，1991年2月，頁4~17。
- 3：宋澤來：〈台灣文學的「奧迪賽詩篇」－世界東方白的悲情小說《浪淘沙》〉，《台灣新文學》，12期，1999年7月，頁200~229。
- 4：東方白：〈敬答歐宗智：論《浪淘沙》〉，《臺灣文學評論》，2002年10月，頁36。
- 5：林柏彥：〈浪淘沙的人物與迷失〉，《自立早報》1991年8月18~21日，19版。
- 6：林柏彥：〈《浪淘沙》的客家經驗〉，《文學廣場》，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3年1月，頁1~13。
- 7：林柏彥：〈《浪淘沙》與新竹中學〉，《文學廣場》，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3年1月，頁14~21。

- 8：林柏彥：〈《浪淘沙》的人物與迷失〉，《文學廣場》，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3年1月，頁22～40。
- 9：林鎮山：〈人本主義的吶喊—試論東方白的浪淘沙〉，《自立晚報》，1990年12月23日，5版。
- 10：高惠琳：〈東方白出版《浪淘沙》〉，文訊期，1991年2月，頁113。
- 11：張大春：〈混合史實、政治諷諭和入道關懷的浪漫寫實作品—浪淘沙〉，《中國時報》，1990年12月28日，27版。
- 12：葉石濤：〈台灣人命運的史詩《浪淘沙》〉，《中國時報》，1991年12月，27版。
- 13：彭瑞金：〈《浪淘沙》掠影〉，《文訊》64期，1991年2月，頁69～72。
- 14：彭瑞金：〈《浪淘沙》掠影〉，《瞄準台灣作家》，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頁225～233。
- 15：董學奇：〈文學中的台灣女性海外經驗——以東方白《浪淘沙》中的丘雅信為例〉，《台灣文學評論》，5卷1期，2005年1月。
- 16：齊邦媛：〈冰湖雪山和南國鄉夢—賀《浪淘沙》七版問世〉，《霧漸漸散的時候—台灣文學五十年》，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頁281～294。
- 17：齊邦媛：〈冰湖雪山和南國鄉夢—賀《浪淘沙》七版問世〉，《浪淘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10月。
- 18：歐宗智：〈人道精神的謳歌—談東方白《浪淘沙》的崇高主題〉，《臺灣文學評論》2卷3期，2002年4月，頁62～68。
- 19：歐宗智：〈崇高的宗教情懷與特殊的小說語言表現—論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的寫作特色〉，《臺灣文學評論》2卷3期，2002年7月，頁111～127。
- 20：歐宗智：〈人道精神的謳歌—談東方白《浪淘沙》的崇高主題〉，《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12月，頁94～104。
- 21：歐宗智：〈追求文學的極致—談《寒夜三部曲》與《浪淘沙》的宗教情懷〉，《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12月，頁105～118。
- 22：歐宗智：〈本土小說裡的族群情結—以《怒濤》、《埋冤一九四七》、《浪淘沙》為例〉，《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12月，頁134～144。
- 23：歐宗智：〈《浪淘沙》小說語言的特殊表現〉，《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12月，頁145～161。
- 24：歐宗智：〈正港的台灣英雄——談《浪淘沙》周福生之人物塑造〉，2003年1月22日。
- 25：歐宗智：〈臺灣知識份子特殊的殖民經驗——談《浪淘沙》江東蘭之人物塑造〉，《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3年2月19日。
- 26：歐宗智：〈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俗諺之運用探析〉，《國文天地》214期，2003年3月，頁74～78。

- 27：歐宗智：〈營造性格對照的戲劇張力——談東方白《浪淘沙》日本人的善惡對比〉，《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3年3月13日。
- 28：歐宗智：〈西方人的善惡對比——談東方白《浪淘沙》次要人物的塑造特色〉，《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3年3月26日。
- 29：歐宗智：〈反應台灣歷史際遇的奇女子——談《浪淘沙》丘雅信之人物塑造〉，《台灣文學評論》，3卷2期，2003年4月，頁39~49。
- 30：歐宗智：〈再現逝去的時代及地域風情——談東方白《浪淘沙》小說環境的掌握與表現〉，《國文天地》220期，2003年9月，頁80~85。
- 31：歐宗智：〈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主要人物塑造析論〉，《東吳中文研究集刊》10期，2003年9月，頁341~367。
- 32：歐宗智：〈《浪淘沙》江東蘭生命中三個女性之塑造〉，《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3年10月13日。
- 33：歐宗智：〈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次要女性角色之塑造〉，《國文天地》19卷10期，2004年3月，頁4~11。
- 34：歐宗智：〈台灣文學的語言的運用——讀顏敏政〈台灣文學的語言表現〉有感〉，2005年1月。
- 35：鍾肇政：〈滾滾大河天上來〉，《自立晚報》，1989年3月19~21日，14版。
- 36：鍾肇政：〈含淚的歡呼——聞東方白巨著《浪淘沙》完成書感〉，《台灣文藝》121期，1990年10月，頁62~65。
- 37：顏敏政：〈台灣文學的語言表現——論「歐宗智東方白小說」中的台灣語文部分〉，《臺灣文學評論》，2004年7月，頁245~261。

四：學位論文（以姓氏筆劃為順序）

- 1：王淑雯著：《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分析》，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蕭新煌教授指導，1994年7月。
- 2：游玉楓著：《東方白《浪淘沙》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賴芳伶教授指導，2003年7月。
- 3：董學奇著：《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嘉義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蔡尙志教授指導，2005年7月。
- 4：歐宗智著：《東方白《浪淘沙》析論》，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李瑞騰教授指導，2005年1月。